



马栏革命简史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



马栏革命简史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栏，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同陕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道，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题记





谨以此书献给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马栏革命简史》编委会

主 任：千军昌

副 主 任：姜 锋 高合元 惠进才

刘新余 王生江

委 员：任天龙 王炳建 杨孟珠 胡 烨

卢聪慧 第五振东 王 君 房喜坤

周大勇 马西文 冯宏斌 李海涛

马瑞民 李晓军 燕培植 宫胜利

孙海军 李汉卿 刘敏卓 王晓军

马相民

《马栏革命简史》编辑组

主 编：王炳建

执行主编：王晓军

编 辑：周国建 张 柳 周四元 王 浩

赵 卉 沈 靓 白 云 辛改艳



马栏革命简史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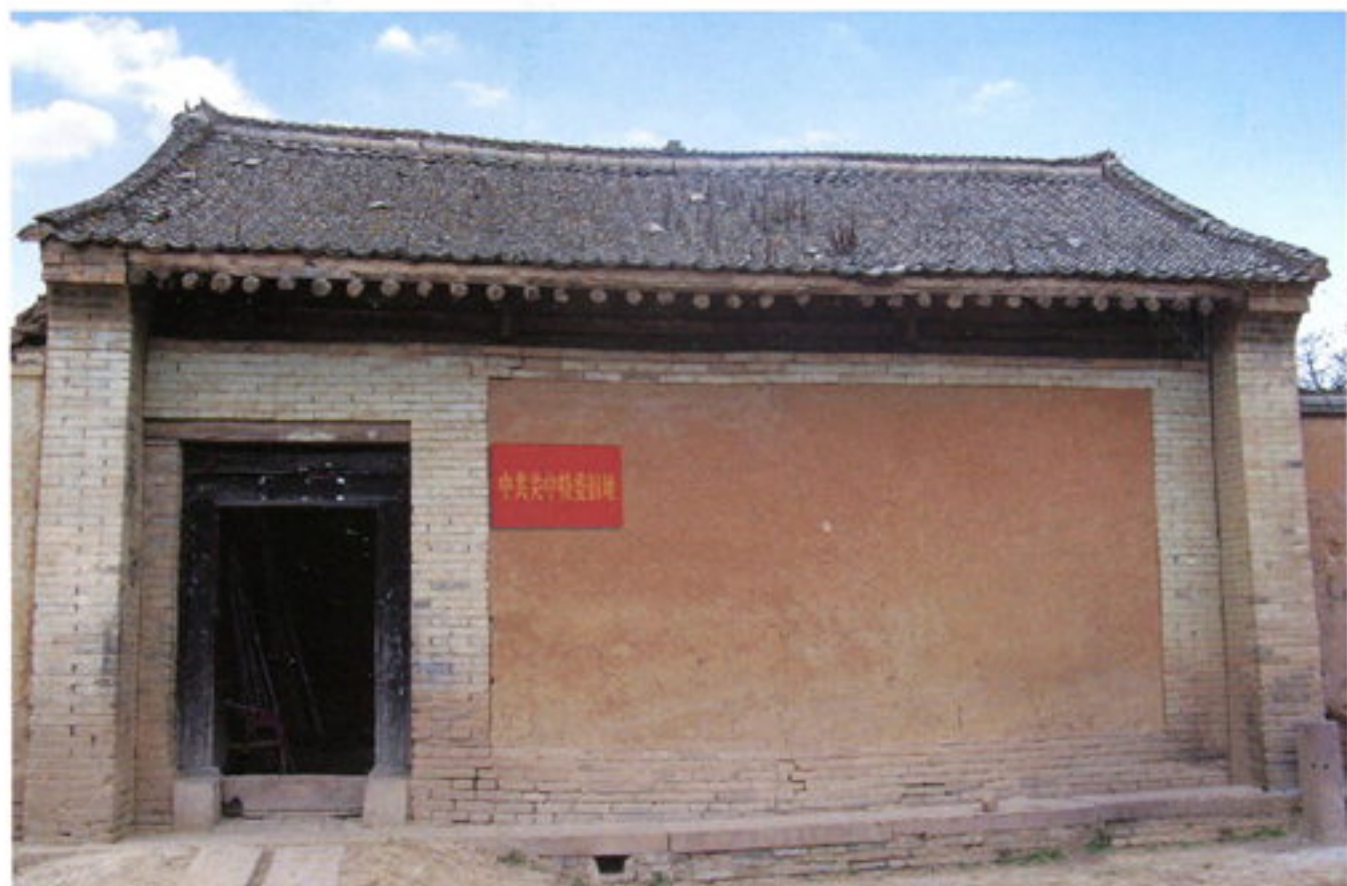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关中地委、陕西省委、关中军分区旧址



马栏革命纪念碑



关中分（特）委机关旧址



马栏革命纪念馆外景



马栏大生产展览室



关中分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合影



关中分区大生产运动



原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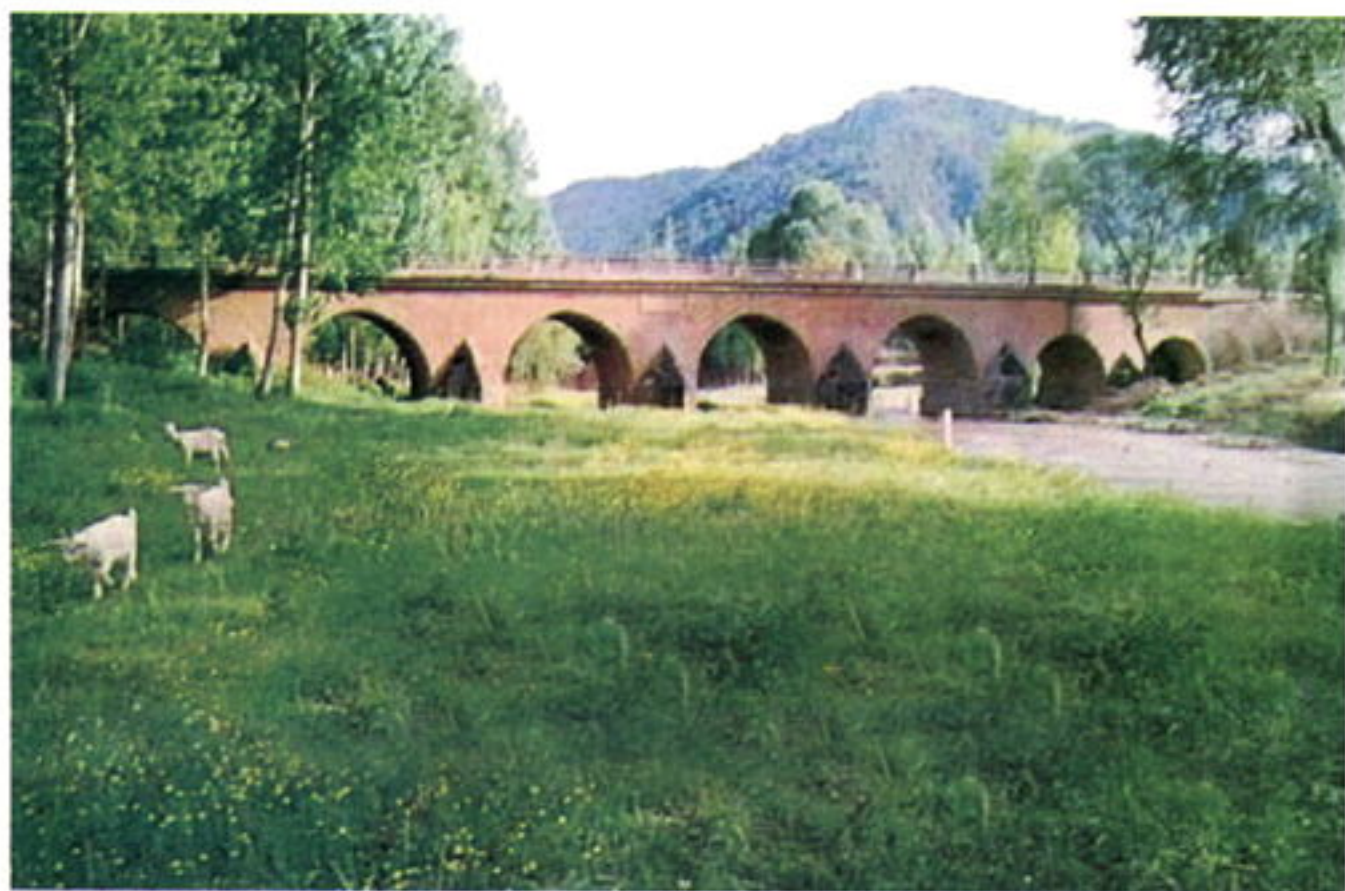
旬邑起义英雄纪念碑



陕北公学分校女子队在看花宫



西野解放旬邑县城



马栏七孔石桥



马栏转角



关中八一剧团演出



修缮的关中地委、陕西省委、关中军分区旧址



关中分区野战医院旧址（位于今马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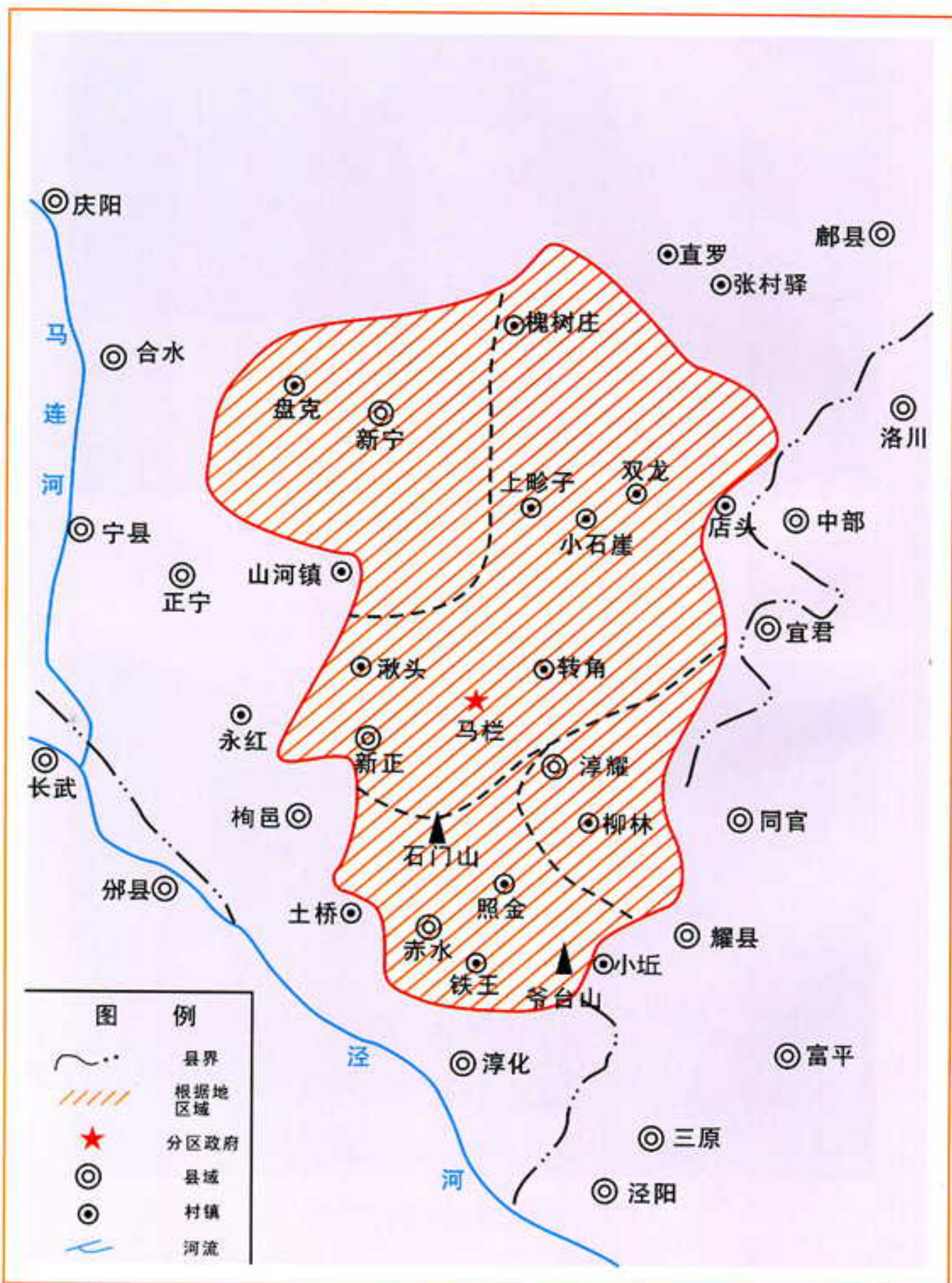


马栏革命烈士陵园



马家堡旧址牌楼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略图（1943年）



序 言

中共咸阳市委书记



马栏,位于公刘故里旬邑东北,山峻林密,粮丰物裕,自古为养军屯兵之地。这里,曾见证了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培育了数以万计的革命英才,书写了辉古耀今的历史篇章。到咸阳工作以来,我多次来到马栏,瞻仰革命遗址,接受红色教育,感悟马栏革命精神。每当走进马栏,面对巍巍的马栏山、完好无损的七孔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大礼堂和会议室,自己都会被一种精神所震撼和感动,思想都会受到一次冲击,灵魂都会得到一次洗礼。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斗争激烈的艰苦环境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贾拓夫、汪锋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克服重重困难,历尽千难万险,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奋斗之歌。其中所蕴含的对理想的执著、对革命的激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在艰苦环境中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不由得让人心生感念,感念那段不平凡的岁月,感念革命先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深知,这是马栏革命精神最本真的东西,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她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必将成为激励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马栏革命简史》以时间为轴,以史实为据,自辛亥革命爆发切

入,从中共旬邑党团组织建立发端写起,至关中国统区全面解放而终,浓墨重彩地记述了马栏与旬邑、与关中、与陕西、与全国的革命互动,全景展示了革命战争年代恢弘大气、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真实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献身革命、奋斗不息的丰功伟绩。品评《马栏革命简史》,那一笔笔珍贵详实的革命史料,那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深情追忆,那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无一不体现着编者对历史的负责、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祈愿。从中我读懂了马栏之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更为深刻地感悟到了顽强奋进的民族精神,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这样的党史文本,其价值不止于丰史补缺、让人们全面感受和认识历史,更在于其融思想性、鉴赏性、教育性为一体,蕴涵了积极的教育意义和激励效应,使之成为资政育人、泽被后人的鲜活教材。在中国共产党诞辰九十周年之际,《马栏革命简史》的编辑出版,无疑是我们对党、对老一辈革命先烈的最好献礼。

今天,随着“十二五”的扬帆起航,咸阳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先辈们奋斗的身影已经远去,但他们的足迹还在,他们的精神永存。接过先辈的接力棒,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和重要责任。我们要全面继承、发扬和发展马栏革命精神,始终高举伟大旗帜,坚定理想信念,在党爱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以出色的工作业绩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切实增强宗旨情怀,树立服务意识,贴近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弘扬艰苦奋斗作风,矢志改革创新,热爱咸阳、建设咸阳、发展咸阳,在加快西安(咸阳)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目 录

前 言	(1)
-----------	-------

史实篇

第一章 马栏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形成	(9)
第一节 中共柞邑党团组织的建立	(11)
第二节 中共柞邑党团组织的活动	(12)
第三节 大革命低潮下壮烈的柞邑农民起义	(15)
第四节 武装斗争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20)
第二章 关中特区的成立和发展	(36)
第一节 关中特区的成立	(37)
第二节 关中特区的反“围剿”斗争	(44)
第三节 关中特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47)
第三章 关中分区的建立与发展	(55)
第一节 关中分区的成立及两次党代会	(55)
第二节 关中分区的政权建设与政治改革	(61)
第三节 关中分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69)
第四节 关中分区的军事斗争	(99)
第五节 关中分区的经济建设与大生产运动	(111)
第四章 中共在陕西国统区的工作	(122)

第一节	中共关中地委的成立	(123)
第二节	中共在国统区及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的工作	(124)
第三节	建立红色交通线	(130)
第四节	策动国民党地方党政军起义	(133)
第五章	关中分区的保卫斗争	(142)
第一节	关中分区的发展壮大	(142)
第二节	关中分区保卫战	(146)
第三节	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147)
第六章	解放关中	(153)
第一节	收复关中失地	(153)
第二节	解放关中国统区	(158)
第七章	革命老区人民的贡献	(164)
第一节	踊跃参军参战 壮大游击力量	(164)
第二节	开展拥军优属 密切军民关系	(165)
第三节	提供军需供应 积极支援前线	(167)

组织篇

马栏革命史部分党政军群组织沿革序列	(173)
-------------------------	-------

人物篇

刘志丹	(187)
谢子长	(188)
习仲勋	(189)

汪 锋	(192)
张德生	(194)
张仲良	(195)
赵伯平	(196)
文年生	(197)
高锦纯	(198)
贾拓夫	(200)
张邦英	(201)
王世泰	(202)
霍维德	(203)
欧阳钦	(204)
陈国栋	(205)
张鹏图	(206)
蒙定军	(207)
崔廷儒	(208)
许才升	(209)
吕佑乾	(210)
王浪波	(211)
吕凤岐	(212)
程国柱	(213)
程永盛	(214)
王廷碧	(215)

回忆篇

习仲勋同志谈关中党史(节选)	(219)
----------------------	-------

回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节选)	王世泰(227)
回忆关中特委	张凤岐(236)
回忆关中地委	师 源(238)
回忆关中分区	陈国栋(239)
忆旬邑、淳化县八路军办事处	薛和爽(241)
四七年陕甘边区战地随军记	万士杰(242)
回忆关中师范师生参加修建马栏大礼堂	任应斌(247)
忆边区大生产片段	王金印(251)
合围与合围后的新正县	张西岷(254)
智勇穿越封锁线	
——忆我地下工作同志的斗争事迹	崔志文(264)
我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董策丞(268)
新闻战线上的一名小兵	
——回忆在关中报社的日子	张振西(270)
关中八一剧团的战斗历程	王小民(281)
我的陕甘宁边区童年情结	于兴学(291)

附 录

马栏革命简史大事记(1924 - 1949)	(303)
马栏革命简史参考书目	(334)
后 记	(337)

前 言

旬邑,古称豳,夏末公刘在此立国,秦封邑,汉置县,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旬邑位于咸阳市北部,外接耀州、彬县、淳化、正宁,辖11个镇、3个社区、187个行政村,总人口28.1万,总面积181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7293公顷。旬邑战略地位重要,自古是兵家必争地。其兵史上下数千年,波澜壮阔,蔚为壮观。旬邑是红色革命根据地。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爆发过声震渭北、影响全国的旬邑农民起义。其治下马栏镇,距县城53公里,处陕甘宁边区南端,地形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森林茂密,地势险要,自古是养军屯兵之地;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更是国共两党两军交锋必争之地,作为边区重镇,马栏革命根据地功绩卓著。

马栏革命根据地曾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马栏时称“小关中”,是关中分区的“心腹”。虽然马栏面积不及“大关中”的八百里秦川,但其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明显。马栏位于陕甘宁边区南端,东临咸(阳)榆(林)公路,西接西(安)兰(州)公路,距省府西安仅一百余华里。它曾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南部屏障,更是其近距离俯视泾渭、剑指西安的前进基地,也是许多革命青年北上延安的重要通道,还是我党我军购运战略物资的必经之路。正因如此,国共两党两军才视其为战略重地而互不相让,封锁与反封锁、磨擦与反磨擦、革命与反革命的战火才在这里持续了二十多年。

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在中共陕西各级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关中分区军民以山林为屏障,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反围剿战斗,保卫了延安、保卫了党中央,守卫了边区的南大门,使红色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马栏革命根据地曾是孕育中国革命英才的红色摇篮。抗日战争时期,党和边区的革命干部,大多数出身工农,文盲比重很大,普遍缺乏马列主义基本修养,虽有革命积极性,但也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尽管此时从全国各地奔赴边区的革命青年普遍有学识和爱国热情,但绝大多数青年尚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适应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直至抗战初期,关中分区还尚无一所中等学校。为了提高革命干部的觉悟与能力,以给中国革命培养急需干部,并尽快适应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边区党组织在旬邑这个革命青年奔赴延安的必经要地,从1938年至1948年,这十年间,先后有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抗日荣誉军人学校和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4所革命学校在此办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众多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鲁迅师范在马家堡(今旬邑县职田镇辖)办学一年零四个月,累积培养学生300多人,成为了抗战初期“为争取国防教育之模范”。陕北公学1938年7月在旬邑看花宫设立分校,总校1939年1月从延安迁来看花宫与分校合并。陕北公学在旬邑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办班54个,培养抗战干部6000多名,吸收新党员3000多人。1938年底,抗日荣誉军人学校迁到旬邑坪坊一带。这所肩负着伤残军人康复使命的革命学校,在旬邑办学一年多时间,不但使数万伤残荣誉军人的身体得到了康复、精神得到了新生,还使他们提高了文化水平、学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从而重新走上了

革命和建设的战场。其中很多同志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成为了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40年3月,边区为培养区乡干部和加强小学师资力量,在旬邑马家堡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二师在旬邑办学八年多时间,先后六次搬迁、七次建校,历尽艰难坎坷,培养学生889名。在经受着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军事磨擦、实行军事封锁、革命形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坚持“敌来我走,敌走我办,边走边办”的方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中国革命培育了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从这里走出的学员,被分配到了全国的各个抗日战场和各条战线上,为抗日战争和革命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栏革命根据地曾是关中分区的指挥中心。从1937年春陕甘宁边区关中特区(1937年10月改称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迁驻旬邑马家堡起,到1941年陕西省委、关中分区机关分别迁驻旬邑马栏,马栏从此成为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首脑机关驻地和首府,并成为陕西国统区地下党组织一切工作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直至1949年5月各首脑机关迁离,马栏作为首府存在了近十个春秋。这十年间,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工委、中共关中地委领导分区军民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人民支前运动及关中国统区工作,发展了生产和贸易,满足了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军民所需,建立了广泛的统战关系,策动了众多武装起义,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计划,把马栏建设成了关中分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46年至1947年,中共路东工委、路西工委、西府工委和河南省委、山西省委先后迁驻马栏办公,马栏曾一度成为陕西革命大本营。

马栏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及发展过程中也几经得失、历尽坎坷,伴随中共中央在延安领导的中国革命一起沉浮、一起发展、一起走向胜利。马栏既是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的一个缩影,又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栏岁月虽已远去,但马栏革命精神却永驻人心。正如原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王世泰所说:“马栏是一块血染的土地,马栏的森林曾掩护过战士的躯体,马栏的窑洞曾经住过中央首长,陕西、河南、山西省委先后在这里办公。如今,那巍巍的青山还在,那破旧的窑洞还在,那为信仰而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还在,先烈的英雄业绩还在这里闪光,这一切,必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而不懈努力。”

《马栏革命简史》概括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中分区、陕西省委、关中地委及旬邑地方革命的民主斗争史。本书结构分前言、史实篇、组织篇、人物篇、回忆篇、附录六个部分。全书主要通过史实篇的七章,全面、客观、概括地记述了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建国前夕这段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坚强而正确地领导下,英雄的旬邑人民不畏强暴、不甘屈服、不怕牺牲,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走过国民大革命的低潮,穿过抗日战争的血雨腥风,顶着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最终赢得全县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伟大胜利的一部气势恢宏、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书中同时客观再现了在旬邑这片土地上关中特区、关中分区、关中地委、陕西省委指导全分区、全陕西的革命斗争历史,集中展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尽力做到了脉络清晰、史实确切、事实清楚、内容充实、

人物鲜活、文风朴实、表述适当。本书可说是我县一部史料翔实、观点准确、结构严谨、较为成功的地方党史专著。

让历史告诉现在,让历史启迪未来。旬邑人民必能继承革命传统,以坚定信念和满腔热情建设和谐家园,谱写出更加壮丽的时代新篇章!

史 实 篇

第一章

马栏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形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揭开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帷幕。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联合哥老会和西安新军,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义军奋力攻下了清政府巢穴满城,起义取得成功。新成立的军政府——秦陇复汉军,次日即将起义消息通告全省。三水县(1914年改为栒邑县,1964年改为旬邑县)是当时响应西安革命最早的县份之一。

三水县地处咸阳北部山区,梢林茂密,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便于革命党人集结和活动。1910年,泾阳“水榭亭”会议之后,邹子良、王守身来到马栏山开矿冶铁造手榴弹,并招纳外地来陕的革命党人,使三水马栏成为陕西革命党人活动的地区之一。

当时,满清王朝腐败无能,对外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榨人民;地方官绅也如狼似虎,肆意侵吞百姓财物;群众对清廷的统治积愤已久,以“不用掐,不用算,宣统只有两年半”的歌谣,从舆论上对其进行瓦解。

1911年7月,陕西哥老会首领张云山派人到三水县发展哥老会成员,首先在张洪镇发展了张宝藏等20人,建立了三水哥老会组织,组织起了一股以罗天兴为首领的三水反清力量。11月2日,为了响应西安起义,罗天兴带领哥老会成员和革命党200余人组

成徐字营,一举攻破三水县城,光复了三水县。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以哥老会成员为主要力量的三水反清势力,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在三水的统治,并配合陕西新军(又称秦陇复汉军、民军、革命军)胜利击退了清廷甘军对三水的进犯,对钳制甘军南下及稳定西北革命局势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期,三水县总体属于北洋军阀控制区。当时,反动军阀在政治上,专横跋扈,结党营私,肆意压制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大开烟禁,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在军事上,穷兵黩武、纵匪殃民,以致兵连祸结、生灵涂炭。而在社会上,地方官僚、劣绅土豪也是相互勾结,关系盘根错节,层层盘剥人民,致使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加之,水涝、旱灾、饥荒相继为害,广大人民因此更加饥寒交迫,痛苦不堪。严酷的现实促使枸邑有识之士和知识青年提前觉悟,并认识到要救国就必须寻找新出路。于是他们纷纷外出求学,探寻救国救民之道。他们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后,又通过多种方式将新思潮传回枸邑,有力地推动了枸邑广大青年的思想解放运动。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运动的冲击和影响下,陕西人民因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引导而逐渐走向觉悟。当时旅京学习的陕西籍、咸阳籍学生刘天章、李子州、杨明轩、郝梦九(郝祖龄)、魏野畴(魏风标)大都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同时,在西安新民中学、成德中学、单级师范、中山学院上学的枸邑有志青年许才升、宁克齐、张金印(张慕陶)、王日省、蒲玉阶也积极参加了反封建反军阀斗争的学生运动,在三原上学的张金印还加入了共进社。他们在中共党员教师魏野畴、雷晋笙、吕佑乾的教育和引

导下,不断接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新思想,进而有了更明确的革命方向和更坚定的革命信仰。取得进步后,他们返回栒邑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第一节 中共栒邑党团组织的建立

1926年初,栒邑籍学生许才升、宁可齐、王日省等在西安就读期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共产党员王佛宗(王佛忠)到栒邑县宝塔高级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进步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4月,王佛宗秘密发展进步教师王子健和学生马富贞、赵廷保加入了党组织,成立了中共宝塔高级小学小组,组长王佛宗。宝塔高级小学党小组直属中共西安地委领导。

8月,许才升等在中共西安地委指示下,以筹建国民党栒邑党部之名回到栒邑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了崔维俊(崔金兴)、崔廷儒(崔景岳、崔运乾)、程永盛、马玉竹等9名学生党员。9月,许才升等在宝塔高级小学党小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栒邑特别支部(简称中共栒邑特支)和中共宝塔高级小学支部,由许才升任特支部书记兼党支部书记、程永盛任组织委员、王子健任宣传委员。中共栒邑特支1926年9月隶属中共西安地委,1926年12月隶属陕西党团联席会议,1927年2月隶属中共陕甘区委,1927年7月隶属中共陕西省委。

在成立中共栒邑特支的同时,又发展了一批青年团员,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宝塔高级小学团支部,由崔维峻任团支部书记。

枸邑特支成立后,各种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并在特支的领导下蓬勃发展。

第二节 中共枸邑党团组织的活动

中共枸邑党团组织建立后,在上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学生和各界群众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反帝爱国运动和农民运动,为以后的武装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926 年秋,中共枸邑特别支部以宝塔高级小学为基础,在学生中开展新文化运动,提出“看书、信仰、言论、集会、结社、择师自由”的口号,校长蒲伯鼎极力反对,斥之为“胡闹”,中共枸邑特支书记许才升和共产党员宁克齐等鼓动宝塔高小学生会向旧势力作斗争,发动罢课,夺了校长的权,赶走 3 名守旧派教师,清算学校账务,烧毁了反对书刊,查出 400 多元被贪污,并成立了宝塔高小校务委员会,许才升任校务主任,宁克齐任教务主任,实行民主治校,学生不仅取得了应有的权利,且公开发行《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公开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把这所昔日宣扬反动复古思想的学校改造成为中共枸邑特支开展工作的坚强阵地。

1926 年农历六、七月间,中共西安地委派徐景林协助许才升回枸邑做党的工作和领导农民运动,在学生和农民群众中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建立农民协会,使农民运动在全县范围内蓬勃发展。10 月,徐景林和许才升等同志,在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下,根据全国大革命形势的发展,积极组织领导枸邑县农民运动,发动三河(焦家河、崔家河、连家河)群众和进步青年及县城附近的贫苦农民约

200 多人,进行游行示威,向政府请愿,迫使县长鱼节天答应了农民群众的要求。次年农历二月,正值柤邑地区青黄不接、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之时,国民党省府派人到柤邑预征公粮,因农民无力缴纳纷纷要求减免,于是中共柤邑特支书记许才升以国民党党部和农民协会主席身份,带领十多名各界代表向县府交涉,陈述农民困难,并联合各组织向国民党省府写报告,最后减免了很大一部分小麦预征任务,减轻了农民负担。

1926 年秋,根据陕西省农民协会的指示精神和中共柤邑特支的决定,柤邑县农民协会在县城召开成立大会,不久职田、太峪、张洪、土桥、底庙、清原等 6 区农民协会也先后成立,农协会员迅速发展到 1000 余人。在区农协领导下,农民学会自卫团、自卫队先后普遍组建起来,以大刀、长矛作武器,打击土豪劣绅,保护农民利益。同年冬,农民协会在魏洛村举办了“贫民夜校”,在县城宝塔小学举办了“平民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破除封建迷信,接受革命思想,为农民运动培养了骨干。魏洛村贫民夜校为该村建立党组织作了思想准备,次年 3 月,中共魏洛支部建立,成为柤邑县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与此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共产党员王佛宗在县城树起“非基”旗帜,组织学生上街宣传,与外国传教士进行辩论。随后,又在学生中深入开展了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的大讨论。1927 年农历 3 月,在柤邑县城古骡马大会期间,基督教传教士公然搭棚、摆摊,大肆宣扬唯心主义,发展教徒。对此,中共柤邑特支领导宝塔高小学生与帝国主义的传教士进行激烈的辩论,并当即拆了棚,没收了招牌,揭露了他们披着宗教外衣侵略中

国的本质,使基督教活动在柞邑无法开展。3月18日,县城举行了“三·一八”纪念大会,到会者千余人,声讨了北洋军阀段祺瑞的罪恶行径。4月28日,柞邑特支借国民党县部之名在县城举行纪念革命先驱李大钊烈士大会,3000多名教师、学生、商人、农民和县府职员参加,会上特支领导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言,控诉北洋军阀的残酷暴行,颂扬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五四”纪念日组织县城师生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五卅”二周年紀念大会,规模更大,城乡约有6000人参加,共产党员宁克齐、徐景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极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

就在革命斗争进程日益走向深入之际,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发动政变,叛变了革命。紧接着,冯玉祥在陕西省“清党”反共,镇压工农运动,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1927年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临危成立。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国内政治形势、保护好各级党组织,继续积蓄力量,陕西省委将党的活动方式由半公开化转为了秘密状态,把工作重心移向了农村,以派驻省委特派员分赴各地指导工作的方式,来减少省委与下级党组织的直接联系。因此,在西安暴露了身份的中共党员吕佑乾(吕永坤)、吕凤岐、王浪波、蒲玉阶被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到柞邑开展党的工作。10月,中共柞邑特别支部更名为中共柞邑区委员会,书记为吕佑乾,组织部长为吕凤岐,宣传部长为王浪波。中共柞邑区委下辖5个党支部,57名党员和1个团支部。面对着柞邑的恐怖形势,中共柞邑区委即时隐蔽了组织,改变了活动方式,把公开活动变成了秘密活动,将党的骨干宁克齐等人转移到了外地,除王日省、王子健还继续留在国民党柞邑县党部任职外,其余

革命同志全都退出了国民党,保存了力量。当时,中共柭邑区委的据点设在宝塔高级小学,吕凤岐、王浪波在宝塔高小以任教作为掩护。吕佑乾则化装成笔商,对外统称“刘笔客”,以卖笔为名,巡游各地进行联络。

1927年秋末,国民党陕西省委派来庞天赖主政柭邑担任县长。庞天赖一上任,就勒令解散农会、加派粮款、侦缉共产党员、羁押进步群众,大搞白色恐怖。12月,中共党员王廷碧、王日省、王子健等和部分群众先后被捕,遭受了严刑逼供和百般折磨。党的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遭到巨大破坏,革命力量损失严重。柭邑的革命形势急速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暂时进入了低潮。但是,经过了斗争锻炼的柭邑党团组织和党团员们,在进行了认真反思后,从大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总结了极为深刻的经验和教训。这为他们今后在新的革命洗礼中经受住严峻考验,成功带领柭邑人民走上革命复兴之路奠定了必要的经验基础。

第三节 大革命低潮下壮烈的柭邑农民起义

1927年,柭邑县发生了大面积、长时间的干旱,以致春荒严重,农产品普遍歉收。到1928年初时,柭邑县农村已经十室九空,饥民只能以树皮、草根度日来维持生命。加之国民党柭邑县政府横征暴敛,当地豪绅地主逼租讨债、落井下石,农民境遇雪上加霜,负担日益加重,怨愤之声不绝于耳,啼饥号寒者不绝于途,穷苦百姓急切盼望着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

1928年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第二十六号公告》。

公告指出：“在我党目前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下，陕西各级党部，应如何地努力于鼓动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号召“农民武装起来，组织农民革命军，发动暴动，打倒豪绅、地主、官吏及一切反动派，反对军阀战争，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在部署关中地区武装暴动时，省委将柞水县划归给了渭北区。在该公告精神的鼓舞下，5月1日，震撼陕西的渭华起义爆发了。

面对这种状况，中共柞水县委根据省委公告精神，加紧了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许才升该月去省委联系工作时，接受了省委要求组织武装起义的指示。途经三原时，他与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秉仁研究了暴动的部署，随即返回了柞水，并向区委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区委书记吕佑乾随后在安仁村龙王庙召开了县城附近党员大会，向与会党员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分析了发动农民起义的主客观条件，并揭露了反动派的本质与罪恶。就在这时，程永盛派人给他们送来了信件。信中说：省上派来的催粮委员梁武，同当地恶绅程茂育串通一气，在坚持抗粮抗款的清原郝村，威胁农民交粮交款。对交不起粮款的农民，梁武不但鞭打绳拴，还威胁农民说“我一手拿的生死簿，一手拿的勾魂笔，叫谁死就得死，叫谁活就得活！”国民党柞水县政府更是火上浇油，不但派军警入乡勒索，还拉夫拉丁，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极大愤怒。

5月5日晚，许才升等在建立党组织较早、群众基础较好的清原乡郝村药王庙召开了党员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号召农民团结

起来、推翻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并对发动农民起义作了部署,即在第二天中午,以鸡毛传贴的方式,动员农民开始“交农”。

5月6日,许才升等派人通过鸡毛传贴、击鼓为号的方式,以抗粮“交农”为口号,发动起清原乡18个村共140多名农民,以镢头、铁锹、大刀、长矛等为武器,集结于郝村药王庙,举行了起义。义军在处决了郝村恶霸地主程茂育和省府催粮委员梁武后,在许才升等率领下,由郝村向县城星夜进发。途经吕家村时,义军没收了恶绅吕善堂的财物(吕外逃);到达赵家村时,起义农民已有400余人。为了顺利攻下县城,许才升在赵家村专门召开了会议,部署了具体的攻城方案,并对起义农民军进行了编队。在行至坡头塬畔时,义军点燃了火堆(攻城信号),城中我方内应于是砸开了东城门铁锁,使起义队伍在7日拂晓胜利占领了县城。

起义队伍进城后,遵照许才升事先安排,兵分三路展开行动。一路由程国柱、程双印带领,占领了粮秣局,杀死了县府4名粮食官员,打开粮仓救济了穷人;一路由许才升、程永盛带领,直捣县府和监狱,查收了县府的印章和档案,砸开了监狱大门,并救出了饱受摧残的共产党员王日省、王子健、王廷碧及几十名群众;一路由程百印、程群儿带领,攻入了天主堂和福音堂,赶走了居住在那里的神甫、洋人及劣绅头目王兆贤。同时,起义队伍将在县政府搜出的白银当场分给了群众,并发动青年学生上街刷写标语、散发传单;还在东街召开了群众大会,斗争了新任县长李克宣。李克宣本应当众处决,起义队伍因其到任不久、劣迹亦少,遂将其关押在兴盛德商号内。李克宣后因对辩理群众态度蛮横,被处决于商号内。

5月8日,许才升带领数百名起义农民返回清原,一面进行整

顿,一面组织铁匠打造刀矛等武器。吕佑乾、吕凤岐、王浪波则带领部分起义农民在县城开仓放粮,救济贫困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维持社会秩序,并积极筹备成立苏维埃政府。

起义队伍在清原整顿了3天,许才升挑选出青壮年200多人,编成了苏维埃红军渭北支队,在5月11日返回了县城。当天,吕佑乾主持召开了党委会议,成立了中共柭邑县中心支部作为起义的指挥机构,并决定建立柭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5月12日,起义群众在县城召开大会,宣布柭邑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由许才升任主席、程永盛任工农革命军总指挥。苏维埃政府下设秘书、军事、土地、经济、交通、宣传、外交及革命裁判委员会这8个机构,由吕凤岐任秘书主任、程永盛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程百印任土地分配委员会委员长、蒲玉阶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程国柱任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王浪波任宣传委员会委员长、王日省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程雨顺任革命裁判委员会委员长。柭邑临时苏维埃政府将起义队伍改编为渭北支队,下设了三个连:一连连长程永延,二连连长程双印,三连连长程子英。临时苏维埃政府设在宝塔小学内,中心支部也设于此,吕佑乾为支部书记。

柭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发展革命力量、扩大起义成果,许才升率渭北支队第三连进驻了离县城十公里外的张家村,活动于太峪(今旬邑县太村镇)、职田、底庙一带,吕佑乾、吕凤岐则率第一连、第二连驻在县城,并分头到土桥、张洪等村镇,宣传革命道理,并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粮物来救济贫民。起义队伍所到之处,农民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土豪劣绅则闻风逃窜。柭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县,并波及到了邠县、淳化、永寿及甘肃宁县、灵台

等地。

柞邑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国民党反动当局非常紧张。邠乾区行政长官刘必达,一方面暗中收买奸细来瓦解起义队伍;一方面派李焕章来柞邑代理县长,并令其率军警、民团反攻柞邑县城。5月30日拂晓,敌军攻入县城,通过收罗叛徒和内奸,来瓦解起义队伍、捕杀起义人员。刘兴汉、程振西、郭金科、连怀印等变节分子遂发动叛乱,闯入临时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宝塔小学,将吕佑乾、吕凤岐、王浪波、王廷碧、程永盛等人逮捕。因公外出的程国柱,在早晨回城后也遭到被捕。紧接着,刘兴汉等变节者到张家村,以请许才升下县商讨应变之策为名,将其骗出后,用矛戳伤其腿部,再施以捆绑。程百印闻讯后,立即率部分群众在崔家河展开阻击营救,但因寡不敌众而失败。31日,吕佑乾、许才升、吕凤岐、程永盛、王浪波、程国柱、王廷碧7位起义领导人在张洪镇英勇就义。就义时,他们面对屠刀,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让人尊敬。起义失败后,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带领幸存的30余人,转入柞邑石门山区,正式成立柞邑游击队,进行游击斗争。

柞邑农民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在陕西革命史上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柞邑农民起义冲破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它高举革命大旗,用革命的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撼动了国民党在柞邑县的统治基础,为之后的革命斗争指明了道路、积累了经验。特别是许才升等起义领导人在敌人屠刀下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表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品质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鼓舞着柞邑人民革命的斗志。

枸邑起义失败后,中共枸邑区委也遭到了严重破坏。1929年初,外出隐蔽的崔维俊、崔廷儒、蒲玉阶、第五伯昌等回到枸邑,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建立了中共枸邑特别支部,由崔维俊任书记。3月,按照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指示,中共枸邑特支首先整顿恢复了原先党的基础较好的郝村、魏洛、县城、东涧4个党支部;之后,又建立了嘴头、芝村、义阳3个党支部;共有党员40多人。同时,中共枸邑特支还领导着淳化县白庙乡薛家党支部。到1932年秋,中共枸邑特支又先后建立了张洪、王家、安乐、井坳4个党支部,下辖支部发展到13个,党员发展到121人。为了加强领导,中共枸邑特支于是建立了西区(张洪)、南区(土桥)两个区委。西区区委下辖魏洛、皇楼、张洪、赵家屯庄、关道嘴5个党支部;南区区委下辖安乐、井坳2个党支部。其余6个党支部直属特支领导。枸邑的基层党组织在整顿中得到了发展。

第四节 武装斗争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用革命的武装打击敌人,广大人民群众在“唯有夺取武装,才能夺取政权”的思路下,建立起自己的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巧妙地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灵活地运用着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和消灭着敌人,并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改编成陕甘游击队,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开展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武装斗争。

枸邑游击队的成立和战斗

枸邑农民起义失败后,乌云一度笼罩着枸邑大地。英雄的枸

邑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和血腥屠杀所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投入了战斗。保存下来的起义力量,在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的带领下,进入石门山区,在七界石整编为柛邑游击队(也称三水游击队),由吕振邦任队长、程双印任副队长、第五伯昌任党代表、程百印负责对外联络、侯天佐任侦察排长,其下设4个小分队,以清水原为基地、石门山为依托,在柛邑、淳化、耀县、正宁等边界山区开展游击活动。

多数柛邑游击队员,出身贫雇农家庭,对豪绅地主有着刻骨仇恨。因此,打击土豪劣绅成为柛邑游击队一项重要任务。柛邑游击队经常去柛邑、淳化、邠县、正宁敌占区打击豪绅,先后打击了榆林子村孟宗智、后庄村李十一、早池村刘汉文、八王庄村邪鼻子、郝村程茂育、邠县炭店村王西录、邠县永乐村邹新孔等数十家地主。处决了苍儿沟村恶霸赵一方、赵栓娃父子,吕家村恶霸吕双全,赵家弯子恶差王洛儿。他们为民除了害,刹了地主豪绅的威风,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使游击队得到了生存和发展。1929年2月,吕振邦、程双印带领崔平元等7人,借张洪过腊八会之机,扮成逛会农民,趁敌不备混入驻军宿舍夺枪8支,出门后他们对空鸣枪,趁乱返回了王留石。同年,在侦知马栏豪绅张老六有枪后,柛邑游击队针对张老六住在悬崖陡壁石洞内易守难攻的特点,反其道而行,以集中山柴火烧烟熏的方式,迫使其缴出3支枪及若干子弹。谈家原村一财主给儿子结婚时,借来了一班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作保镖,柛邑游击队趁这班国军不备,将其全部俘虏并缴枪8支,在做完政治教育后将他们全部释放。

1930年前季, 柘邑游击队以围而不歼、迫其突围、留下物资之计, 将正宁县湫头民团30多人围在城中, 该团中计突围逃去, 柘邑游击队遂顺利入城, 并将该民团及当地劣绅的粮食、衣物分给了贫苦农民; 同年又偷袭了宜君驻马栏的夏玉山(夏老么)民团, 迫使其退至庙湾; 接着又袭击了扼守陕甘交界要道抢劫旅客的刘家店子民团; 后季又击退了来七界石围剿的何高侯部, 还俘其班长1名、缴获马拐枪1支; 冬季, 又在安子洼击退了妄图吃掉游击队的淳化某民团, 缴枪约8支。

自1928年成立到1930年同陕甘游击队整编, 柘邑游击队在山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缺粮时, 会严重到只能以打猎或采集野菜充饥; 经常风餐露宿, 还只能由家里供给衣服鞋袜; 枪支弹药缺乏时, 就从敌人手里夺。柘邑游击队员在群众大力支援下, 高度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 团结一致, 浴血奋战, 最终克服了种种障碍, 为缔造新的革命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及攻占职田镇

1930年9月, 柘邑游击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接上了关系, 经过初步整顿, 陕甘游击支队成立了。

1931年9月, 刘志丹将在甘肃合水、庆阳山区分散活动的三支民间游击队整编成南梁游击队, 并出任总指挥。1932年1月, 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改编成西北反帝同盟军, 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2月,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 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由谢子长任总指挥。中国工

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在地方党委配合下,长期活跃在南梁、马栏、照金一带,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反动力量,为创建陕甘边苏区、发展壮大各级党组织、不断推动武装斗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遵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成立后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立即挥师南下,开辟了新的游击区。1932年2月12日晚,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从三嘉原出发,向敌占区枸邑县职田镇进军。途经职田近郊时,活捉了乔景贤、马云鹏、王兆贤、董凤鸣(绰号油客)、吕善奎和张印昌等土豪劣绅。翌日拂晓,陕甘游击队扮作国民党张洪镇保安队打入职田镇城内,出其不意地捣毁了国民党职田区公所,活捉了国民党民团团长唐碧武和绅士唐德乔等人,焚烧了绅士局的账簿、粮册、卷宗,尽分了“田义和”酒坊400多石高粱。打入驻张洪镇敌警卫团并任七连连长的共产党员李明轩,及时送来了敌将“围剿”游击队的紧急情报。于是陕甘游击队当即决定撤出职田镇,并根据情节轻重,处决了罪大恶极的豪绅董凤鸣、释放了马云鹏、押走了其他豪绅,然后向阳坡头转移,并在阳坡头设伏。14日,杨虎城命令驻张洪镇敌警卫团三营和邠县、长武、枸邑三县民团千余人“围剿”职田镇。在职田镇城里扑空后,15日敌追至阳坡头时,与陕甘游击队的伏兵交了火。面对敌众我寡,陕甘游击队以迂回侧击、断其后路的游击战术完成了对敌的合围。激战中,任敌方连长的地下党员李明轩心生一计,调转马头,大喊“红军大部队来了,快跑!”,乱了敌方的军心和阵脚。霎时,敌军乱成一团、狼狈逃窜,陕甘游击队乘势进击,歼灭敌警卫团三营和民团一部,重新占领了职田镇。

此战,陕甘游击队歼俘敌军共 500 余人,缴枪 150 多支。这场以少胜多的歼灭战,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揭开了陕西革命新的一页。

陕甘游击队首克枸邑县城

1932 年 4 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攻打了山河县城后,驻正宁县寺村原做军事休整时,接到了中共枸邑特支提供的“枸邑城内敌警戒疏忽,兵力空虚,防守不严”的情报。据此情报,陕甘游击队委员会当即决定,乘机攻打枸邑县城。当时枸邑城内敌方武装仅有杨虎城部的一个连及文友栋保安团 50 多人和警察 20 多人、枪 100 多支。

4 月 17 日晚,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从寺村原出发,一夜急行军,于翌日拂晓兵临枸邑城下。谢子长在作完总体战斗部署后,亲率一大队和警卫队朝东城门发动进攻;吴岱峰率二大队乘敌熟睡之际,干掉了西堡子上的哨兵,并冲入堡内大喊“缴枪不杀”,俘虏了敌一个连和两个排,控制了西堡子制高点,接着在制高点的火力掩护下,攻占了西城门;一、三大队则集中火力进攻东城门。城中守敌及国民党枸邑县政府人员见势不妙,就逃进了北山上的魁星楼,陕甘游击队于是攻入城内。

陕甘游击队进城后,谢子长率军首先打开监狱,释放了无辜百姓;接着分发了地主高万安的粮食,慰问了革命烈士家属许才升之弟许乃升。然后又令宣传队在街上刷写标语,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之后于庙门前召开群众大会,并亲自作了讲话。最后,焚烧了国民党枸邑县政府的卷宗、账目和一老衙门。当日傍晚,陕甘游击队主

动撤离了枸邑县城,兵分两路回到马家堡作了军事休整。

此战陕甘游击队共俘敌百余人,缴枪百余支。枸邑县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攻破的首座县城,中共领导成立的西北革命武装力量的威力初步展现。

陕甘游击队三、五支队的西进和南下

陕甘游击队的接连胜利,使红军的影响得到迅速扩大,引起了国民党的震动,于是国民党陕西杨虎城部、井岳秀部调动大批军队前来围剿。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3月7日作出了《关于红军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要求将陕甘游击队分为三、五支队,深入渭北和西路,配合农民斗争,开辟新苏区,把敌人拖到外线去。

1932年4月18日晚,陕甘游击队集结在枸邑县马家堡村休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在此作了巡视工作。对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的主要成绩,杜衡不作全面评价,反倒把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指挥员身上。杜衡诬蔑谢子长执行的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路线,错误的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并命令谢子长去甘肃省榆中县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陕甘游击队也被杜衡分成了三、五两个支队,各自独立活动。第三支队由二大队、骑兵队和部分警卫队组成,刘志丹任队长、李杰夫任政委、吴岱峰任参谋长;第五支队由一大队和警卫队余部组成,阎红彦任队长、黄子文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之后,第三支队奉命西进到邠县、永寿、乾县、醴泉一带,破坏西兰公路,进行反“围剿”斗争;第五支队则奉命南下到三原武字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壮大武

字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

4月21日,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近200人,兵分两路西进。骑兵40多人,出邠县、过泾河、直驱永寿,于监军镇一举攻破了永寿县城,歼敌20多人,并向五峰山挺进;步兵140余人,出邠县骞家河渡口、过泾河、直奔五峰山,与骑兵会合。第三支队以五峰山为据点,展开分股游击,相机消灭着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反动势力,发动着群众,筹集着粮款,壮大着支队力量。4月30日,第三支队袭击了永寿县常宁镇民团,缴枪50多支。接着,第三支队分兵袭击了醴泉县北山区南坊镇和叱干镇民团;第三支队用步兵迂回到五峰山南麓,攻打南坊和乾县的民团与土匪武装;第三支队的骑兵则在刘志丹率领下去打击叱干镇民团。

4月18日晚在马家堡分编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在阎红彦、黄子文、杨重远等率领下,星夜兼程南下三原武字区(杜衡亦随五支队同行)。4月21日,第五支队经耀县白草坡到达了三原县武字后区。当晚,武字区委决定并组织起农联会员等武装力量,配合第五支队攻打了马额镇郝家堡民团(即王茂臣民团)。第五支队在深夜登墙入城、砸开城门后,方知王茂臣已带民团由暗道逃跑了。4月22日中午,中共武字区委在文龙堡(火烧庙)召开了欢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陕西省委代表、第五支队的干部战士和各界团体群众3000余人。大会执行主席黄子文致了欢迎辞,陕西省委书记杜衡讲了话,各团体及第五支队代表分别发了言。大会共作出五项决议:一、成立武字区革命委员会,由武字区党组织、游击队、农民联合会代表共七人组成,责成革命委员会颁布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和决议。二、在耀县西原和三原心

字区,分两队开展分粮斗争。三、改组义勇军。四、取消国民党武字区公所、民团等一切机关,逮捕王茂臣区长。五、由武字区革命委员会向苏维埃中央政府、全国各革命团体、中共陕西省委等发通电(后因第五支队撤离及其他原因,武字区革委会未能正式成立)。4月23日清晨,为躲避敌军重兵进攻,第五支队转移去了陕甘边区。

为扑灭迅猛发展的革命运动和消灭日渐壮大的陕甘游击队,5月上旬,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急调十七路军警备旅孙友仁部第一团集结三原,警卫团到邠县,国民党陕西省保安第一游击支队司令何高侯部到枸邑,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集结陇东庆阳、合水、正宁一带,陕北井岳秀部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南下宜君,十七路军直属特务团跟踪追剿,合力“进剿”陕甘游击队第三、五支队。“进剿”势力拥有8个团的正规军和各个地方民团,形成了数倍于陕甘游击队的兵力优势与武器优势。

面对敌众我寡、军力差距过大的危急局势,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立即北上,把敌人拖到外线去,并任命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5月10日,陕甘游击队第三、五支队在枸邑县清原乡集结,宣布成立了总指挥部以统一军事指挥,由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总指挥部在分析敌情后认为,井岳秀部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分驻在黄陵、宜君、富县、洛川,兵力分散,距西安、延安较远,指挥迟缓,不易增援,是敌军的薄弱环节;加之所驻地是山区,利于游击斗争,且该地还有党的地下组织,群众基础又好。于是总指挥部决定:立即北上甩掉敌人,在向黄陵、宜君、洛川地区运动中伺机歼敌。陕甘

游击队总指挥部随即率队向北转移。在北上途中,陕甘游击队5月15日晚,在枸邑县马栏镇一举歼灭了井岳秀部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的两个连与当地民团,缴枪200余支;5月17日在凤凰山、五里镇、焦家坪连打3个胜仗,歼敌500余人,缴枪500余支。此后转战到了黄陵、宜君、富县、洛川地区。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成立及南下渭华

1932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陕西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作出了《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决定》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杜衡作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参加了会议。联席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议题时,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并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由杜衡任军政委。

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等赴陕甘游击队,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21日,杜衡等在香山与陕甘游击队骑兵连会合。迫于敌军追剿,陕甘游击队当晚连夜向北转移,经衣食村,于22日到达了杨家店子。杨家店子当时是个住着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南北山沟纵横、稍林密布,东西川道蜿蜒狭长,沿川道向西通往转角镇,向东五十里越过山梁就是焦家坪。

22日晚,杜衡在杨家店子主持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了中央和省委关于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指令,发表了就职演说,肯定了陕甘游击队的英勇和战绩;但却污蔑

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陕甘游击队领导人，指责他们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的路线错误，给他们强加了许多罪名。次日，杜衡又主持召开了指导员代表会，对刘志丹等同志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并作出了开除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党籍和军籍的决定。广大指战员对杜衡这种做法极其不满、极为反对，强烈要求取消给刘志丹等人的处分。杜衡迫于压力，撤销了对刘志丹等人开除党籍军籍的处分，调整了处分决定。即，给予谢子长党内留党查看三个月处分，给予阎红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谢子长和阎红彦离开部队去中央上海局受训（中央上海局后来查明了事实真相，撤销了杜衡给谢子长和阎红彦的错误处分）；刘志丹、杨重远则继续留在部队。改编部队过程中，为排挤原陕甘游击队领导人，杜衡提出：团长“不能从原指挥员中”产生，“必须在班长和战斗员中产生”，“党员大会选出3人，由政委任命1个”。经过党员大会选举，原步兵大队班长王世泰当选为团长。团领导人产生后，便按新编制组建了部队，确定了各级干部人选。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枸邑县转角镇（原属宜君县所辖）召开军人大会，举行了改编仪式。会上军政委杜衡宣布了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命令；任命王世泰为红二团团长，杜衡兼任团政委，郑毅为团参谋长；团部下设四处一团，团参谋处处长杨重远，团政治处处长刘志丹，团经理处处长刘约三，团管理处处长杨琪，青年团书记师克寿；团部下辖三个连，步兵连李亚夫任连长、李秉荣任指导员，骑兵连曹胜荣任连长、张秀山任指导员，少年先锋连王有福任连长、魏武任指导员；

全团共200余人,枪150余支,军马60余匹。大会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宣布了红二十六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和纪律,号召红军指战员为创建陕甘边新苏区而战斗。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组建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成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队伍。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既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军阀及其它反动力量,又扩大了红色革命武装的政治影响,还在群众中树立了党的威信,坚定了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的信心,为西北革命斗争继续走向胜利树立了一面鲜亮的战斗旗帜。

1933年6月26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出照金南下,途经淳化县桃渠原时,与淳化反动民团发生遭遇战,毙敌80余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取得了南下首场胜利,并于当日晚些时候到达了三原县嵯峨山二台子村。28日晨,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在黄子祥(黄云章)、杨声(刘映胜)率领下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会合。同日上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党委和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二台子召开联席会议,杜衡、汪锋(王烈)、王世泰、刘志丹、李杰夫、黄子文、黄子祥、刘映胜、张秀山等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杜衡假借陕西省委名义,决定部队南下渭华地区。同日下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到达武字区甘涝池村,杜衡在此宣布了二团南下指挥部领导成员名单:总指挥王世泰,代政委汪锋,参谋长刘志丹。当晚二团南下指挥部遂率部星夜兼程,经高陵、灞桥、临潼、蓝田进入渭华,去开创新苏区。

1933年7月中旬,南下渭华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行动失败,革

命队伍被敌人打散,刘志丹率领部分红军转入了秦岭山区。后来,黄子文在秦岭山区找到了刘志丹。在渭华党组织的帮助下,被打散了的革命同志和红军队伍陆续返回了照金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指挥部奇袭张洪镇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会议,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区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的方针,成立了以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的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来统一指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少年先锋队的500多人。

9月21日拂晓,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部向邠县世店镇进发,在途经枸邑县底庙塬时,发现了张洪镇民团去北塬搜查的50余人。王泰吉遂令步兵就地埋伏,骑兵由两侧迂回包抄,便衣队绕到其后截击。待其陷入伏击圈后,红军速战速决,当场处决了其队长张信山、马攀桂及民团训练员白国尧,俘虏52人,放跑1人,并从卧底宋飞处得知张洪镇守军现仅民团第二大队80余人,于是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奇袭张洪镇。紧接着,黄罗斌、王有福、齐石子、李得胜等近40名战士组成便衣队,换上了民团服装,扮成了民团团丁。

张洪镇当时是国民党枸邑县政府所在地,民富物丰,城墙坚固,驻有朱鸿章民团总部的两个大队130余人。朱鸿章民团分团则设在枸邑县其它乡镇,各分团团丁10余人不等,并设有监狱。

由宋飞带路、耀县游击队分队长陈国栋指挥、便衣队同行、大部队随后,在当日下午3时许,陕甘边区红军来到了张洪镇城门

口。在宋飞与守城团丁搭话之际,红军战士乘机缴了团丁的枪,部队于是进入城内。进城后,红军首先袭击了民团总部。团丁听到响动,胡乱放枪,乱作一团。宋飞乘机大喊“红军进城了,不要怕,快缴枪!”进行劝降,团丁见大势已去,便都缴了枪。接着,王有福、齐石子等人直奔民团副团长朱鸿章的住处,击毙了朱鸿章和他妻子;杨森、陈国栋等人则率众直奔县政府,在活捉了县长谢骞、党务宣传员吴信诚、承审员王维夏、科长曹又植、秘书兼收发员赵长赐、恶绅陆养纯、保卫团总书记蒲守哲、会计第五立让和朱鸿章之父等人后,处决了谢骞、吴信诚、王维夏、曹又植、赵长赐等12人,其后便破狱救民、连夜开仓分粮。

在这次奇袭张洪镇的战斗中,陕甘边区红军共击毙敌方14人,俘虏民团团丁150余人,缴获了120余支枪和20驮物资。9月22日拂晓,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众主动撤离了张洪镇,胜利返回了照金根据地。

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指挥部杨家店子保卫战

在1933年10月中旬照金革命根据地陷落后,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便率部于同月28日来到了枸邑县杨家店子村。29日拂晓,国民党井岳秀部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团加重连,在连长李文杰带领下,出衣食村驻地前来偷袭。红军骑兵队率先迎敌,排长吴可钧带领全排与敌展开了激战。在敌抢下山头将红军阵地完全暴露在敌火力之下时,总指挥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红四团团长黄子祥研究决定:黄子祥率红四团正面进攻,王世泰率部分义勇军由西绕过火烧山梁抄敌后路,吴岱峰、王英率30

余人强占后面两个山头以配合正面进攻。各部队于是分头行动。当敌军发现后路被截断后,便急忙退到山下岷岷。红军于是集中火力,上下夹攻,在打退敌多次反扑后,于日落时分全歼来犯之敌。

在杨家店子保卫战中,陕甘边区红军全歼来敌一个加重连,击毙了敌连长李文杰,缴枪 100 余支。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甘嘴村进击战

1933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同月 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宣布成立,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师党委同时成立,由杨森任书记;全师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两个团,第三团是步兵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及红四团少年先锋队编成,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骑兵团,由红四团编成,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全师共 500 余人,战马 200 余匹。1934 年 1 月,刘志丹、杨森分别接任该师师长、师政委。

1934 年 4 月 11 日,为避开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红军的“围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决定,由师长刘志丹、政委杨森率红四十二师撤离南梁根据地,到外线的关中及同官、宜君、耀县一带开辟第三游击区。

4 月中旬,红四十二师夜袭淳化县城未果,撤出战斗北上到十里原镇休整时,得到了配合行动的第三路游击队侦察员的报告,说

从枸邑县土桥镇出发去三原县的国民党军何高侯部的两个连计200余人正在甘嘴村休息,接着先行到达十里原镇的红四十二师骑兵团也发现了这股敌人,亦即报告了师部。师部当即决定消灭这股敌人,并下达了战斗命令。

4月22日12时,红四十二师两个团同时行动。骑兵团大部由赵家村向南冲击,少数骑兵在黄花山担任警戒;第三团主力从李家村西攻击,少先队从蒙家村攻击。战斗打响后,敌人惊恐万状,仓促应战,后龟缩到麦场的围墙内和沿沟畔的矮墙下顽抗。由于甘嘴村东、西、南三面环沟,北面接塬,加上土围墙给敌以屏蔽,易守难攻,红军战士多次冲锋均未奏效。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红军战士向敌人喊话,开展政治攻势,顽敌置之不理。正在这时,师政委杨森亲率骑兵一连从敌背后攻上来。只见杨森跳下战马,脱去上衣,手提马刀,携带两枚手榴弹,首先冲了上去。在杨森的带动下,红军战士们紧跟着冲了上去,土围墙很快被攻破,短兵相接,刺刀和马刀你杀我砍,敌人被砍杀数10名后不得不缴械投降。几个顽敌跳沟企图逃跑,数名红军战士穷追不舍,将逃敌击毙。

甘嘴战斗毙俘敌100余名,缴获步枪100余支和一些马匹。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削弱了敌人的武装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关于创造与发展陕甘边新苏区的指示精神,狠狠打击国民党地方兵团,先后占焦坪,克香山,出击枸邑、淳化、三原等地,接连取得胜利,逐渐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枸邑三县边界的革命武装割据区域。

1933年三、四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

员会、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相继建立。至此,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以南梁为中心的纵横三四百里的陕甘边苏区基本形成。

第二章

关中特区的成立和发展

1934年春,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陕西的富县、中部(今黄陵县)、宜君、耀县、枸邑、淳化和甘肃正宁、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为加强党对第三路游击区的领导,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于1934年9月决定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区南区,并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和陕甘边区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书记张邦英,区委机关驻中部小石崖,先后辖中共耀县县委、淳耀县委、赤水县委、新正县委及富县、中宜等县的党组织。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下辖富西、富甘、赤淳、中宜、宁县、正枸邠等县级政权组织。陕甘边区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陈国栋,政委张邦英,下辖中宜游击队、中宜独立营,淳耀第六支队,赤水第十二支队,正宁回民支队、正宁第五支队、第八支队,新正特务队、新正独立二营,宁县第一支队、第三支队等。1935年秋,富县、中宜等党政军组织改属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同时,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党政机关迁移到新正县三嘉原南邑村一带,并在辖区内开展了土地分配等工作,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10月,陕甘边区南区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陕甘边区南区苏维埃政府,秦善秀、张邦

英当选为正、副主席。随后,所辖各县政权组织相继建立。1935年12月,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陕甘边区南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撤销。

第一节 关中特区的成立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中共中央重新调整了西北苏区的行政区划,将西北苏区划分为陕北、陕甘两省,并决定设立关中、神府和三边3个特区。1936年1月,陕甘边区南区改称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5县。同时,在陕甘边区南区党政军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关中特区党政军组织。

关中特区党政军组织的建立

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 1936年1月,中共中央派贾拓夫等到达关中特区,在原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贾拓夫任书记,隶属中共陕甘省委领导。关中特委机关驻新正县南邑村,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和新宁5个县委。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贾拓夫、江华等党政军领导率大部武装北上参加西征。原决定留习仲勋负责特区工作,但接着习仲勋也被调往甘肃环县工作,中共关中特委暂时撤销。不久,汪锋、张凤岐、郭存信等建立了中共关中临时特委,汪锋任书记,所辖党组织未变。5月,中共陕甘省委撤销,关中临时特委改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9月,中共中央派习仲勋、郭炳坤、张策等回到关中,正式

恢复了中共关中特委，习仲勋任书记，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5个县委，隶属中共陕甘省委领导。12月，中共关中特委划归新成立的中共陕甘省委领导。1937年4月，中共陕甘省委再次撤销，中共关中特委改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0月，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改为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

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 1936年1月，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在原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主席秦善秀、副主席习仲勋、张邦英，隶属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5个县苏维埃政府。3月，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暂时撤销，但所辖的各县苏维埃政府仍继续坚持斗争。9月，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恢复（未设主席），隶属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领导。12月，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属新成立的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领导。1937年4月，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再次撤销，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主席霍维德，副主席封正宝。9月，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属陕甘边区政府领导。10月，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关中特区司令部 1936年1月，关中特区司令部成立，司令员江华，政委贾拓夫，隶属中共陕甘省委领导，下辖淳耀第六支队、第八支队、第九支队，赤水独立三营、第十二支队、第十三支队，永红保卫队，新正武工队、独立二营，宁县第一支队，新宁第十八支队、第十九支队、第二十支队、第二十一支队、独立一营等。3月，关中特区司令部主要领导成员率大部武装转移陕北。5月，关中特区司令部恢复，汪锋任司令员。同月，中共陕甘省委撤销，关中特区司令部改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2月，又改归新成立的中共陕甘省

委领导,司令员张仲良,政委习仲勋。1937年4月,关中特区司令部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辖淳耀县保安大队、赤水县保安大队、新正县游击队、新宁县游击队等。10月,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

关中特区所辖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和红军募补处的成立

淳耀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1935年8月,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派张邦英、黄子文在淳化县桃渠原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在原中共赤淳工委所辖东区党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淳耀县委员会,郭存信任书记,隶属陕甘边区南区党委领导,下辖桃渠原区(一区)和小池区(二区)2个区委计8个支部。1936年1月,中共淳耀县委改属中共关中特委领导。到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淳耀县委下辖5个区委计31个支部,有党员720名。

1935年10月,陕甘边区南区党委、南区苏维埃政府在桃渠原召开淳化、耀县交界地区(原赤淳县东区)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淳耀县苏维埃政府,姚殿森任主席,隶属陕甘边区南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辖桃渠原、小池2个区公署计11个乡苏维埃政府。1936年1月,淳耀县苏维埃政府改属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到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淳耀县苏维埃政府下辖5个区31个乡的区、乡苏维埃政府。

淳耀县武装组织主要有淳耀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支队和淳耀县保安大队、淳耀县警卫队等。这些武装力量在中共淳耀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上级军事组织领导下,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壮大。其间,一些武装被编入其他武装组织序列。

赤水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1935年11月,张邦英、黄志文在柞邑烽火台召开党员及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赤水县委员会(以原中共赤淳工委所辖西区党组织为基础)和赤水县苏维埃政府,周志宏、王振喜分别任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分属陕甘边南区党委、南区苏维埃政府领导。1936年1月,改属中共关中特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

赤水县先后创建了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游击队。其中,1933年4月,在底庙村成立的当地第一支游击队在照金秀房沟改编成立为赤水第十二支队,该支队初有30多人枪,1936年5月部分游击队员被编入关中红三团,1937年3月编入县保安大队;赤水第十三支队,1935年冬成立,有50多人枪,后被编入赤水县保安大队;赤水县保安大队,1937年3月由第十二支队部分队员和第十三支队组成;赤水独立三营,1935年11月组建,1936年5月编入关中红三团;赤水县警卫队,1937年3月组建。这些武装组织隶属中共赤水县、县苏维埃政府和上级军事组织双重领导。

永红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1935年10月,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决定在群众斗争基础较好的新正县六区(柞邑县底庙)建立永红县,并授权中共底庙区委书记赵宏均负责组建工作。10月16日,赵宏均在甘肃正宁县永和镇下南坡村主持召开党员和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永红县委、永红县苏维埃政府,赵宏均、梁汉文分别任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分属陕甘边区南区党委和南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辖郭村、麻院、店子河3个党支部和3个乡苏维埃政府。1936年1月,改属中共关中特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1937年4月,由于永红县作为

县制区域太小,根据关中特区党委指示,永红县制撤销,所辖区域仍归新正县六区管理。

永红县武装组织有永红县保卫队,该队成立于1935年10月,有20多名队员,隶属中共永红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上级军事组织双重领导。1937年4月,永红县撤销,恢复新正六区,永红县保卫队随永红县制同时撤销,保卫队成员编入新正地方支队。

新正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新正县于1934年8月成立,开始称为正邠枸革命委员会。由于永红县的成立,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于1935年8月划正宁县和陕西省枸邑县、邠县接壤地区之各一部置新正县。同月,在湫头召开党员和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新正县委员会和新正县革命委员会,卢永财、左怀玉分别任县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隶属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领导,1936年1月,中共新正县委、苏维埃政府改属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

新正县武装组织主要有新正第四支队、第五支队、第八支队、新正县特务队、新正县武工队和新正独立二营等。其中,新正县武工队是在新正县特务队的基础上建立的;新正独立二营是于1935年冬以新正第五、第八支队为主组建的,下辖2个连,有250多人,1936年7月被编入关中特区司令部直属部队。新正县的武装力量隶属中共新正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关中特区司令部领导,这些武装组织主要活动于新正、新宁、枸邑边沿等地方。

新宁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1935年11月,中共新宁县委员会、县苏维埃政府于宁县九岘杨园子成立,焦怀兴任县委书记,张有鹏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分属陕甘边区南区党委和南区苏维埃

政府领导。1936年1月改属中共关中特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分别下辖九岷、金村、湘乐、平子4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

新宁县武装组织主要有:新宁第十八支队,1935年12月由金村赤卫军改编;新宁第十九支队,1935年12月建立,1936年1月被编入新宁独立营(亦称关中独立一营);新宁第二十支队,1935年12月组建,1937年3月被编入重建的新宁独立营;新宁第二十一支队,1935年12月建立,1936年2月并入第十八支队;新宁独立营,1936年1月建立,5月并入他部。1937年3月重建,下辖3个连,共200多人。新宁县武装组织隶属中共新宁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关中特区司令部领导。新宁县的这些武装组织单独或相互配合作战,寻机打击敌人,开展游击战争,努力扩大、恢复和巩固关中苏区。

中共柟邑县委建立和红军募补处 柟邑地区的阳坡头、湫坡头、底庙、清原建立党组织比较早,发展较快。但柟邑地处关中的心腹地带,国民党反动派一直都未放松对柟邑地区的统治权。所以在苏区建制的划分上,将柟邑职田以东的阳坡头、以北湫坡头等划归甘肃正宁,归置新正县,将柟邑底庙、邠县永乐一部分划归永红县(1937年4月,由于县制区域太小,永红县制撤销,所辖区域仍归新正县六区管理),柟邑清原、丰泉、马庄和淳化的官庄一部分归赤水县。而在柟邑张洪、土桥、城关等地的党组织基本是在国统区工作。1932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柟邑,在中共柟邑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柟邑县委员会,焦思洲任书记,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辖两个区13个党支部。县委成立后,以配合苏区创建为中心工作。一是为主力红军、游击队提供情报。二是组

织党员、贫苦农民参加红军游击队,1933年初将戚清振领导的灾民武装30余人,改造为游击队,派党员焦润林为指导员。三是分化瓦解敌军。1933年2月27日,经过统战工作使土桥何高侯部一个连,113人带107支枪投奔红二十六军。四是发动群众抗粮抗款。1933年2月,组织全县5000余农民,于十四、十五、十六日三天在张洪镇“围城交农”,斗争取得了胜利,迫使伪县长李纪霞答应了群众的要求,减免了税捐,清算了县财政,支付了交农费用800块白洋,打击了敌人,配合了苏区的创建。1933年初,发动群众抗粮抗款,配合建立革命根据地。县委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3年5月,敌何高侯部将我柞邑县宣传部长兼区委书记梁永杰逮捕,被拷打致其跳崖并精神失常。1934年秋,县委组织部长蒲玉阶被国民党陕西省“肃反会”逮捕脱党。次年秋,县委书记焦思洲与陕甘游击队发生冲突,被游击队误杀,因而柞邑县委处于瘫痪状态,基层组织失去领导。

1935年县委重新恢复,推举许国钧(即许可进)任县委书记,杨维奎任组织部长,杨运启任宣传部长,开展地下党的组织工作。1936年春,敌东北军围剿苏区,占领了底庙、湫坡头、前义阳地区,策划了300名党员、基层干部的自首大会,使革命受到严重破坏,斗争也陷入低潮。1937年1月,经国共双方谈判,划定了陕甘宁边区与友区的界限,淳化县城和柞邑县城被划定为红军募补处。1937年3月,在县城设立385旅办事处(简称八办),接替了县委工作。4月,中共关中特委即在淳化县城和柞邑县城分别设立红军募补处。8月,淳化县、柞邑县红军募补处分别改为淳化县八路军办事处和柞邑县八路军办事处。

第二节 关中特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但是,蒋介石置民族危机于不顾,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集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10多万人,向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

1936年1月,国民党乘红军东征之际,调遣东北军11个师,兵分三路对特区进行了大规模“围剿”,中旬,驻陕西省邠县东北军105师一个骑兵连经底庙进攻新正县,红一团和新正独立营奉命在上南坡头对来犯之地迎头痛击,打死打伤敌军10余名,残余敌军仓惶逃窜。下旬,东北军一个营进驻乐兴村,新正县独立营和新宁县独立营奉命趁敌立足未稳偷袭,但因过早暴露目标,致使战斗失利,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新正县独立营政委张嘉柏和新宁县独立营政委焦怀兴不幸牺牲。当时国民党军杨国桢(杨干臣)部一个保安大队配合东北军“围剿”关中苏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合围计划,红二十六军一团在干柏树坳设伏,诱敌深入伏击圈,以部分兵力斜插移风,切断敌人退路,红军四面夹击,击毙敌连长,打死打伤敌兵30余人,敌副连长负伤潜逃。这场战斗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36年4月底,红军东征回师陕甘苏区,同时,发出《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国民党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军继续重兵进攻苏区,一方面胡宗南部队集结于陕甘大道,拦截二、四方面军北上,一方面马家军由宁夏东进陕甘,同时东北军进攻关中特区,并由关中向北推进。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西征,关

中红军也配合中央北上。此时,东北军6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纠集保安队、民团,采取碉堡战术、步步为营、向前推进,很快侵占了除新宁平道川以外的整个关中特区。为了保存实力,中央指示特委贾拓夫、江华等党政军领导干部撤往陕北,关中特区撤销;另由习仲勋、唐洪澄(洪澄同志不坚持,要求回中央了)、汪锋、张凤岐等组成关中工委,习仲勋任书记,继续领导关中游击战争,坚持“反围剿”斗争。主力红军和多数领导干部离开特委后,关中特区被敌大军“围剿”,关中工委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边打边退,经耀县、郃县转移到直罗镇。不久,习仲勋奉命调离关中地区,汪锋等在枸邑县花家洞成立了关中临时的领导核心——关中临时特委,汪锋任临时特委书记。

敌人在军事围剿,残酷统治的同时,制造白色恐怖,千方百计强化保甲制度,推行政治诱降政策。在新正县湫头、西城、车家沟、五顷原、南庄子、刘家店、阳坡头、湫坡头、文家川、职田镇、恒安州建起了11处据点,驻村逐户清查户口,编制保甲,实行“连坐法”,施行残酷的反动统治,一些地方的地主恶霸也纷纷组织还乡团,乘机进行“反水”活动,向农民追要被分配的土地,清算地租,施行阶级报复。国民党正宁县党部在山河会馆设酒宴强迫一些基层干部、贫农团长吃所谓的投诚饭,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脱离革命队伍,有的投入敌人的怀抱,新宁县三支队队长王德宽带领十多名游击队员叛变革命,向自卫队投降,王德宽充当敌反共特务队队长、自卫队中队长。关中地区的革命运动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在国民党的围剿攻势下,在白色恐怖统治政策下,关中临时特

委积极领导各个县区的地方武装英勇地开展反“围剿”斗争，与敌展开殊死战斗。新正二支队屡建奇功，一次战斗中，新正二支队被敌军重兵包围6天，弹尽粮绝，战士们只靠野菜和酸杏充饥，但不屈不挠，顽强作战，终于冲出了重围。不久，新正二支队奉命拔除敌军设在西坡的两个碉堡，队长赵铁娃化装成敌军的催粮官，深入敌营探清了敌情，然后晚上一举端掉了敌人的碉堡，消灭了全部敌军。回民游击队利用熟悉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在子午岭森林中，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与敌人兜圈子，搞得敌人精疲力尽，掩护了群众，取得了很多胜利。新宁一支队奇袭湘乐川莲花池的东北军一个连，俘敌2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战马20余匹，机枪1挺。永红保卫队攻克了底庙的敌军据点，极大地震撼了敌人，敌底庙镇长狼狈逃窜，我地方武装收复了苏区的许多村庄，恢复了县委的工作。

在关中军民反“围剿”斗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整个陕甘苏区的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共中央1936年8月适时提出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战略，并不失时机的恢复关中苏区。不久，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迫使国民党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1936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习仲勋再次回到关中主持工作，被任命为关中特委书记。10月中旬，习仲勋在赤水县七界石（今旬邑县境内）主持召开了有30多人参加的关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坚持与恢复苏区和游击战争问题。会议决定：

一、各地以县为单位，整顿游击队，扩大游击区。在行动上则

以“集中袭扰,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郭炳坤,政委习仲勋(兼),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二、尽可能地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孤立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一等。三、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五、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

习仲勋主持下的关中特委坚决地执行了会议决议,关中的民团保甲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游击队在新正县前马原、淳耀县让牛村、赤水县的郭家掌等地不断取得胜利。新正、新宁、赤水、淳耀等县的地方政府及党的组织大部分相继恢复,淳耀县的香山、小坵等地也都建立了新的苏区,并肃清了关中的大股土匪,武装了革命队伍。这些工作的有效开展,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和恐慌,他们意识到革命的力量没有被“围剿”消灭掉,反而更活跃了起来,又采取死守据点的政策,不像以前那样骚扰了。关中特委则相应开展对敌士兵的政治工作,尽量扩大游击队。此时赤水县有四个支队,淳耀县有两个大队及第十九支队,新正县有四个大队,新宁县有第一、三、四三个支队,共十四个支队,近500人之众,革命潮流空前高涨。

第三节 关中特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早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抢占整个东北三省的侵略战争,使中华民族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难之中。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妥协卖国,不战而退,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因而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

“西安事变”后,我党同国民党政府达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同时将枸邑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县城由国共两党军队共同驻防,并在县城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机构。在和平共处的几年里,八路军枸邑办事处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为抗日部队补充兵源,筹集军费,发动群众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枸邑县八路军办事处的建立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划分苏区和友区的界限,陇东的庆阳、合水、镇原、环县、正宁、宁县划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但新正县与正宁县由于地域犬牙交错,国民党正宁县驻军在新正县边沿地区挖战壕、筑碉堡、设关卡,进行军事威胁。新正军民为了保卫和扩大苏区,同敌人展开了拉锯状态。为了避免发生军事冲突,消除敌对局面,保持革命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防止亲日派进攻西安,挑起内战,党中央派红四师到枸邑驻防,以防不测。红四师在枸邑驻防期间,深入农村利用各种集会,采取多样形式,向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界人士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动员民众奋起抗日。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在南下关中和北返进驻宁县、正宁、枸邑地区时,也曾参与了关中特区的抗日宣传活动,向关中特区人民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启发群众的抗日觉悟。

1937年2月,关中特委党政军机关由淳化桃渠河迁驻枸邑县职田镇马家堡,并同国民党枸邑县政府协商达成了分管协议,向县

城派驻了关中分区独立营。我关中独立营驻守东、南两个城门,国民党驻守西、北城门和西堡子。4月,在栒邑县城福音堂设立了红军募补处,薛和爽(薛何昉、董丰)任栒邑县红军募补处(亦称三五八旅募补处)主任,隶属关中特委领导。栒邑县红军募补处对内代行中共栒邑县委职能,下辖2个区委9个支部,主要活动于栒邑县城及张洪、土桥地区。

1937年7月,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以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示愿意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派出周恩来等组成的代表团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在中共的敦促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加之8月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中心南京直接受到威胁后,蒋介石被迫于8月22日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原栒邑红军募补处改称为八路军驻栒邑办事处,主要任务是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八路军,为前线部队募集钱、粮、草等军用物资,做抗战动员和支前工作。薛和爽任主任,工作人员有许尚志、兰子敬、姚鹏飞等,红四师政治部主任舒同亲笔为办事处题写了“门联”。

办事处成立后,在红四师的配合下,经过一段工作,正式向国

民党政府交涉提议,成立“柤邑县抗日救国会”组织。此建议获得成功,县上设立了抗日救国总会,会址当时设在国民党柤邑县党部。各乡镇设立分会,受总会领导,而实际上分会成立以来一直由八路军办事处领导,并未和总会有多少联系。到1938年的下半年因形势变化,抗日救国会改名为“抗敌后援会”。

各乡镇的抗日救国分会机构和人员是:每个乡镇抗日救国分会设主任1名,委员3名,基本上由地下党员担任。张洪抗日救国会主任潘德怀,后赵述芳;善庆乡(今赤道乡)抗日救国会主任潘忠孝;太村镇抗日救国会主任张连荣;土桥镇抗日救国会主任王崇华,后焦富才;城关地区直属办事处领导。

抗日救国会的主要任务是:一、宣传中共抗日救国正确主张,组织和发动广大民众积极起来投身抗日;二、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的原则,动员群众募捐钱、粮、物资,积极支援抗日前线;三、征集、补充抗日部队兵源等。

通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广泛开展,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广大群众踊跃为支援抗战、支援前线捐款捐物。1937年9月,柤邑县抗日救国会召开征兵动员大会,当场有300名青年报名参军,后经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独立营集中训练后,补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八五旅,并组织群众为部队募捐了钱、粮、鞋、袜等物资,商人杜少白一次捐献200元,使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

中共柤邑工委的成立与工作

1937年秋季,红四师奉党中央命令,开赴抗日前线,年底薛和

爽调离。1938年3月间,关中分区派田润芝接任柞邑办事处主任职务,在田润芝接任不久,根据关中分区党委的指示,在办事处内部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柞邑县工作委员会。随后,新成立的中共柞邑工委以八路军驻柞邑办事处的名义,继续恢复组建党的基层组织,带领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工委书记由田润芝担任,许尚志任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兰子敬任宣传部长,关中分区独立营政委王四海任军事部长,工委委员有李树桢等,后分区又调郗占元任办事处秘书。

中共柞邑工委成立后,仍以八路军驻柞邑办事处的名义开展工作,秘密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帮助指导西区区委(张洪)书记第五新书(1938年书记为潘德怀)、南区区委(土桥)书记张长春开展工作。

此一时期,整顿恢复了原有11个党支部。即县城支部,书记许国均,党员7人;东关支部,书记崔崇月,党员11人;王家支部,书记王忠和,党员12人;魏洛支部,书记第五相荣,党员16人;赵家屯庄支部,书记赵述芳,党员5人;皇楼支部,书记潘志英,党员13人;关道嘴支部,书记张福海,党员16人;张洪街支部,书记潘德怀,党员14人;井坳支部,书记焦献文,党员10人;安乐支部,书记梁新玉,党员10人;北沟支部,书记丁四忠,党员6人,共计党员120人。

新发展支部7个,发展党员49人。即宝塔小学支部,书记万士杰,党员7人;太峪小学支部,书记李述珍,党员12人;仁安支部,书记张元福,党员8人;上官庄支部,书记马志学,党员7人;秦家支部,书记秦志怀,党员5人;柳峪支部,书记张玉俊,党员4人;

丈八寺支部,书记袁永兴,党员3人。到1939年栒邑事件前,八办领导的区委2个,支部18个,党员169人,是地下党在栒邑发展的高峰时期。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其内部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共纲领,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同时鼓吹“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栒邑县新任县长张中堂多次密令驻栒邑国民党军队,伺机制造磨擦。在这种形势下,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同志曾亲自带领分区文工团来到栒邑县城,以文艺形式同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宣传斗争,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言论。

1939年5月25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栒邑县城挑起了武装冲突(即五·二五栒邑事件)。我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将部队主动撤出了栒邑县城,八路军驻栒邑办事处亦随之撤回陕甘宁边区。

八路军驻栒办事处撤离后中共栒邑工委的斗争

1939年5月,八路军驻栒邑办事处撤回边区后,中共关中分区党委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将八路军栒邑县办事处撤销,原办事处主任、中共栒邑工委书记田润芝调任中共新正县工委书记,由杨安仁担任中共栒邑工委书记,许尚志继续担任组织部长,其余人员调离。工委的主要任务是:一是联系和领导国统区党的组织;二是继续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政策;三是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四是收集分析国民党各层主要人员的政治表现,有针对性的开展统

战工作。

6月初,关中分区党委指示枸邑工委转移到新正四区湫坡头太堡村活动,没有向外界公开。枸邑工委书记杨安仁以新正四区区委副书记、许尚志以区委干部、新调工委工作的曹文才以四区公安助理员身份出现,同时还发展了太堡村农民曹生常担任工委交通员,负责工委和国统区党组织的联系,传送文件,收集情况。

1940年3月,国民党当局调遣大批军队,准备进犯陕甘宁边区。曹生常把驻太村镇敌军每天黎明在城外出操的情况,汇报给工委,工委及时转送到独立营,独立营准备趁机袭击。我军提前埋伏在敌人出操的附近,在敌人出操时进行了偷袭,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给了敌人迎头痛击,打死敌军3人,缴获步枪3支,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只好龟缩回城。三天后敌人调集了预备第三师两个团的兵力进攻我新正县四区和马家堡一带,关中分区撤至恒安洲,中共枸邑工委也转移到分区驻地。此时,关中分区党委对枸邑工委人员作了调整,许尚志、曹生常留关中分区工作,杨安仁只身奉命到清原区以区委副书记身份开展工作。不久,通过各方联系,杨安仁与魏洛党支部第五相荣取得联系,让其负责与国统区各基层党组织联系,传送文件和收集情报等。

同年10月间,第五相荣身带文件和《关中报》从清原区返回魏洛途中被敌逮捕。在敌严刑拷打下,第五相荣招供了魏洛一带不少党支部的党员名单,但绝大多数党员听到他被捕的消息后都跑回了边区,才免遭更大的损失。十多天后,第五相荣跑回清原区找杨安仁,杨安仁带着第五相荣立即回分区驻地阳坡头,向关中分区党委作了汇报。关中分区党委鉴于枸邑工委和部分基层党组织已

经暴露,继续公开活动很可能有更多的同志暴露被捕,便决定撤销中共枸邑工委。工委撤销后,关中分区将汭河以南地区划归陕甘宁边区赤水县领导,汭河以北地区划归边区新正县领导。

1940年3至4月间,国民党军队侵占湫坡头、底庙两个区及马家堡等村后,在东至淳化官庄起,西至恒安洲、文家川及接近甘肃正宁一带,修筑了190多个碉堡,对边区实行封锁,并先后破坏了马家堡、湫坡头四乡、土桥等11个党支部,被捕押和审查受迫害的党员和群众达120余人。1941年,国民党派特务策动中共土桥区委书记张长春当了特务,暴露了土桥区委及所属的6个支部,供出党员19人。1942年国民党又策动中共张洪区委书记潘德怀当了国民党五十二师便衣队特务。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枸邑国民党统治区的基层党组织及未被暴露的共产党员,根据上级党组织“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处于休眠状态,为以后开展革命活动积蓄力量。

第三章

关中分区的建立与发展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7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关中特区划归陕甘宁边区领导。10月,关中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机关驻地仍在枸邑县职田镇马家堡村)。

关中分区地处乔山山脉南端,北与陕甘宁边区相连,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所辖赤水、淳耀、新正、新宁县和双龙中心区,分属陕西枸邑、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宜君、黄陵和甘肃正宁、宁县各一部分,总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为一北宽南窄、狭长的囊形地带,是守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南大门。

第一节 关中分区的成立及两次党代会

关中分区的成立暨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

1937年5月,苏区党代表会议后,关中特区于6月召集区委书记作会议传达。1937年10月,关中特区在枸邑县职田镇马家堡村

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 50 多名,代表 700 多名党员。在大会上检查过去党的工作,讨论开展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转变为边区的问题。最后大会决定:将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将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改为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习仲勋任书记;将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霍维德任专员;将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张仲良任司令员。中共关中分委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领导,关中专署归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隶属中共关中分委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关中分区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县和淳化、枸邑八路军办事处。同月,关中特区工会改为关中分区工会,主任张如洲;关中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改为关中分区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贺建山;中共关中特委妇女部改为关中分区妇联会,主任郝明珠。更名后的关中分区工、青、妇组织分别下辖各县相应机构。

自关中分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后,1937 年底,关中分区所辖各县经过民主普选,产生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完成了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这一时期,关中处在一个统一战线顺利的环境中,对外则与邻县友方都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友谊关系,设立我们的工作机关办事处,大量开展友区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对内则消灭了任雨霖、苟鸿运、夏老么等股匪,安定了关中社会秩序,奠定了和平建设的基础。

关中分区第二次党代会的召开与统战工作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担当起组织团结全分区党员群众迎接更

为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1939年9月上旬,关中分区在栒邑县职田镇上墙村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50多名,代表党员4000多名。大会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并讨论决定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贯彻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和策略。9月5日,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张凤岐等13名委员组成的中共关中分区第二届委员会,习仲勋再次当选分委书记。

这一时期,关中分区各级党组织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灵活多样地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分子,使统战关系遍及国统区国民党党政军机构和地方绅士、知识分子、商人、哥老会及其他社会组织。

关中分区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抗战要求,结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关中分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大量地,十倍地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指示,积极而谨慎地在工人、雇工、青年学生中和战士中吸收了一批党员,使分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维护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在周边地区国民党武装的统战工作中花费了很大心血。他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王大牙、寺村民团萧恩多、邠县民团李仰之、栒邑县民团郭相堂、太峪镇民团文干卿、宁县民团庞铭胜,同官民团夏玉山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民团头目除少数顽固分子外,都为抗日工作起到了不同程度

的积极作用,减少了边区的压力。栒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目马宏德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习仲勋的多方争取下,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 25 支,装备了分区部队。国民党驻武家堡保安团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枪投奔关中分区,习仲勋亲自同他谈话,并勉励说:“这样的好事你做的越多越好。你这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

同时,关中分委还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知名地方人士,社会贤达,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此间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玉田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老中医张治平、栒邑县的肖芝葆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关中分委领导经常深入各个村落,走家串户,调查了解社会现状和群众情绪,深入细致做抗日宣传工作。一次,习仲勋同分委秘书长杨再泉到另外一个村庄看望群众,当他得知该村有位叫穆润身的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时,便主动到穆家登门造访。他诚恳地对穆的父亲说:“国共两党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就一笔勾销了,你儿子在国民党任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只要我们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儿子回家,我们还欢迎他,也保证他来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一席话使这位老人深为感动,表示一定要为抗日出力。

新正县的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是回族杂居的地区,以回族居多,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推行大汉族主义,制造民族矛盾,使这里的回汉人民从历史上形成隔阂,回族群众屡受歧视。自从有了共产党领导,无论是军队,还是当地群众都十分重视民族工作,积极发动和领导回族人民参加革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龙嘴子、

孟家河、西渠一带成为关中分区和新正县的可靠后方。

关中分区所辖各县党政军群组织

党的组织 1937年10月,中共关中特委改为中共关中分委后,原属中共关中特委领导的中共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委隶属关中分委领导。1943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成立,中共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委隶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3月,中共同宜耀县委成立,隶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10月,同宜耀县撤销,其辖区和工作人员并入淳耀县。

1937年8月,中共关中特委将柞邑、淳化县的红军募补处分别改为柞邑、淳化县八路军办事处,代行各县委职能,隶属关中特委领导。1938年3月,中共关中分委决定,在柞邑、淳化县八路军办事处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中共柞邑、淳化县工作委员会,田润芝、杨直分别任工委书记,隶属关中分委领导。1939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柞邑县城挑起武装冲突,中共柞邑县委迁至新正县湫坡头,实行异地领导。1940年3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淳化事件,迫使八路军退出淳化县城,中共淳化县工委亦随军撤至淳化县安社,与中共淳耀县委合并。11月,中共关中分委鉴于中共柞邑县工委及部分基层组织已经暴露,遂撤销了中共柞邑县工委,将其所属党组织分别划归中共新正县委、赤水县领导。

1937年初,中共新正县四区区委将党的活动延伸到邠县国统区新民、曹家店一带。10月,中共新民地区小组成立,姚伯生任组长,有党员5名,归中共新正县四区区委领导。

政权组织 1937年9月至10月,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苏

维埃政府相继改为抗日民主政府。其中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与关中分区专署合署办公,直到1941年7月才分署办公。1939年初,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指示精神,各县将县代表大会改为县参议会,县政府主要领导成员由县参议会选举产生。1月,新正、新宁县分别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县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县长。淳耀、赤水县也分别于3月和4月召开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陈学鼎、郭存信当选为淳耀县参议会会议长和县长;康润民、王振喜当选为赤水县参议会会议长和县长。1941年7月至8月,各县分别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经选举,李科、郭廷藩当选为新正县参议会正、副议长;杨伯伦、高庆荣当选为新宁县参议会正、副议长;任成玉、吴大鹏当选为赤水县参议会正、副议长;陈学鼎、师有存当选为淳耀县参议会正、副议长。同时,各县参议会还选举产生了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会议代表。1942年5月,各县分别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精神,对县参议会和县政府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使共产党、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县参议会和县政府组成人员中基本趋于“三三制”的原则。各县参议会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1943年3月,同宜耀县政府成立,10月随县制撤销,并入淳耀县政府。

军事组织 1940年春,新正县关中回民支队成立,1942年4月,关中回民支队与新正县各区游击队整编为新正县保安大队,1946年11月,新正县保安大队被编入新正县独立营,这支武装主要活动在关中分区和陇东地区。1937年3月,新宁县独立营建立,共有200多人枪,1937年9月被编入关中分区二十一团;1938年5

月,新宁县将各区游击队及自卫军整编为新宁县保安大队,1944年5月编入关中警一旅第三团,其主要活动在新宁县境内。1937年3月,赤水县保安大队建立,共有200多人枪,1945年8月编入关中分区保安纵队;赤水县警卫队成立于1938年10月,共40余人枪;赤水县游击队成立于1942年3月,共30余人枪,主要活动在南原、中嘴、马家山一带;赤水县武工队成立于1943年春,直至抗战胜利。淳耀县保安大队组建于1937年3月,共200多人枪,1943年10月随淳耀县与同宜耀县合并而改编;淳耀县民兵大队部成立于1941年12月,直至抗战胜利。

群团组织 1937年2月,赤水县工会、淳耀县工会和赤水县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7月,新宁县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成立。10月,中共赤水县委妇女部、淳耀县委妇女部分别更名为赤水县妇女联合会、淳耀县妇女联合会。1938年1月,新宁县工会成立。1939年8月,新正县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成立。1940年4月,新正县工会成立。1942年9月,根据中共关中分委指示,赤水县、淳耀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组织领导全县各界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和支前活动,直至1945年1月撤销。各县工、青、妇组织在党委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配合党政军组织领导广大群众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了应有贡献。

第二节 关中分区的政权建设与政治改革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

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真正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关中分区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要求,在分区及各县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建立了包括各抗日党派、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各级人民代表机关和权力机关参议会及各级政府,有效地推行了“三三制”政策,各级政权不断巩固和完善;开展了以整风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建设运动,加强和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了团结,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取得全国政权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普选运动

关中分区成立后,提出“民主政治,选举第一”,充分保障、尊重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严格按照《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的规定,实行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度。“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乡长、区长、县长,边区主席由议会选举”,“各级政府直接对各级议会负责”,“选民对所选代表认为不合格时,得随时撤回改选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进一步规定:除了汉奸,经法院判决有罪,被剥夺公民权和精神病患者以外,“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按照这些原则,关中分区在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从1937年7月开始,在分区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普选活动,使普选制度得到了充分贯彻落实。

关中分区的第一次普选从1937年7月中旬开始,到8月底结束。这次普选是在苏维埃政府民主制度向议会民主制度转变的过程中进行的。为使分区人民真正理解“抗日民主制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新的选举原则,就是在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的原则上,促进抗日民主制度的早日建立。”

普选的基本步骤和环节是:一是宣传发动。向群众阐明从苏维埃民主制转变的必要性和意义,使选民接受抗日民主的选举制,并能投入到选举活动中来。二是审查选民资格,进行居民和选民登记,并张榜公布。三是检查政府工作。由政府工作人员向选民做政府工作报告,选民对政府工作进行评审、对工作人员进行评议,考察干部业绩,进行换届选举。四是提出选举人。分别由共产党组织、贫农团、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提出。五是正式投票选举。召开选民大会,采取“认人”(候选人背朝选民)投豆,现场唱票、“烧香”点洞,辅之以流动票箱,进行投票。六是召开乡代表会和各级议会,选举产生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七是进行选举工作总结,由各级选举委员会将该级选举的经过、结果,以及经验教训做出总结,报上一级选举委员会和政府。据统计,第一次普选中,有7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第二次普选是在1941年春季进行的,这一次参加选举的选民达到80%—90%,有的地方高达95%以上。同时在这次普选实践中,采用了许多方便群众的办法,比如:投豆,画圈,划杠,背箱子、香火烧洞等等,充分保障了各阶层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从选举结果看,关中分区共选出乡参议员2278名。在人员结构上,以新宁县为例,在当选的582名乡参议员中,工人2人,雇农1人,佃农

19人,贫农393人,中农113人,富农30人,地主13人,豪绅1人,开明绅士10人,国民党员占0.3%;在当选的48名县参议员中,工人1人,农民34人,商人3人,学生10人,进一步贯彻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

关中分区开展的普选运动,是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它是在边区地处边陲贫瘠之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现代文化教育匮乏的情况下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建设,它不仅增强了人民的民主意识,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且密切了边区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人民真正能够当家作主;更是用事实回应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污蔑,提高了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

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政权中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尝试。陕甘宁边区政权组织形成后,一些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和部分共产党员把抗日政权,看成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而拒绝吸收进步分子和开明绅士参加政权。

为此,中共中央于1940年2月发出《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领导的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团结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的民主政权。”因此,“抗日民主政权在政策上和阶级实质上,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即一切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人都应吸收其代表加入政权。”要求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

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其实质就是为了反对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权,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强调“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实行‘三三制’。”“三三制”不仅在民意机关实行,在政府机关中也要实行,要“仔细地有步骤地大胆地选举非党进步人士到政府机关为行政人员。”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选举运动的领导,要在党内外进行“三三制”政策的宣传教育。

根据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边区政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从1941年开始,关中分区机关着手贯彻“三三制”民主制政权建设的原则,开始进行“三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在各县举办培训班,培养选举工作干部,进行选举试点,摸索实践经验。经过认真准备,关中分区各县进行了“三三制”民主普选工作。这次普选,通过召开县、乡两级参议会,改选了县、乡两级参议会和抗日民主政府,并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士参加各级政权的领导工作,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经过选举,在县、乡政权内,共产党员在县议员中占50%,在县政府委员中占55%;在乡议员中占30%,在乡政府委员中占32%。在这次选举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造成县级政权中的共产党员比例过大,不符合“三三制”的规定。1942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给各县的指示信中指出:“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退出,由无党

无派候补议员补充。各县政府还可选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酌量聘请。各县议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而被调动离职者,更应以非共产党员补充”。按照这一指示,关中分区各县即召开县参议会,通过改选,对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作了调整和补充,使“三三制”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经过改选,新正县退出共产党员议员3人,候补非党人士5人,使其成分比例为共产党员占36%,接近于三分之一要求。淳耀县31名议员中,共产党员10人,无党派和其他人士21人;9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3人,中间分子2人,进步分子和其他人士4人。赤水县46名议员中,共产党员16人,进步人士和中间分子30人。新宁、同宜耀县也都达到了“三三制”要求。关中分区各县“三三制”政策的贯彻落实,充实和完善了抗日民主政权,调动了各阶层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新正二区雷庄村张治平是当地一名德高望重的名医,他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深知民间疾苦,同情农民、对国民党的苛政不满,在开辟新正县革命根据地时,习仲勋和张治平就有交往,以后通过不断接触,他俩成为朋友,在习仲勋的影响和教育下,他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张治平当选为新正县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在他的带动下,他的侄子张清益、孙子张化民先后参加了革命。1945年11月1日张治平逝世后,习仲勋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及西北局书记高岗送了挽联,高度评价他的革命功绩。新正县委书记郭廷藩题送“革命医师”匾牌一面。

在“三三制”的原则下,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有机会参政议政,在关中分区各级政权中吸收了一批非党进步人士和开明绅士进入机关,使其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团结了社会

各界人士,对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促进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整风运动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逐步纠正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党的路线转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形式的迅速变化,对“左”、“右”倾思想根源还未来得及彻底清算,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致使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现象。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于1942年2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4月,以整顿“三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首先在延安开始。此后,党中央即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统一部署下,关中分区各级党组织开展了以整风运动为形式的普遍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1942年2月,关中分区党委在马栏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关中分区的整风运动。分区党、政、军负责人和各县县委书记、县长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按照分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各县于当年下半年按照学习文件、检查工作、审查干部的整风计划,开始整风学习。1943年初,鉴于从大后方和各地区各部门调来的180余名新干部还未学习整风文件的实际,中

共关中地委(1943年1月中共关中分区党委改称中共关中地委)规定分区机关党员和干部从3月(县区级从4月)至8月底为学习高干会议决议(即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于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与深入整风学习时间。同时,对全分区约280名干部进行了审查。9月,中共关中地委成立了地方干部整训班,召开机关在职干部大会,号召开展“坦白”运动,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阶级教育。同月,军队整风队成立,也正式开始整风。10月,关中分区各县普遍开展了审查干部工作,分区各机关、学校、培训班、剧团等也先后进入了专门审查干部、清查内奸的高潮。新正县共产党员杨浩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枸邑搞地下工作,未经组织批准,私自加入国民党。在审干中,杨浩坦白交待了自己的错误。为了体现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新正县委在马栏区召开了有两千余名干部群众参加的坦白大会,他在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根据他的一贯表现和认错态度,新正县委当会宣布免于处分。此时,关中分区的整风与“坦白”运动也达到高潮。

随着审查干部和“坦白”运动的开展,分区各机关于1943年7月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把一些从白区来的党员干部和忠诚于革命的好同志打成了特务、叛徒或反革命。新正县受康生所谓的“抢救失足者”影响,被引入歧途,县政府建设科长孙玉亭、科员张稽、秘书张振德等5人被错误地列为敌特嫌疑,被停职反省轰斗批评,有的人甚至遭到严刑折磨。

“抢救失足者”运动也波及到马栏农村,许多群众被随意列为

敌特分子或敌特嫌疑,受到打击迫害。为时不久,中共关中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精神,对在审干和反奸工作中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一一甄别和平反,为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从而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并认真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使整风运动和审干工作走向正确方向。

通过整风运动,使干部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克服了得过且过、漠不关心、应付差事的不正确思想,增强了忠诚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和积极性;摒弃了平均主义、本位主义、极端民主化及宗派主义等不良倾向,坚定了无产阶级立场;明确了对敌斗争的残酷性和严重性,掌握了与坏人作斗争的本领;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眼界,积累了经验,推动了工作,达到了提高和统一全党思想、纯洁队伍、锻炼干部、巩固党组织的目的,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第三节 关中分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是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事业。只有发展了边区的教育和卫生事业,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才能推动边区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因此,关中分区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把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作为边区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的中心任务。

兴办完小教育与冬学、夜校、识字班

1938年至1939年,关中分区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完

小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全区完小由4所增至9所,有学生400多名;初小由170所增至243所,有学生7000余名;举办冬学班200余处。后因两次磨擦斗争的影响,到1941年全分区完小减少到6所,在校学生397名;初小减少到129所,在校学生3554名;办冬学28处,有学员506名。1942年,关中分区专署从战争年代的实际出发,按照边区教育厅“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要求,采取加强完小和裁并初小等措施,将140所学校合并为117所,有学生3343名。同时,共办冬学20处,并注意冬学质量的提高。

1944年,关中分区提出了“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分区各县小学教育和冬学、夜校、半日班、识字班等呈现出新的气象,同时还兴起了民办学校的热潮。赤水、新宁县的完小把课程与实际相结合,除教学生学好文化课外,还教学生写信、写路条、记账、丈量土地等。新正县雷庄、淳耀县岭底、赤水县奉岭的民办学校,把教育与生产密切结合,不仅男女老少都教,夜校、识字班、读报组都管,而且还统揽文化卫生工作。至1944年底,全区有完小4所,中小9所,普小21所,民办学校99所,夜校62所,读报识字组282个。各地的夜校和读报识字组也都办得很有特色,新宁县旱村的读报识字组把读报与识字、生产相统一,在读报时研究生产,在生产间歇时读报,既增长了文化知识,又推动了农业发展。日益发展的文化教育事业,适应了抗日战争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了全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辖枸邑东部地区的农村教育事业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停止,陕甘宁边区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条件下发展起

来的。栲邑东部地区,与乔山相连,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过武装斗争,党在栲邑东北部地区建立了五个区的苏维埃政权,即丰泉区、清原区(属赤水县辖)、阳坡头区、湫坡头区、底庙区(属新正县辖)。五个区仅有9所初级小学,每个区平均1.8所,文盲众多,占总人口的90%以上。1937年,党和边区政府为了动员组织全民族的抗日高潮,就狠抓文化教育建设,在农村大力开展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

农村普小 1937年,边区各级政府设置教育机构,边区政府设教育厅,各县设三科(即教育科),区设教育助理员,乡设文化委员,村设教育助理员或校董委员,专管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事宜。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政府组织力量深入农村创办小学。一方面把原有的学校和私塾改为村办小学,废除旧的教材和教学方法,改死读书为启发式教学。一方面创办新的小学,那时边区财政困难,拿不出多的钱来办学,就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办学,没有教师就在本村群众中选拔,本村找不到的就由三科调剂调配,教师统一由县三科管理,那时教师也没有物质待遇,只是由群众负担管饭。可是,教师的积极性很高,不讲报酬,吃苦耐劳,配合区乡干部动员学生,宣传群众,筹借桌椅艰苦办学,经过一年努力,基本上达到大村有小学,第二年经过努力基本上实现了大村有小学,小村联办了小学,学生能够就近上学,学龄儿童都上了学。小学由原来的9所发展到82所,新增加了73所,平均每个区16.4所。增长最多的是清原区、阳坡头区,分别增加18所;其次为底庙区13所,丰泉区13所,湫坡头区11所。1940年,国民党制造磨擦,侵占了湫坡头、底庙两个区及阳坡头区的四个村庄,学校随之减少,秋季我军

解放马栏,办起了3所小学。从此,小学一直稳定到52所。

边区的小学实行“四二”分段制,初小四年,高小两年,秋季始业。教材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统一编制,课程设国语、算术、常识、音乐、美术、图画等课,教学的中心任务是配合抗日动员,使学生对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工作有所了解,再发动他们去做群众的抗战工作。学校根据抗战形势,实行军事化,在学生中组织儿童团、少先队,文化用品经常随身携带,一遇警变,立即转移,在山野中随时随地上课,把群众的抗日动员与儿童的展示活动密切联系,使国防教育在任何环境下不受影响的继续发展。

学生的课外活动非常活跃:一、组织学生用口头和文艺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二、组织学生向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推动生产的发展。三、组织学生当“小先生”,送字上门帮助群众识字。四、每礼拜六,全体师生走出校门为抗属担水,劈柴,帮助生产,优待抗属,慰问抗属。五、组织学生协助政府开展卫生、放脚、禁烟活动。

边区的小学教育由1937年起到1939年的三年时间里,处于大发展阶段,1940年因国民党制造磨擦,侵食边区,学校处于巩固时期。从1941年起,学校进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的阶段,按照《陕甘宁边区小学法》、《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对农村小学普遍进行了整顿提高,每个学校都有了教室、黑板、桌椅,教学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边区大生产运动之后,度过了困难时期。从1943年起,教师实行薪金制,关中分区以粮作标准,农村小学教师每月薪金是小麦四斗。

完全小学 在大力发展小学教育的同时,即筹划如何办完小

的问题,使学生上完小学后能继续升入完小,读完小学课程。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38年初,边区在柘邑境内办了3所完小,即赤水县第三完小(在清原吕家村),新正县第一完小(在后掌村),新正县第二完小(在底庙牛家坡村)。1940年春清原完小编入赤水县联小。

完小的学制为二年,课程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政治常识、自然常识、音乐、图画、体育等。

完小属公办学校,经费由国家负担,县教育科直接管理,但开办时也要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勤俭办学。完小设校长、教育主任、事务主任、教师若干人,学生来源于周围的小学。初办阶段,学生采用动员和推荐的方式,学校走上正轨以后采取考试录取的形式招收学生。

完小同小学一样,向学生不收分文学费,实行免费教育。不同的是,小学学生在家食宿,完小学生在校食宿,同样都实行勤俭办学,每个完小都开垦土地种植蔬菜和粮食。学生上完小,只从家里拿面粉,蔬菜自己生产,柴火自己动手砍,所以学生负担比较轻,学校实行民主管理,废除了打骂和体罚现象。因而,学生都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热爱学校,安心学习。

社会教育 边区政府对社会教育极为重视,把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教育的两个方面来抓,因为当时是文化落后的地区,文盲占全人口的90%以上,因此,把教育看作宣传组织团结民族最有力的工具,政府免费提供课本、报纸,迅速普及国防教育,消灭文盲,提高民众政治水平及抗战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

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灵活多样,主要是根据农时季节,居住远近,年龄爱好等条件决定组织形式,普遍采用的组织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办识字组。识字小组是边区消灭文盲很好的一种办法,是当时社会教育很重要的一种形式。边区从1937年就开始在农村办识字小组。组的规模不大,要求3至7人为限,最少不下3人,最多不超过7人,普遍的是3至5人,按照居住远近、年龄、爱好相同的人自愿组合,组织民主推选一人担任组长,识字组的学习以识字、学政治为主,学习期限是一年至一年半,达到摘盲标准为限。识字组的教师由农村、小学教员,县、区、乡政府文书担任,为了由点到面,带动全局,边区政府规定,每个农村小学在附近办2个模拟识字小组,每个区政府在附近办1个模范识字小组,每个县政府在附近办两个模范识字小组,由模范识字小组带动周围的识字小组,识字小组坚持常年办,农闲多学,农忙少学,见空隙挤时间学。政府逐级分配办识字小组的任务,使识字小组普及农村每个角落。在识字小组之间,开展识字竞赛活动,定期检查评比,奖励先进,促进识字小组健康向前发展。

二、办夜校。边区在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庄办夜校,吸取白天因生产忙碌的男女青年上夜校学习。夜校大部分都由农村小学操办,也有个别单独办的。夜校都有固定的地方上课,有较健全的制度和组织纪律。当时夜校实际上学的多是男青年(女的都上半日班),他们思想活跃,要求进步,上夜校热情积极,夜校以识字为主,还学政治、自然常识、军事、歌曲等课。夜校要求半年至十个月完成任务结业,清原区夜校多数办得好,既学政治、文化,又开展文艺

活动,扭秧歌,唱歌唱戏,把夜校办成了青年之家。

三、办半日班。边区每个农村普小都设半日班,招收因生产过于忙碌,不能全天进校学习的学龄儿童,给他们创造学习机会,实行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学习时间为一年到一年半。课程以识字、常识为主,摘掉文盲帽子。在农村实行办学中,除学龄儿童外,青年妇女都参加半日班,大部分在每天下午半日班上单独设班学习上课。

四、办冬学。冬学是利用冬季的空闲时间实施民众补习教育的组织形式。边区政府规定冬学为经常的一种学制,每年冬季都办,村村都有冬学。冬学专设教师,开学前由政府集中训练,大部分是回本村教冬学,本村没有条件的由县教科调剂解决。冬学每年办3个月,课程以识字为主。同时,还学政治常识、自然常识、算术、唱歌、周会等,把没有参加识字的成年人,即18岁到45岁的男女组织起来上冬学。经过一冬或两个冬季的学习,达到脱盲,标准是能识一千汉字,达到四会:即会读、会写、会讲、会用。年终测验一次,对最少能识300字,会写便条、会记简单账目者,经过考核符合标准的,发给脱盲证书,达不到标准的下年冬季再学。将达到标准中年龄轻、学习好的送到识字组担任组长,充实巩固识字小组,保证识字小组的经常性,使之不断提高。

推进中等教育与干部教育

关中分区的中等教育分中学教育与师范教育两种,其目的在于培养小学师范力量、地方文化教育干部及区、乡干部,同时培养一部分进步青年研究高深的科学技术,所以各中等学校带有干部

学校的性质,担负着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因此,各中等学校除接收小学毕业生外,还设地方干部培训班,接收现任区、乡干部。中等学校的教育方针,服从于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其具体目标就是要使教育符合抗战与民主的需要,符合边区抗战、建设及边区人民的需要。关中分区中等学校除各县级中学外,鲁迅师范学校(简称鲁师)、陕北公学(简称陕公)、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等先后迁来栒邑的马家堡、看花宫和坪坊一带办学。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在这里建校,边区的教育事业迅速得到发展。

鲁迅师范 鲁迅师范是陕甘宁边区于1937年2月在延安创办的一所中等学校。1938年4月,由于日寇进扰陕甘宁边区,河防吃紧,陕甘宁边区决定,将在延安创办的唯一一所中等学校鲁迅师范迁至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家堡办学,校长林迪生。鲁迅师范主要吸收边区学生,还收少量友区(指国民党统治区)学生,教学任务是为边区教育培养师资,推动边区教育事业发展。课程除开设文化课外,并结合实际开展军事训练。全体师生于生活条件艰苦之况,均坚持自力更生,努力改善教学环境,不畏困难所阻。该校初迁马家堡时,有3个班,教师10余名,学生130多名,分设师范班和预备班,学制不定。迁到栒邑后,在栒邑、邠县、长武等地招生,共计招收5个班,学员500多人。1938年8月,为培养高小教师及县、区级教育行政干部,鲁迅师范新办了高级师范班。1939年1月,抗日战争进入十分艰苦的时期。3月,学校由马家堡迁往照庄村原陕北公学校址。5月,“栒邑事件”发生后,部分学生迁往雷庄。7月,由于国民党不断制造磨擦,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鲁师与边区中

学合并,改名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鲁迅师范在马家堡办学一年零四个月,培养学生300余人。学校从成立到撤销的两年半时间里,毕业和中途分配工作的学生达1093人,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队伍,为发展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抗日战争初期“为争取国防教育之模范”。

陕北公学柛邑分校 陕北公学于1937年8月在延安创办,学生主要来自被日寇占领的沦陷区的爱国青年,由于学员不断的加入,校舍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又因柛邑接近西兰公路的实际,所以,党中央决定在柛邑看花宫开办陕北公学分校。

1938年7月7日,陕北公学柛邑分校在看花宫村举行了开学典礼。分校校长李维汉,党委书记申力生,教务部长邵式平,政治部主任周纯全,校务部长袁福清等参加了开学典礼。10月,分校学员由开学时的百余名增加到1700余人。后因学生不断增加,一部分迁入到柛邑县湫坡头镇的坪坊村、门家村和职田镇的照庄等村。陕公学生组织以自治、行政、军事分之,自治组织以学生会统管,行政组织以区、队编排,军事组织按班、排、连、营编制。教学分为高级队和普通队,高级队学制一年,普通队学制四个月,教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内容以文化和政治为主,军事次之。陕北公学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国民党党员、无党派人士、海外华侨、进步青年等,年龄大多为18至45周岁,学校提倡“忠诚团结,紧张活泼”,全体师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困难,溶政治、文化、军事、生活于一体。

1939年1月,陕北公学总校由延安迁到柛邑县看花宫村与分校合并,李维汉调中央干部教育部任副部长,陕北公学校长为成仿

吾,党委书记申力生,教务部长江隆基,政治部主任张然和。5月,枸邑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北上延安,渡河深入华北敌后,与延安鲁迅艺术师范、延安工人学校、安吴青训班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校址迁至晋察冀根据地。大解放后迁往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陕北公学在看花宫一年时间里,先后办了54个队,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3000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干部被分配在全国各个抗日战场、各条战线,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1943年改称关中师范、简称关师),创建于抗日战争初期,是中国共产党以培养边区抗战与建设工作的区、乡干部,地方文化教育干部和边区小学师资力量为宗旨,按半党校性质办学的中等教育学校。

1939年9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开办一所中等师范学校,遂派刘端棻、王伯勋、安已未3人到关中分区党政机关所在地马家堡,具体负责师范学校筹建工作。10月底,在关中分区党政负责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筹备委员会,分区专员霍维德任组长,刘端棻任副组长,筹备小组成员有分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郭炳坤、副部长高仰云,边区教育厅特派员师源、新正县三科(教育)科长杨辛程,分区抗敌后援会主任李森及马家堡乡乡长等。

经过实地考察,决定“二师”校址仍设在“鲁迅师范”的旧址,即马家堡村西边沟畔上原鲁迅师范修建的窑洞学校,这不仅是继承鲁师的校产,更重要的是继承鲁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胆革新的办学精神。刘端棻等人从延安带来原鲁迅师范的旧图书300余册,筹办期间,还收集了鲁师留下来的风琴1架,压面机1台,门

扇3副,凳子40条,饭锅3口,黑板3块,并购置桌子15张,小凳子100个及一些灶具。教育厅还拨给筹建经费700元的“二师”,实际上是白手起家。通过两个多月的筹建,“二师”已初具规模。12月初,从关中分区举办的冬学和边区各县完小中招收了60多名新生。

1940年3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在马家堡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告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诞生。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工、青、妇各界代表莅临大会,表示祝贺。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校长,刘端棻任副校长,教务主任刘耿,生活指导主任王伯勋。当时有教职员工24人。学校下设教务、生活、事务3个处,刘耿、王伯勋、季达分别任主任。学校编有师范、预备两个队。同年五、六月又分别增设妇女队和特别班。课程设置有:国文、政治、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科学、教学法、美术、音乐、军事等。

就在“二师”开学后的半个月,3月30日当天,关中分区军民各界在马家堡召开反汪拥蒋讨论大会,“二师”全体师生也参加了大会。当边区民众剧团演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新编剧《三岔口》时,顽军预备第三师竟从职田镇城楼上向马家堡开枪射击,事件发生后,“二师”奉命于当晚向新正县二区三嘉原的索罗村迁移。二师附小高年级学生也一同前往该村。此后,从1940年3月30日至1942年底,仅两年多时间,“二师”先后六次搬家,七次建校,历尽艰难坎坷。

1940年3月,“二师”随关中分区机关迁往新正县索罗村,住了一段时间后,顽军又向边区进攻,为了师生安全,学校于5月24

日即迁往新宁县二区的傅家山。

7月下旬,关中地区趋于平静,习仲勋指示学校重新迁回枸邑。8月17日开始搬迁,因为途中连续下大雨,师生中病号增多,加之山大沟深,行走艰难。3天的路程整整走了7天,8月23日到达枸邑后掌村,这是“二师”第三次搬迁,也是最艰苦的一次行军。

“二师”在后掌村住了3个多月,除了正常教学和召开民主大会外,10月中旬停课一周,开展生产劳动,共开荒100亩,打柴3万斤。11月中旬,顽军又发动对边区的进犯,“二师”又从后掌村向东沟马栏转移。那时,大雪纷飞,又是夜行,全校师生身背行李,到达马栏川的一个小山村蜈蚣洞。1941年6月27日,习仲勋曾从相距10多公里的阳坡头骑马赶到蜈蚣洞,在校门前沟口的大树下为师生作时事报告。

1941年8月,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迁驻马栏镇办公,由于住宿困难,决定“二师”迁往距马栏以西8公里的黑牛窝。黑牛窝是马栏川小河北边的一个小山沟,沟口周围散居着五六户人家,多是外地过来的贫苦农民,农民之间空有不少破旧窑洞,临河的石崖上还有数孔可供居住的石窑洞,这些废旧的窑洞经过整修,就成了师生们的栖息所,一到这里,学校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以打窑为中心的劳动建校活动。1942年元旦,是新校舍建成后的第一个新年,学校庆祝娱乐活动搞得热烈红火,师生们载歌载舞,欢庆元旦。关中分区党委书记兼“二师”校长习仲勋还特来参加联欢晚会,并和师生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

1943年初,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建议,边区几所中等学校都以所在地命名,这样,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便改名为

“关中师范”。关中师范归关中公署领导后,为了便于联系和加强领导,决定将分区教导大队在马栏住所与关中师范在黑牛窝的住所进行对换,这是学校建校以来的第六次搬迁。从1941年8月至1946年8月,“二师”(关师)一直在马栏,是“二师”建校以来居住时间最长的校址。自从学校迁到马栏以后,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改善师生生活,队员师生种了土豆、南瓜等蔬菜作物,都能吃到自己种的新鲜蔬菜,使师生们的学习、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从此,马栏便成为关中师范最理想、最稳定的学习生活园地。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调集胡宗南部不断进犯陕甘宁边区,关师于同年8月随关中分区党政机关北上转移,撤离马栏,向陕北、甘肃东部、山西西部迁移,一路跋山涉水经过石底子、石公寺、高窑子、槐树庄、盘克、合水、板桥、羊山砭、白马庙川、宁条梁、三十里铺、靖边、绥德到达吴堡县。1947年8月又从吴堡的宋家川过黄河到山西省离石县的军渡、柳林镇一带。同年10月渡黄河返陕,11月初回到枸邑县七界石的前梁上至12月。时因敌暂二旅侵犯关中,关师放假两个月疏散隐蔽,于1948年5月回到马栏正式复课,此间已经辗转了3个省的11个县。是年8月,在太村镇文家村的关中师范学校与彬县中学合并,吸收枸邑中学、耀县中学、中山中学部分师生,改称联合中学。从此,关中师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师”(关师)在频繁搬迁、转移的奔波中,全校师生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战斗精神,战胜了险恶的战争环境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坚持“敌来我走,敌走我办,边走边办”的方针,出色地完成了教育厅规定的教学任务,为革命和建设培育了大批的优秀干部,

在党的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回顾“二师”在艰苦战争年代里,坚持办学的光辉历程,是有应当追溯的内在因素。

具有坚强的组织机构和高素质的革命教员。学校行政组织是校长负责制,受专署、边区教育厅双重领导。凡原则问题必须经上级指示后方可作决定。如1941年8月,教育厅秘书主任张养吾和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等人,来校视察时,召开了校务扩大会议,共同讨论并决定了学校有关工作。“二师”校长由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兼任,副校长先后由教育厅派的刘端棻、邹锦城、袁子和、肖风、周子轩、张剑颖(兼)、田静忱先后担任。在校长领导下分设教导处,主任先后由刘耿、季达、邹锦城、张华莘、潘同和担任;总务处主任先后由王伯勋、王敏、冯宝仁、张仲良担任。另有生产委员会、干部学习委员会、经费核稽委员会。学生组织有学生会,下设文化教育、体育娱乐、饮食卫生、生产劳动、妇女指导各股,组织处理学生民主生活各方面的活动。学校的教职员工,1941年初创时28人,1943年42人,1946年27人。教职员的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技术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在教学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学校还设有党总支、支部。总支书记由王伯勋担任。学校党组织虽不公开活动,但实际上师生中的党团员在建校、教学和开展各项社会活动中都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具有科学的教学单位和卓有成效的教学工作。初创期,为适应在紧急战争中教学,教学单位按队编制,依据学生文化程度的差异编为师范队、预备队、妇女队、特别班,学生共120余名。在中期,环境比较稳定则改为班级编制,有师范二、三、四班和预备班,学生共140余名。在后期,仍为班级编制,有师范五、六、七、八班,

学生215名,到了1947年8月为了安全转移,在白马庙川改为劳山部第四支队,学生共四、五十名。关师从成立到合并,历时八年多时间,共培养毕业学生470多名。这些学生主要来自各县,在校学习多则一、二年,少则几个月后。这些毕业生多分配到地方参加教育工作,也有相当部分分配到党政部门及军队中。学生在校学习的科目、教材内容,因文化程度和班级、学期的不同,有广度和深度的差别,但一般只是大同小异。师范班设有:国语、数学、历史、地理、自然、政治、教学法、心理学、教育概论、图画、音乐、军事、书法、新文字、补充课(内容为党建、民运)以及土改方面的一些政策和时事材料等。师范的学制开始为1至2年,1943年后为3年。在办学过程中采取了“教育与战备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在教学方法上,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除课堂讲授外,采用学生自己学习与集体讨论等方法,并注重社会实践,开展社会调查与活动。结业前期,组织学生在附设小学实习。在教学时间上,不因迁校、杂勤劳动过多而影响学生学习,保证教学时间,注重从教学与管理等各个环节措施上不断改进,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关师还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组织寒假工作团下乡宣传,做地方工作,对群众进行社会教育。帮助当地政府办冬学,慰劳军队,优待抗属等,并参加地方反奸、拥军、减租。组织秧歌队,宣传政府政策、法令。每到一地,就积极支援当地群众生产。1943年在马栏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等。从1940年夏开始,每年同专署合办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和新文字冬学教员训练班。从1943年春开始至1947年附设地干班,共培训边区区县乡干部256名。地干班修业期限一年至一年半,学习科目有国语、算

术、地理、历史、音乐、政治常识。以此来提高边区小学教员文化和区乡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

坚持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校风。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学校经费严重不足,加之敌人封锁、围困和驱迫,教学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粉笔,用木炭、白粘土做;没有笔墨纸张,用桦树皮订本子,“特别班”采用沙盘练字、答试卷;没有课本,凭着理解和记忆及笔记来学习;没有教室,在大树底下上课;没有宿舍,住牛舍;没有桌椅,大腿当课桌;没钟表,燃香记时;没油点灯,把音乐课放在晚上;没鞋穿,编草鞋;食粮紧张,吃黄米面杠子和锅巴。学校迁往各地都得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打窑洞。在索罗村开荒 150 亩,种柳树 150 棵,种菜 60 亩。在黑牛窝打窑洞 38 孔,砍柴烧木炭 10 万斤。平时泥墙、拉粪、割草、拉锯、背板、打柴、烧木炭、驮水、做饭……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培养了全校师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作风;团结一致、平等相处的革命精神。党的优良传统在关师大为发扬。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的历史是坎坷、曲折、艰苦而光荣的。师生员工的音容、足迹留在了陕西、甘肃、山西及其所辖枸邑、宁县、富县、合水、甘泉、保安、延安、靖边、绥德、吴堡、离石等 3 省 11 县。党的抗日主张和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思想,撒在了晴朗的黄土高原上,传到了古老的长城内外和咆哮的黄河之滨。一批批的热血青年、干部从“二师”毕业,走向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的第一线,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抗日荣誉军人学校 抗日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是我党创办的一所残废军人学习疗养的学校,开始在泾阳县安吴堡,因为国

民党进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1938年冬由安吴堡迁来边区看花宫一带,1940年迁往甘泉县下寺湾。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为了收容在战争中负伤或致残的军人,中央卫生部先后在蟠龙、青化砭、云崖、安河镇及甘肃省的曲子县等地,成立了五个“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泾阳县安吴堡军人残废医院是同年12月成立的,当时叫第五残废医院。1938年春,在何长工的提议下,毛泽东和李富春商议,决定成立总院,院部设在泾阳安吴堡,同时将“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改名为“荣誉军人教导院”。何长工任总院院长,王群任政委,负责总院工作。当时荣院伤残人员2800多人。

1938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破坏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不断制造磨擦事件。由于教导院学员住在国统区,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1938年冬,教导院将一部分伤残人员迁往柞水县湫坡头乡坪坊一带。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十分艰苦的时期,从前线下来的伤残人员增多,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当时教导院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加之国民党反共磨擦不断加剧,教导院于1939年初全部迁往旬邑县坪坊、看花宫一带。

1938年底,教导院全院1700多名学员在校长王群的率领下,多数同志不顾四肢严重伤残的痛苦,手扶拐杖,肩背行李,跋山涉水,进入柞县土桥地区,被驻防在土桥附近的柞县保安团获知,千方百计阻挠学校北撤。

当第一批荣校先遣人员罗新长、田志芳在土桥镇附近的井坳号房子宿营时,柞县保安团团长沙相堂部堵住村口不让进村。罗新长当时不仅严正驳斥了敌人搞磨擦、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恶劣

行径,又严厉提出质问:“现在国难当头,国共合作、抗日救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你们既然有本事,为什么不到前线打日本人,却在后方搞磨擦?”并组织大家集体唱起了“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有希望……”的歌曲,这些顽固分子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只好让学员进村宿营。当晚,他们又密谋策划更大的磨擦事件,第二天他们从邠县、淳化调集近千名保安队人员,包围学员住所,迫使学员离开此地。为了顾全大局,避免武装冲突,我方主动撤离,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荣校学员辗转到达坪坊村,使敌人制造磨擦的企图未能得逞。

学员进驻坪坊村后,奉上级的指示,将“荣誉军人教导院”改为“抗日荣誉军人学校”,校长王群(兼政委),在校部下设秘书处,处长张宪志,校务处处长于桂武,副处长黄自强。校务处下设管理科,科长何秉文;卫生科,科长单克,后为何晓春;管理科又下设会计股,股长汪运先;粮秣股,股长赖光武;军需股,股长张一平,后是张俊清。政治处主要负责宣传、组织等事宜,处长陈振西,后为陈成钜。下设有民运股、组织股、宣传股、并设一个俱乐部。教务处主要负责学习及思想工作,处长杨霖。警卫连,连长陈桂林,指导员陈光金,共160余人,主要负责学校的安全。通讯排,排长司明举,共30多人。学员1700余人,分三个队:一队队长叶和寓,住坪坊、看花宫村;二队队长龙须,政委阎耀盖,住湫坡头村;工业队约一、二百人,部队住正宁县关家川一带。

荣校迁来枸邑后,所有伤残人员面对国民党的重重压力和险恶的环境,身残志不残,以高昂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办工厂,纺纱、织布、缝衣服、做袜子、造药品。轻伤战士

和荣校职工开荒种地,磨豆腐、养猪、养鸡,进行自我服务,从而解决了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改善了学员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又支援了前线。工业队还将自己生产的纸烟等产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给了高度评价,称赞说“你们搞得不错!”荣校除搞生产以外,还坚持教学上课、识字学文化。学员们克服困难,用木棒削成铅笔在地上练习写字。教师用的粉笔是用红胶泥搓成的,晒干后当粉笔用。学员们以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生活着,每天革命歌声不绝于耳,还进行歌咏、球类比赛。荣校的“雪花剧团”还经常演出“兄弟开荒”等剧目,充满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他们的这种精神和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在和群众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荣校从泾阳安吴堡到迁往枸邑坪坊、看花宫不到两年时间,不论是伤病员还是学校工作人员,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克服困难的顽强精神,给枸邑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至今,他们的事迹还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并未放弃亡我企图,1939年5月,发生了骇人听闻,震惊国人的“枸邑事件”,由此拉开了关中地区反磨擦斗争的帷幕。1940年2月,国民党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关中分区所在地枸邑成了敌人进攻边区的前沿,荣校遂迁往甘泉县下寺湾。6月迁到延安,学校改称“陕甘宁边区教养院”。1949年,教养院又迁往关中,分别住在华阴、宝鸡、平凉等地,分别称“陕甘宁边区第一、第二、第三荣誉军人教养院”。1988年3月1日定名为“陕西省荣誉军人康复医院”至今。

这所光荣的革命学校,使数以万计的伤残荣誉军人身体得到了康复,生活得到了新生。在这里他们提高了文化水平,学会了建

设社会主义的本领,重新走上了革命和建设的战场,有很多同志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干部教育 抗战时期,党和边区的干部队伍中,大多数出身于工农,文盲比重大,他们缺乏马列主义基本修养,虽然有革命积极性,但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一批从全国各地奔赴边区的革命青年,虽有革命热情,但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适应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因此,关中分区从抗战初期就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制度,组织在职干部边学习边工作。1940年,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各分区县市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和《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关中分区把在职干部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来抓,对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组织形式、学期、经费、考试及奖惩制度等都做了具体安排。

分区在职干部的教育主要包括:业务、政治、文化、理论等方面内容,以文化为主。业务教育,主要是学习与工作有关的一切政策和法令,学习本部门工作的历史知识与科学技术知识。政治教育,主要是对干部进行时事和政策教育,学习中共中央、西北局及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决定等。文化教育,以干部文化程度高低分高、中、初三级进行,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及自然、社会常识和有关课外读物。理论教育,主要是对干部进行革命的基本理论教育,或根据需要选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有关著作。

同时,充分利用农闲时节,关中分区党委先后组织举办地方干部培训班7期,每期半年,对320余名区、乡干部进行文化教育、农村政策教育和政治形势教育。通过训练班的学习培训,提高了区

乡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成立关中八一剧团与发展群众文艺

关中八一剧团的建立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八一剧团是由“七月”、“关警”、“关中”三个剧团合并而成的。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为革命文艺战线上的一支劲旅。

七月剧团,1939年7月1日在泾阳县云阳镇成立,是中共地下陕西省委(对外公开称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直接领导的剧团。

关中剧团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专署领导的剧团。1939年深秋在地委驻地新正县马家堡成立。演员多数是从机关干部、勤务人员中抽调的在文艺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同志,开始时只有20多人,后来逐步扩大到40多人。1940年4月间,延安民众剧团下关中巡回演出时,该团全体业务人员随其学习约两个月时间,业务水平有了较大长进。

关警剧团于1940年秋季在关中分区新正县阳坡头区北壕村成立,隶属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成立之初称关保宣传队,不久改称关保剧团。1941年11月随司令部进驻马栏,保安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剧团并随之改为关警剧团。人员主要由从部队抽调的干部、战士共30多人组成。剧团经常为关中分区各地的驻军和群众演出,颇有影响。

七月剧团、关中剧团和关警剧团都是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土生土长逐步发展起来的。为了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他们在不同的地区顽强地战斗、演

出、发展、壮大。

1942年1月,七月剧团、关中剧团和关警剧团合并,在马栏镇成立了关中八一剧团,隶属关中分区领导。王维之任协理员兼团长,石生芳任副团长,卫新任党支部书记,下设团务委员会、教育股、总务股和演出队等机构。演出队又分六个小队。第一小队为舞美队、第二小队为文武场面(即乐队)、三至六小队为演员队,各小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全团共七十余人,实行战时供给制,专业革命文艺演出团体。

剧团合并后,人员众多,力量雄厚,由于马栏驻地比较稳定,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对看戏有了较强的艺术欣赏要求。由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驱动力,促使剧团在艺术上更上一层楼。省委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剧团的业务建设,汪锋同志派人通过封锁线到西安城隍庙订做了“戏箱”,费尽周折运回马栏。

1942年冬,八一剧团被调往延安为西北局高干会演出,首先在边区政府礼堂演出《民族魂》、《石达开》、《三滴血》三场戏。观众场场爆满,情绪热烈,掌声阵阵,赞语不绝。演出期间,各地盛传“关中真正的秦腔上来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高兴地握着剧团同志的手说:“听说你们原是从部队战士中抽出来学戏的,演得好呀。这几个戏的内容能紧密配合党的整风学习。”演出的消息一传开,各单位纷纷邀请,西北局管理人员应接不暇。为了满足各单位的要求,剧团演遍延安的各个礼堂,轰动了延安。西北局让在延安南关市场后沟广场售票演出,时值隆冬腊月,观众仍挤满了剧场。

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也观看了八一剧团演的戏。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剧团赠了一幅舞台前幕和一条舞台横额。横额

上题字是“为实现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新文化而奋斗”。前幕是对拉式的两大块,中间是近乎一米见方的“推陈出新”四个大字。上款“八一剧团留念”下款“中共中央办公厅赠”。党中央给剧团赠幕题字,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尚无二例。这是党中央对八一剧团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演出,弘扬民族文化以及在艺术上取得的显著成就的肯定和奖励,也是给剧团全体同志的鼓舞和鞭策。

剧团成立后,聘请蒲城“景化社”的赵德蒲和西安易俗社的周玉民为导演和教练,选《盗御马》、《八腊庙》、《取长沙》、《走雷》、《烙碗计》、《三回头》、《打草鞋》、《访白袍》等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唱、念、做、打过硬的戏苦练基本功。并开设语文,音乐、美术、历史、政治等文化课学习,提高演职人员素质。1945年上半年,中宣部又从鲁迅艺术师范学院调来刘采石、胡仁智、吴铭等给演职人员上理论课,提高全团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与此同时,剧团还结合实际创作出了一批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残酷统治,反映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精神,以及教育边区人民发展生产的剧目。据不完全统计,关中八一剧团先后编排秦腔现代戏、传统戏,眉户现代戏、传统戏,歌剧,话剧等剧目250多个。其中有赵伯平和张剑颖创作的《新考试》、《大上当》、《特种学校》、《关中四杰》、《张清益》、《胡文贵》、《石明德》、《冯云鹏》等,改编了秦腔古装戏《三滴血》、《石达开》、《风波亭》等,还先后编排了《屈原》、《军民一家》、《劳军》、《民族魂》、《三岔口》、《那台刘》、《中国魂》、《投降之味》、《一条路》、《好男儿》、《好儿童》、《桃花村》、《小放牛》、《做军鞋》、《抓壮丁》、《坏蛋》、《上前线》、《打麻雀》、《金莲痛史》等剧目,在分区各地巡回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以后,剧团创作上演了一批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秦腔剧目《儿子》、《兄弟会》、《关中炮火》、《闯王遗恨》、《白毛女》等。

1947年3月初,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剧团埋藏重要物资,用十二头骡子驮上戏箱,离开马栏,开始转移。3个多月时间,从关中到陇东,延安、三边分区,再到晋绥边区。同年农历8月15日回到绥德地委所在地雷家峁。一边转移,一边演出,一边打阻击,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受到了联防司令部王维舟副司令员多次表扬。1948年四、五月间,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关中分区,剧团随军演出。10月,剧团改称为关中分区文艺工作团,1949年5月改为三原分区文艺工作团。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陕西省文艺工作团。1953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该团调入西安,改建为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1955年4月又与西北戏曲研究院合并,成立了陕西省戏曲剧院。

关中八一剧团是党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的一个从无到有、逐步成熟起来的、富有战斗力和创造性的文艺团体,在关中分区十多年间,全团同志以革命的热情、坚强的意志和宝贵的青春,谱写了中国革命文艺史上激昂慷慨的动人乐章,在边区革命文艺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发展群众文艺 关中分区的群众文艺非常活跃,最有影响的是新宁县南仓村社火队,曾闻名于陕甘宁边区。还有新正县也成立了民教馆,各乡、民教馆设有俱乐部,组织群众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农闲、逢年过节,组织学生和群众扭秧歌、耍社火、教唱革命歌曲、排演小剧目,开展象棋、球类比赛。同时,一些民间艺人和人民群众把对地主的仇恨和对共产党、人民军队的热爱,用民歌、顺口

溜、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产生出优秀的作品。特别是新宁县南仓村农民刘志仁自己创编了《新开荒》、《新小放牛》、《九一八》、《卢沟桥》、《救国公粮》、《新十绣》、《反对磨擦》、《保卫边区》、《大生产运动》、《四季歌》、《百团大战》、《读书识字》、《反特务》、《边区好政府》、《改造二流子》、《劳军歌》、《减租》许多反映新生活的秧歌剧本,组织群众排练演出,受到群众的普遍好评。

新正县马栏三乡木匠汪庭有是从商南逃荒来的贫苦农民,自幼家境贫寒,饱受地主的剥削和国民党军队的压迫,1941年,八路军来到他的家乡,改变了他的生活,为了感谢八路军和毛主席,酷爱唱歌的他利用民歌《绣荷包》填新词,歌颂毛主席,歌唱新生活。当时他还不识字,边编边唱,常常会编好后一段,忘了前一段。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把编好的歌词教给孩子们,如果忘了就找孩子们来唱,经过艰辛的创作,共10段80句歌词朴实、曲调优美的新版《绣荷包》终于创作出来了。后经著名诗人艾青修改,将新版《绣荷包》改成了《十绣金匾》。歌曲一经问世,立即在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并在全国广为流传,成为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大会上,汪庭有、刘志仁荣获“特等艺术英雄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创办《关中报》

《关中报》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党委的机关报,创刊于1940年4月12日,1950年4月终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它是党动员群众、教育群众、鼓舞军民的有力武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磨擦事件,先后侵占淳化、栒邑县城及新正、赤水的部分地区。此时,关中专署和中共关中分委机关分别搬到了新正县阳坡头和雷庄,连接延安狭窄的通道随时有被截断的危险。为了指导关中分区军民建设边区和进行反封锁、反磨擦斗争,时任分委书记的习仲勋决定创办分委的机关报,以利于坚持长期斗争。他的提议得到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同意。《关中报》创刊时,报头由习仲勋题写;其后又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题写;创刊一周年时,毛主席欣然执笔为《关中报》题名。关中报社组成时,分委宣传部长高仰云兼任社长,胡炎任主编。

1940年4月,《关中报》创刊于关中分委机关驻地新正县雷庄村(1941年秋随分委机关迁往马栏镇)。初为油印、4开两版的周刊。到了1941年4月一周年时,改为三日刊、两版,这样保持了三年半。1944年9月,《部队生活》与《关中报》合刊,改为五日刊、4开版的石印报。警备区政治部还派出两名编辑和一名缮写者常驻报社,专门负责《部队生活》专版。后来又兼出《学习导报》、《大众读物》、《时事要闻》等油印报。此时报纸的发行量由400份增加到800份左右,1945年时达到了1400多份。1945年7月,《关中报》又改为三日刊、两版。抗日战争胜利后,还不定期的编发《时事要闻》,每期发行400多份。在1947年夏,敌人重兵“围剿”关中分区,报社跟随关中地委北上吴旗县时,指派程志坤、白玉洁和王兴中南下淳耀、赤水一带,编印《关中报》在南线版的《时事要闻》,先后共出7期,时间虽不长,影响却不小。另外,还出过4开一版到两版的“号外”,及时报道战况和大的战役、战斗消息。

1949年春,随着关中部分县的解放,西府地委、东府地委、渭南地委相继成立。4月4日,奉西北局电令,中共关中地委改称为三原地委,关中报社随之迁到三原。1950年4月,根据中央及西北局关于统一国家财政,减少机构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中共三原地委与中共咸阳地委合并,《关中报》也就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关中报》是在战火里生战火里长,又是在欢庆胜利的礼炮声中宣告终刊的,历经十年的战火洗礼,共出版700多期,发行58.6万份。

《关中报》在其十年征程中,由于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的共同关怀,新华社、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记者站同志的大力支持,广大通讯员的积极参与,全体军民的热爱和支持,以及一批批新老报人的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结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办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良好口碑。大家说它是“黄土地孕育的红奇葩”、“战火中飞出的金凤凰”等等。但是,最为中肯的评语是:《关中报》是党和人民的连心桥。比喻贴切,形象生动,简明易懂,准确地概括了《关中报》的历史使命。《关中报》曾在西北局召开的宣传部长会议上,被一致认为是在边区各分区的报纸中办的较好的。在1944年10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会上被誉为边区地方报纸的模范。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中报》办的最好!”(1944年12月9日刊)

《关中报》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殊荣和评价,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正确的办报方针,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随时随地、灵活机动地开展新闻宣传,既发挥了报纸的强大功能,也为我们党积累了新闻宣传

工作方面的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党报是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喉舌,是党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引导群众,为其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努力奋斗的有力工具,也是党和人民群众互通声息、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关中报》的十年,正处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时期,《关中报》始终把宣传好、学习好和贯彻好毛泽东思想及党的方针政策作为着重点,体现于《关中报》的各个版面、时政评论以及重要新闻中。

第二,坚持了正确的办报方针。在中共关中地委的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宣传党的路线,反映对敌斗争的形势和任务,报道军民群众中涌现的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鼓舞群众以满腔热忱投入到保卫关中、保卫延安的对敌斗争中。

第三,坚持了正确的领导方式。关中分委、关中地委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张德生、赵伯平等都对《关中报》采取“抓政治、严把关、多指示”的领导方式。分区党委领导同志亲自领导和指导办报,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不但对每期内容都要亲自审定,还为报纸撰写社论或代论。地委书记赵伯平、秘书长张中经常给予指导,帮助解决办报中遇到的困难,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第四,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办报思想。《关中报》是中共关中分委创办的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它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大众的代言者。由于关中分区地处黄土高原,多半是山梁梁、沟洼洼、穷窝窝,经济不发达,教育相当落后,在区乡干部中文盲、半文盲占多数。这就要求报纸在通俗化方面下功夫,写老百姓的事,说老百姓

的话,为人民写,给大家看成了创刊时的原则。地委宣传部长张剑颖所写的《反内战三字经》等文章,立场鲜明,语言泼辣,读起来琅琅上口,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为了扩大稿源,报社组织培养了一支遍及县区的专(兼)职通讯员队伍。同时,还倡导区乡干部、积极分子组织了许许多多的读报组,在炕头、村头、地头,在互助组里,利用劳动间隙,由认识字的人给不识字的人读报。人民性、群众性连同通俗化、口语化,是《关中报》显著的特点。仅1944年1月至8月就有636人投稿2568篇,为办好《关中报》奠定了基础。

第五,保持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关中报社人员从领导到工人,无一读到高中毕业,无一超过二十五六岁,就是这样一批文化不高、革命历史不长的年轻人,他们就是用所谓的一台印刷机、一部收音机、一头驮运东西的大青骡子,冬天被敌人围困在深山里,渴了吞点雪、饿了嚼些野菜,晚上和游击队员在破窑洞里背靠背相依抵御严寒,在战争实践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就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出色的完成了党的重任,把《关中报》办的光彩夺目。

推动卫生事业前行

关中分区所辖地区山区县较多,特别是新正县(一部栒邑县)大部在山区,由于自然条件差,群众生活贫穷,卫生观念落后,再加之兵患和饥荒的危害,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较低。

1938年以来,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在关中分区的领导下,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大力宣传卫生科学知识,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改变陋习,揭穿和取缔巫神、马角骗钱

害人活动。发动组织民间中医为群众治病,同时挖掘、推广民间秘方经验,利用当地药物资源,开展群众性的防病治病工作。

1944年,关中分区召开了文教卫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推动了全分区卫生事业的发展。1944年春,新正县雷庄村张治平首次创办了妇女助产培训班,为期14天,培训新法接生员20余名。培训期间,教员采取课堂讲授与座谈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向学员传授新法接生、儿童保育和妇女卫生知识等。结业后,这些学员即在农村进行新法接生的宣传、推广,受到广大妇女的欢迎。同年6月,关中分区应广大妇女的要求,又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助产训练班,培训新法接生员36名。训练班除讲解新法接生、儿童保育和妇女卫生知识外,还增加了生理卫生和公共卫生的内容。

关中分区地方病防治工作起步较早,且取得一定成效。1944年8月,关中分区医药研究会成立,其主要职责是指导并推动全分区的医药卫生工作,组织中西医创办卫生合作社,为群众防病治病。该会成立后,即筹办了马栏医药合作社,所经营的药品比市场价低30%左右。后又在马栏区创建了卫生实验村,由医生和干部帮助群众打烟囱、修厕所,实行人畜分宿;宣传不喝生水、不缠脚等,组织周围乡村群众前去参观学习。关中分区医药研究会在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瘰疬”(甲状腺肿病)和“柳拐子”(大骨关节病)等地方病上也取得了一定疗效。

为了把卫生事业普及到农村,各县、乡以两三个自然村为单位成立卫生小组,开展卫生竞赛活动,组织各乡村经常开展卫生检查评比活动,表彰奖励卫生先进家庭和个人,为群众树立榜样。1944年9月,湫头镇郭德林被新正县政府树立为模范卫生家庭。郭德

林家共有 19 口人,从 1940 年开始,坚持不喝冷水,不吃生冷食物,尽量不做剩饭,经常清洗水缸保持饮水新鲜;勤拆勤洗衣服被褥;坚持打扫室内外卫生,清除脏物。畜圈勤垫土、勤打扫。四年全家老少人人健康,成为当地群众学习的榜样。边区《解放日报》以“新正郭德林讲卫生,全家四年不得病”为题作了专题报道,并倡导在全区推广。

第四节 关中分区的军事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和军事包围,进而不断制造磨擦事件,乃至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封锁线。在陕甘宁边区的正面,东起黄河西岸,经陕西宜川、洛川、宜君、同官、耀县、淳化、栒邑,接甘肃境内的宁县、西峰镇、镇原,入宁夏境,经固原、黑城镇,至同心城,北面与国民党马鸿逵部衔接,构成一条贯通三省,长达千余里的封锁线。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的关中分区,东、西、南三面处于国民党胡宗南部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之中,成为反封锁、反磨擦的前沿阵地。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通过所谓的“限制异党活动”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以“合法”、“统一”为名,限制我党及其军队在敌后的发展,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并派遣军队,进至抗日后方不断制造磨擦,从政治上

反共，一直发展到军事反共。在陕甘宁边区，继陇东分区的镇原、宁县事件后在关中分区制造了震惊国人的“土桥事件”和“枸邑事件”。

土枸事件起波澜

早在1938年12月15日，因河防吃紧，我八路军原先设在黄河边上的荣誉军人学校（残废院），奉命由泾阳县云阳镇向关中分区转移。路经枸邑县城南的土桥镇城下，遭城内国民党保安队袭击。次日，国民党保安队将部分八路军荣校伤残人员包围并强行扣压了路条，荣校在多方解释无果的情况下，忍辱退回原防。12月18日，国民党枸邑县政府又下令各保甲不准卖给八路军伤员粮食和蔬菜。荣校因粮草断绝，遂于1939年1月12日奉命向土桥开拔，又遭顽军包围，并将荣校派去谈判的人员扣留（后释放）。1月16日，国民党反动当局调集枸邑、正宁、邠县、淳化等5县保安队300余人及壮丁队500多人先后集结于土桥。22日，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与三原、泾阳的保安团也相继赶到土桥，在国民党邠县保安司令郑伯庸的指挥下，以2000之众将荣校伤残人员重重包围，并鸣枪胁迫退出该地，为了避免暴徒对手无寸铁的伤残人员的无故屠杀，荣校伤残人员忍痛退至枸邑县城以北数十里处的看花宫一带。这一事件时称土桥事件。为此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电告蒋介石，蒋回答：“已告陕西省政府制止矣”，然而，这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句空话。

1939年5月下旬的一天，驻看花宫的八路军抗日荣誉军人学校采购员陈应通由云阳返回枸邑，途经甘峪坡时，被国民党驻枸保

安大队暗杀,事件发生后,双方共同查验现场,系枪杀,确认子弹为陕西保安团配备的步枪所特有,且有群众证明为三个穿着陕西保安团服装的士兵所为。因此,荣校派校务处副处长董志强等人和县长张中堂谈判,要求公开承认暗杀罪行,惩办凶手,赔偿损失,隆重安葬陈应通,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国民党县长拒不答应,斗争越来越激烈。当谈判尚在进行中,张中堂又密令将从乾县返回的关中分区参谋张科科在路经县城时抓捕,八路军驻枸办事处知道以后,即派办事处主任田润芝前去县府谈判交涉,提出立即释放,张中堂当面答应,但在田刚出大门时,就枪杀了张科科。

5月25日这天下午,荣校30多名学员,前往国民党枸邑县政府请愿,要求交出杀人凶手,国民党当局拒不答应,且令驻军陕西保安第六团向请愿学员开枪,当场打死伤残学员代表9名。随后张中堂又率大队人马,向驻枸邑县城的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进攻。同时还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配合国民党保安六团日夜围攻关中分区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荣校请愿人员以手榴弹还击,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闻声参战,双方展开激战,持续七天七夜。后国民党调来陆军二十八师的八十一、八十二两个团增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经请示上级同意,独立营及三八五办事处于6月1日晚被迫撤出县城,开往店头村驻防。3日后,撤驻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家堡。出城时,荣校有17名重残人员掉队,被保安队逮捕,经毒打后,全部被杀害。这就是在国共二次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无视抗日统一战线大局,蓄意制造的震惊国人的枸邑惨案,时称“枸邑事件”,又称“五·二五事件”。这一事件在关中分区军民中激起极大义愤。枸邑事件也揭开了陕甘宁边区磨擦斗争

的帷幕。

这些在抗日战场上虎口余生的伤残人员回到抗日后方却惨死于“友军”之手,使人深感痛心与愤慨!独立一营官兵纷纷要求增兵进行还击,夺回失地。党中央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和平解决。时任关中分委书记的习仲勋和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张仲良致信国民党保九团尤奉山,晓以民族大义。信中说:当前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为前提,而后方少数顽固分子,无端造谣,祸起萧墙,日寇高兴,汉奸窃喜,你应明察实情,悬崖勒马。尤奉山看后深有感悟,回信表示: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但我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再向贵区前进一步。

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根据关中分区报告和党中央的方针,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发了急电,谴责了张昭经、张中堂一伙制造这一杀人掠地惨案的罪行,悲愤而又克制地指出:“查敝军残废兵员,以抗敌余生,养息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要求陕西省政府派员查处此案。毛泽东审阅了这份电文,要求肖劲光同时致电蒋介石和程潜。此外,肖劲光还就这一件事,向全国发了通电,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反动派杀人理亏,不得不派人调查处理。枸邑事件我们虽然受了些损失,但也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揭露了顽固派破坏团结,惨杀抗日伤残员兵的罪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反磨擦斗争

延安,是陕甘宁边区首府,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枸邑,是陕甘宁边区前哨阵地,也是关中分区所在地,是通往延安的一条要道。从1939年底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在关中分区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胡宗南部在关中分区夺地掠城,派遣和纵容土匪抢劫骚乱,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群众,蛊惑人心,企图蚕食关中分区。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生动描述了边区当时的形势:“谋我者处心积虑,计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国民党军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将目标指向了关中分区党政首脑机关驻地马家堡。早在1940年3月30日下午,关中分区军民在马家堡举行反汪拥蒋大会时,驻枸邑职田镇国民党预备第三师补充团一营突然用火炮和重机枪轰击马家堡。同时向新正县四区看花宫一带进攻。关中分委停止开会,分区部队紧急出动,击退来犯之敌。鉴于顽固派有大举进攻之势,经军政领导研究决定,分区各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及二师学员转移至距马家堡以北十余里的长舌头。

5月8日,国民党陕西保安四支队郭相堂、李仰之、苟福堂三个中队伙同国民党军预三师八团向关中分区新正县六区一、二乡进攻,当地民兵、自卫军奋起反击。

5月19日上午,预三师以两个营的兵力会同国民党宁县保安队及壮丁队约千余人,侵占了新正县的西坡村一带。下午,国民党

职田镇驻军又用迫击炮轰击马家堡,炸死我驻军通讯员1名,炸伤群众6人。面对新的形势,关中分委认为固守马家堡,不利于反磨擦斗争,为争取主动,决定分区机关和部队主动撤离马家堡。当晚,关中分区部队撤出了驻扎了三年多的马家堡村,先驻长舌头,后于6月中旬全部转至阳坡头村,这里又成为关中分区的领导机关新的驻地。

阳坡头是位于马家堡东北方向二十五公里沟湾处的一个小村寨,居有十多户人家,四周筑有土墙,周围地势较为平坦,是由枸邑方向通向北部山区的必经之路,易于防御驻职田镇的顽军北犯,但是,由于地形原因,吃水、烧柴、存粮均较为困难。关中分区机关迁驻此地后,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驻阳坡头城内,关中分委、关中报社驻扎阳坡头以南二里地的雷庄。

此时,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不断加剧。6月8日,郭相堂、李仰之率其两个中队侵占了关中分区赤水县井村。11日晨,国民党淳化驻军猛袭驻该城的关中分区独立二营,战至12日晚,独立二营奉命撤出淳化县城。之后,国民党保二旅从马栏向刘家店一带袭扰,山河方面的国民党甘肃保安部队向新正一区袭扰,正面以国民党军预三师为主力向关中分区部队进攻。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向关中分区发起武装进攻64起,抢劫骚扰38起,先后占领了正宁、宁县、淳化、枸邑4县及关中分区新正县四区、六区和赤水县的官庄、梁庄等地5个区40多个乡。

据1940年6月7日《新中华报》称:“关中顽固分子四路大兵围攻新正县,奸淫劫掠实行恐怖政策,炮击马家堡民众惨遭死伤,5月8日以千余人进攻新正六区,16日进攻四区,18日以一个团进

攻新正四区甘家塄子,同独立营激战2日。18日攻,20日占马家堡。19日驻山河两营,配合正宁保安队200人进攻新正一区,齐家庄等均被占领,新正六区东牛家坡居民万西焦被抢法币800元,去团部要求偿还,被枪毙。六区被抢去布200余匹,合作社被抢劫一空,救国公粮被抢去七石一斗,东西牛坡妇女全被强奸……”以上足见国民党顽固派搞磨擦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1940年10月至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掀起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虽然其重心在皖南,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磨擦有增无减。国民党胡宗南部企图先夺取关中分区,后直取延安,先后对关中分区的职田镇、马家堡、井村、马栏等地展开猛烈进攻。他们一方面在政治上大造反共舆论,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企图消灭中共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连续炮击关中分区辖地几十次。

为了粉碎顽固派的反动图谋,关中分区军民奋起抗争,顽强战斗,进行反磨擦斗争,并接连取得胜利。

1940年2月,国民党军队在甘坡嘴修筑了一个碉堡,驻一个班防守,关中分区独立营侦知后,派两连队伍,以一个排攻打碉堡;一个排深入县城附近活动,阻其增援;另一个连作后备援助。晚上3点摸入壕沟,迅即爬上碉堡,从枪眼里扔进炸弹,炸死11人,仅半小时结束战斗,缴获新式步枪12支,拔掉封锁线上的一颗钉子。

1940年5月间,关中八团和三团二营400多人,分三路向马栏进攻,一路从芋子沟南梁下来,一路绕药王山从南梁下来,一路顺川从街东边过来把敌人包围起来,战斗在鸡叫前后打响,天明结束了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除跑掉少部分敌人以外,其余全被俘虏。

1940年5月下旬,关中独立三营300人,由营长吴志升带领,从刘家店下来驻在油坊沟,准备消灭重新占领马栏的一营国民党。国民党为了增强马栏军事防守力量,从岷庄调来一个营300多人直接去马栏。当行至转角时,与马栏游击队及独立三营侦察兵接火,三营后续部队立即从油坊沟口绕马儿沟抄其后路,并在马儿沟口架起重机枪设伏等待。马栏游击队侦察部队边打边退,诱其进入了包围圈时,三营指战员发起猛攻,以一个连的兵力攻击正面,其余部队两侧夹击。在强大火力攻击下,将其击溃,俘100余人,缴枪200多支。转角战斗结束的第二天,驻守马栏的国民党军闻风逃窜。

1940年5月,四、六区(湫坡头、底庙)失守,国民党保安团李树铭带100余人驻东牛村。为了拔掉这个钉子,7月15日,八路军后防留守独立第一营营长罗春生,政委王四海,带领三个连400余人,以野外演习为名,午饭后从长舌头出发,先在甘肃三嘉原黄柏村插了一面红旗,让部队行军夺旗。出发半小时,二连将旗夺走,部队到达康家园子驻扎。16日下午,营部作了战斗部署,组成突击组。当晚冒雨出发,天快亮到达牛家坡村城下,选好突破口,立即架云梯登城攻击。守军负隅顽抗,突击组战士加强火力反击,一举取得战斗胜利。俘100余人,打死打伤20多人,缴枪100余支,当场处决了团副,团长李树铭带伤逃脱。

1940年后季,为了加强对边区的攻势,枸邑保安团200余人,纠集张洪第五德才带领的自卫大队100余人,土桥李作贞带领的自卫队100多人,驻扎土桥,威胁边区安全,并伺机进攻边区。一天,关中独立营三连和刘三才带领赤水保安队配合,分三路向土桥

行进。一路从小宁向南；一路绕至土桥以西向东；游击队和保安队从中嘴出发到土桥沟向西，三面包围了土桥城。入睡后开始攻击，当北边部队率先冲上土桥城后，守军已向南逃跑，只捉住了土桥镇长马瑞林，就地处决。游击队动员群众挖倒了土桥城，捣毁所盘踞的巢穴。

1940年6月，枸邑自卫大队郭相堂于淳化县井村全军覆没以后，回到枸邑又重新组织了自卫队100余人，驻在边区前沿职田镇那坡子村，与边区相抗衡。独立营决定七连打歼灭，六连到那坡子和职田镇之间牵制职田、店头国民党驻军，五连作预备队随营部行动。晚上4点，七连很快突入那坡子村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得自卫队四处逃窜，郭相堂藏在村中的一口水井里才免被俘。此战共缴获步枪八九十支，机枪一挺。

1941年春，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奉命开赴关中分区，文年生旅长率部首先在邠县以北的义石村、凤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及国民党地方保安队激战三天，将其赶回凤王山以南，后又转战枸邑土桥镇和正宁县，将来犯之国民党军赶回原地，保卫了边区的南大门。

1941年9月，驻边区神崖沟的关中独立二营，每天派出一个班到小峪子一带巡逻，保卫群众秋收，驻职田镇的国民党暂二旅一个营，侦察到六连的活动规律，一天凌晨将一个营的兵力埋伏于小峪子村附近，企图伏击，天快亮时不见六连到来，正往回撤，当行至离神崖沟不到一公里的地方，突然和六连连长王永万带领的20多人遭遇。王永万迅即发起冲锋，击毙连长1人，打死打伤20多人，该营受挫，惊恐莫名，慌忙逃回职田镇。

1941年后季,暂二旅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向驻长舌头三团一营防地进攻,由于来势凶猛,装备精良,一营暂时退到后掌村一线,暂二旅乘机占领了长舌头、青村等10多个边区村庄。为了将其消灭,二营两个连由后掌村翻沟上塬,到达上、下墙东南向其侧后进攻;六连连长王永万带领部队占领上、下墙村城,居高临下,猛烈射击,七连随后到达上、下墙村断其后路。暂二旅见势不妙,狼狈溃逃,伤亡50余人。三团收复了被占领的十多个村庄。这一仗后,暂二旅龟缩职田镇,不敢轻举妄动。

1942年后季,国民党预备第三师,为了巩固崔家河碉堡据点,控制边区前沿阵地,给进犯边区建立桥头堡,派兵侵占了边区范家原村,并修筑了一个大型碉堡,驻一营兵力防守,对边区清原威胁极大,闹得人民群众不得安宁,纷纷要求将其消灭。于是,关中警一旅决定由三团副团长孙光指挥,一、二营参战,打掉这个据点。战前从自告奋勇者中组织200人突击队,磨利长矛,枕戈待战。战斗打响,当天攻坚未克,晚上突击队绕边盘山,打入碉堡内部,展开白刃战、肉搏战,加上堡外攻击,很快将其歼灭。计俘20多人,除少数逃跑外,大部分被戳死,缴获迫击炮3门和其它军事物资。

为了反击敌人的蚕食,关中分区党政组织号召全区军民为保卫边区,进行坚决而有效地自卫战争,各地迅速组织游击队,整顿自卫军,加强盘查放哨,实行坚壁清野。坚决的军事斗争使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振奋了全分区军民争取自卫战胜利的信心,保卫了边区的南大门。

爷台山自卫反击战

爷台山,位于陕甘宁边区淳耀县(今陕西淳化县)东部24公里

处,属乔山山脉南端,山势雄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连绵起伏的青山,层层叠叠的谷岭,茂密的森林和升腾而起的云雾,将海拔1313米的爷台山主峰围在其中。爷台山因其地处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门户,又插入蒋管区的突出地带,南进可直逼西安,东进可切断咸阳公路,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1945年7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的最后阶段。值此大敌将溃、胜利在即之时,国民党顽固派却肆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矛头指向英勇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公然调集11个师,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犯,妄图发起内战。7月21日至22日,国民党36军暂编59师、骑兵二师向爷台山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关中警卫队、警一旅3团和新四旅771团的6个连驻军,突然进行攻击,侵占了山南10多个村庄。针对国民党军的公然进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警告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利团结抗日。但是,国民党反动当局非但不迅速命令进攻部队后撤,反而令其各师纷纷向边区边境展开,并令预备第三师加入进攻。我军坚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与国民党军艰苦战斗七昼夜,因寡不敌众于27日奉命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随后占领了爷台山等地宽100里、长20里的地方。国民党军所到之处,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农具、家具、衣物、住房均被烧毁,人民群众遭受巨大灾难。据十里原、西坡、张家岭和刘家堡村的不完全统计,仅小麦就被抢去300多石,群众损失高达4500万法币。

为彻底粉碎国民党扩大内战的阴谋,防止其发动新的攻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命令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二旅和三五八旅火速

增援关中分区,成立了以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的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以统一指挥参战部队作战,临时指挥部设在马栏镇。

张宗逊、习仲勋等临时指挥部首长,在实地勘察了地形并分析了敌我态势后,决心趁敌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爷台山守敌,以彻底挫败国民党军侵犯边区的阴谋。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了六年之久,深谙当地地理人情,又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作为战役政治指挥员,他深知离开了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要取得作战胜利是不可能的。他与关中地委同志共同商定了拥军支前方案,并以地委名义向各县委发出《关于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在习仲勋领导下,关中分区各级地方政府积极行动了起来。赤水、淳耀县迅速联合成立了战地工作团,具体负责担架、运输、向导、军鞋、筹粮、烧水、做饭和抢救伤员等各项支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赤水县就组织支前队员 1400 人,出动担架 400 多副,筹集军粮 6 万余斤,送军鞋 1 万余双。

8 月 8 日晚 23 时,参战部队全线出击,经过 3 天激战,终于在 8 月 10 日夺回爷台山,赶走了所有来犯的国民党军队,收复了全部失地,取得了爷台山自卫反击战的彻底胜利。爷台山自卫反击战,重创了国民党军暂编五十九师,全歼入侵之敌 5 个连,毙敌营长、副营长各 1 名,俘敌连长以下官兵 100 多名,缴获轻重机枪 19 挺及大批枪支弹药。

爷台山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指出:“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

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而易举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正是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方针指导下,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有理、有利、有节”地消灭了来犯之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占据爷台山进而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的阴谋。

第五节 关中分区经济建设与大生产运动

1939年冬至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使边区财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为了战胜严重的物质困难,保障经费供给,坚持抗战到底,关中分区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支持战争”的号召,发展经济,战胜困难,领导全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全区经济向着丰衣足食的目标迈进。

开展土改与减租减息运动

关中分区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关中地区的实际,成功地领导关中分区人民群众开展了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运动,促进了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

当时,在关中分区,有两类不同的地区:一类是经过土地革命

的老根据地,即原苏维埃根据地区域,这类地区主要包括:赤水县的一、二、三、四、五区,新宁县的一、二、三区全部和四区的2个乡,新正县的一、二、三区,淳耀县的六区全部和五区的1个乡、中心区一部等;另一类是未经过土地革命的新区,即西安事变后逐步形成的统一战线区域,这类地区主要包括:淳耀县的一、二、三、四区和五区的大部,赤水县的六、七、八、九区,新宁县的五区全部和四区的3个乡,新正县的四、五、六区全部和中心区的一部。

在抗日战争初期,关中分区大约有半数以上人口的地区经过土地革命,基本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已经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土地制度。同时,还有不足半数人口的地区,未经过土地革命,地租经济在这些地区仍然占统治地位,农民依然忍受着封建主义的经济剥削,政治上虽然翻了身,经济上却还未翻身。

土地政策改革 在已经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区域,以土地分配是否彻底,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彻底分配了土地的地区。这类地区苏维埃政府不仅颁布了土地法令,而且土地分配工作做得细致,已经政府登记造册备案或在地里插了牌子的地区,地权明确,这类地区约占已经进行过土地革命地区的三分之一。第二类是土地分配不彻底的地区。即虽经政府宣布了分地法令并派人进行了分地,但因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加之地广人稀,不能分完所有土地,只经群众会宣布“谁种归谁”,既未在地里插牌子,又未经政府造册登记,缺乏法律保证;无人种的归公田待以后移去群众再作调剂和分配的地区。第三类是西安事变前三年未收租子的地区,在内战时建立的政权,虽未分土地,但地主不敢来收租子,视同已

分配土地的地区。

针对这三类地区存在的种种土地纠纷与租佃关系,关中分区在全区内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根据陕甘宁边区的有关法令制度,结合关中分区实际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1941年,关中分区制定并颁发了《关中调整土地暂行办法》,规定在土地分配过的地区,其基本政策是保护农民既得利益,对于地主亦设法使其有必须数量的土地耕种,以保障其生活;在土地分配不彻底的地区,其政策为保障农民既得利益,地权仍归农民所有,同时设法照顾地主的生活;在三年未收租子的地区,虽未明确宣布分配土地,但农民曾经过流血斗争,依法令地权确定为农民所有。该《办法》实施后,进一步保护了关中分区农民的既得利益,巩固了土地革命的成果。

减租减息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分区在未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又实行交租交息,照顾地主利益,并确保其地权。

关中分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0年至1942年,关中分区根据实际,提出了对半减租的原则,即在原租额中减去50%。但是,因当时国民党调动大军对关中不断进行骚扰破坏,关中的局面很不稳定,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使减租政策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各县普遍存在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和佃权无保障,甚至发生地主收回土地的问题。

第二阶段为1943年至1944年,关中分区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精神,在各县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各地相继成立了减租会、租户会、减

租保地会、农会等组织,领导农民打击地主的干扰和破坏活动,实行了包山租、定租、活租、伙租、按庄稼等租佃形式,并对1939年以前佃农所欠租子一律免交,清算了减租法令颁布以来长收的租子,保障了减租法令的贯彻。

第三阶段为1945年至1946年,分区实行了以“查租保佃”为主的减租减息复查工作,各县对提出的所有地权问题和租佃问题,分别采取了不同方法进行处理,按照《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规定,实行勾账、换约,作废陈账、勾销旧欠,签定新的契约,有效保障了佃户的佃权和地主的租权,使佃户后顾之忧,对于佃农改善耕作,改良土壤,发展生产有积极作用。

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解放了边区的生产力,使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新正县减租前全县租额为1130.53石,经过算账,减租689.22石。三区有佃农417家,地主87家,租地6385.5亩,原租额为652.59石,新订租额262.6石,减租390石,减轻每户佃农承受剥削量0.94石,削弱每户地主剥削量4.48石。农民赞扬说:“减租使俺得到了‘半翻身’。”许多佃户成为自耕农,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开荒种地与安置移难民

开荒种地 关中分区人少面积大,可开垦的荒地较多。于是,关中分区把开垦荒地、增产粮食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掀起了开荒热潮。关中分区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并规定党政机关干部每人种地6亩,学校每人种地2亩。

在西北局和关中分区的领导下,分区各机关、部队、学校以及

马栏根据地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向荒地开战,迅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至1942年上半年,关中首府马栏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在马栏一带开荒8100多亩。清原区一乡(郭家掌)开荒3200亩,每年增产粮食20余万斤。1943年,各级机关开荒1987亩,增产粮食433石。部队开荒3.2万亩,增产粮食3300石。1943年春,关中分区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文年生带领警备部队就地开荒生产,突击40余日,开垦耕地6160亩。到1944年,分区军民开荒共36.28万亩。其中分区机关垦荒4558亩,淳耀县机关垦荒1654亩,赤水县机关垦荒1594亩,新宁县机关垦荒1792亩,新正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干部组成搭工组、变工组集体生产。全年平均每人开荒4亩,种熟地4亩,收获细粮1.5石。从1942年到1944年,全县共开荒4.8万亩,粮食生产有了大幅度增加,一般农户达到了“耕一余一”;仅西牛庄开办农场一项,每年就产粮80余石,基本达到了自给。赤水县结合开荒运动,县委书记任玉成深入农村,总结劳动英雄开荒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印成材料,在全县广泛宣传,掀起开荒种地热潮。

安置移难民 从1943年开始,沦陷区国统区贫苦农民不堪忍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纷纷逃往他乡,关中分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且地处陕甘宁边区边沿,难民易于在这里落脚。为了妥善安置这些移难民的生产生活,是年3月,边区政府颁布了《优待移民条例》,规定“凡边区以外,因原地生活困难天灾影响无法自食,沦陷区人民不堪忍受敌人压迫进入边区及边区以内,地少人多者愿移入垦区者,均称移民或难民。移民和难民开垦公荒,三年免交公粮,开垦私荒,三年免交地租,义务劳动在

最初几年全免或酌减。”并规定,移民难民不分阶级、民族、职业,一律享受现定之优待。关中分区专署结合实际,制定了移难民暂行办法,成立了县区移难民管理委员会,划定了移民区,千方百计地安置移民、难民,组织移难民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吸引大批移难民来边区谋生。仅1943年就安置移难民4000余户、1.2万人。并妥善安置移难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对移难民住所问题,分区发动老户代为其修旧窑、打新窑或腾让窑洞、房子。对移难民的口粮问题,一是政府无息贷款;二是老户低利借给;三是发动移难民开荒,多开多借;四是劝募经济。移难民开公荒,谁开的归谁,并发给土地所有证,三年免交公粮;开私荒,移民有权使用土地,并发给土地使用证,三年免交地租。同时,分区还发给移难民农贷,解决农具、籽种等困难。广大移民经过开荒生产,很快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当时属于关中分区管辖的新正县作为边区安置移难民的重点县之一,从1941年到1943年5月,全县共安置移民1264户、4357人,约占当时新正县人口总数的21.4%。其中,马栏区安置移民最多,1940年以前,全区仅有334户,到1944年增加为1250户,人口比原来增加3倍多。

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当地人民群众的帮助和照顾,使那些原来一贫如洗的移民难民,一两年内不仅生活能够自给,而且生产资料也有所增加,其中部分移民、难民户达到了中农或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他们深深感到边区政府好,共产党好,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有些还被评为移民英雄,受到奖励。1943年,关中分区仅移难民开荒3.87万亩。赤水县涌现出移民英雄冯云鹏,冯云鹏所在乡有移民、难民117户、400余人,刚来时生活困难,冯云鹏创办粮食

合作社,筹集粮食,借贷给移民、难民,待到移民、难民有收获后,逐年归还。这种合作方式,后来在陕甘宁边区推广。

发展边区贸易与公私经济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负担,保障部队供给,支援长期抗战,关中分区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实行以“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逐步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公、私营和合作社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式。

推动边区贸易 关中分区所辖区乡多是农业县,工业欠发达,手工业也很少,一切日用品都依赖从外输入,再加上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业很不发达。合作社是群众根据互助合作的原则自愿建立的经济组织,合作社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支援工业农业生产、方便群众购销、活跃市场、稳定物价起了重要作用。1938年,新正县率先成立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经销部,各区成立了消费合作社,开始了以集体经营为主的商业活动。1940年,由群众投股金,创办了联营合作社,下设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和纺织厂。同年,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消费生产合作社,下设纺织厂、运输队、营业部等单位,主要经营的商品有布匹、食盐、百货、皮毛、纸张等,用以满足群众和部队的需要。共有股金21万元,其中县政府投股5万元,群众投股16万元。当年共纺纱454斤,织布915丈,解决了全区三分之一人口的穿衣问题。除县办、区办的合作社外,群众还积极投股自办合作社,1944年3月,马栏区一乡第二行政村,在张文起倡导下,由39户群众投股金11.6万元,玉米5斗8升,棉花1斤,办起了纺织合作社。

赤水县县级机关投资 1.58 万元,开设骡马店 3 处,药铺、染坊、油坊、皮坊、木工厂、铁匠铺、商店各 1 处,全年获利 20 万元;办合作社 6 处,获利 2 万元;种地 160 亩,收获粮食 20 余石;妇女纺线 2.6 万斤,织布 3.6 万丈。全年交盐税、商业税合计 27 万多。截止 1944 年底关中分区合作社发展到 24 个,社员 1.38 万人,股金 2080 万元(边币),大大促进了关中分区经济的发展。

发展公私经济 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在积极创办公营性质、群众联合经营的集体商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同时,克服各种困难,大力发展公营经济。在发展工业方面,关中分区建立了碳业公司、铁厂、纸厂、纺织厂等公营企业。私营工业方面也有一定的发展,1942 年,同宜耀县衣食村开办了私营煤矿,有矿井 25 口,其中 9 口井,就出产煤炭 1255 万斤。纺织业方面,全分区从事纺织业的妇女有 1.21 万人,纺车 8522 架,年纺织的衣料可供应全区 63% 的人口穿用。私营商业日益繁荣,仅柳林、长舌头、铁王、马栏、湫坡头等地就增加商业门店 58 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贸易,各区办起了供销社,清原还在小寺子开办了药铺,边区政府发放贷款,各区、乡组织农民贩盐,既自食又销售。关中分区在丰泉办起了贸易公司,用边区的土特产品,换取边区所需的棉花和药品。

开展劳动互助与劳模运动

关中分区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而且还进一步改变了农民在大生产运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

开展劳动互助 在大生产运动中,农民为提高生产效率,纷纷

建立各种类型的劳动互助组织。主要有搭工组、变工组、义务耕田队、唐将班子等。所谓搭工组,也称“搭种”,一般由本村同宗同族关系密切的群众,自愿组合,常年搭帮生产,有人出人,有畜出畜,合理折算畜工、人工,彼此顶工或付适当报酬;所谓变工组,则由政府倡导,由本村若干户群众组织而成,人力畜力合理搭配,实行人工变畜工、畜工变人工、人工变人工,既有季节性,也有常年性的,变工组设组长,具体负责活路安排,人力畜力调配,记变工账等工作;所谓义务耕田队,也称“代耕队”,是在政府提倡和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种帮济性质的生产组织形式,各村普遍都有,主要在大忙季节,帮助军工烈属和缺畜少劳的困难户耕种收割;所谓唐将班子,一般有班头、领班、书班,主要分为专门卖工的、半变工的、半卖的、完全变工的几种形式。“变工队”和“代耕队”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最为普遍。据关中分区、陇东分区和延属分区(缺一个县)的统计,到1943年春季,共有4588个变工队,参加变工的劳动力32081人;代耕队或唐将班子553个,参加劳动力5919人;集体开荒队75个,参加劳动力1365人。在陕甘宁边区的各分区中,关中分区参加劳动互助合作的劳动力比例最高,达到36%。劳动互助组织的普遍建立,加强了农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的协作关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开展劳模运动 1943年,关中分区广泛开展了学习和争当劳动模范运动。新正县二区雷庄村的共产党员张清益就是一个著名的劳动英雄,1940年以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同时,国统区难民大量流入,再加之部分当地群众也常常因灾缺粮断炊,每年前季青黄不接,吃

饭问题更为突出。共产党员张清益(阳坡头区一乡雷庄村行政村长)发动本村群众首办“义仓”,创办了“义仓田”,获得了社会好评。所谓义仓是集体开荒种地,所收粮食储备起来,灾荒时再以微利借给缺粮群众,带有救济性质。此举得到县委和关中分区的重视和支持,并在关中分区推广普及,掀起了群众性的开办义仓运动。1943年,新正县新开垦义仓田1100多亩,产粮食21.8万余斤。义仓创办人张清益被授予“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为促进大生产运动,同年,在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上,关中分区表彰了劳动模范李学义。之后,相继涌现出义仓英雄张清益、移民英雄冯云鹏、模范班子领头人石明德等。同年冬,关中分区召开大会,再次表彰奖励了一批劳模,推动了全区劳模运动的深入开展。1944年,关中分区40多名劳模代表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当年底,全区评选出县级劳模57名,乡级劳模213名。其中,张清益创办义仓的经验,推动了全边区和其他解放区义仓的开展,贾恒春创办的纺织合作社,是全边区纺织合作社的模范。雷庄、白原村、陈家楼子、段家堡子等村也因出了张清益、石明德、贾恒春、段生珍而闻名边区乃至其他解放区。1943年,关中地委在新修的工字房进行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赤水县纺织英雄孙葱娃、刘纽如用木机织的精细白布、淳耀县劳动英雄胡文贵种的28.5斤重的南瓜和一何姓农民种的一株结5个玉米棒子的玉米等作为大生产成果在展览会上展出。

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劳模运动,提高了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了懒汉二流子的改造,专门对农村一些吸大烟、赌博、串门子、招野

汉、偷盗、拨弄是非、宣传迷信、敲诈财产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进行改造,经过改造,大多数二流子、懒汉都有了或多或少的转变。清原区一乡,改造了任开通、杜育娃等8人,从而改变坏习,从事劳动,掀起了大生产热潮。

第四章

中共在陕西国统区的工作

1940年,关中分区始终燃烧着反磨擦斗争的战火,分区机关在阳坡头、雷庄驻扎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形势的逼迫,分区党政军机关于1941年7月开始采取分步转移的办法(7月份部分党委机关迁转、11月“二师”迁、1942年2月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迁驻马栏,至此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全部迁驻马栏),先后进驻马栏。

关中分区领导机关齐集马栏后,使这个原本不上百户人家的古镇顿时热闹起来了。那里群山环抱,沟壑纵横,清澈透底的马栏河由西向东穿行而过。分区领导机关都驻在河北边的黄土高坡上,背靠有名的子午岭—秦直道。

到马栏后,分区领导和干部先是住在群众家里,后来由于马栏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发展、壮大,机构的增多,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指示张贵德、梅凤义等人到马栏山实地考察,并组织党政机关干部、驻地部队战士以及“二师”的学员们,自己动手,依山相继开挖了300多孔窑洞。

1941年4月,为了适应新的动作形势,使关中分区更好地配合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所辖的中共关中分委改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8月27日,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在马栏成立,文年生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

汪锋、张仲良任副司令员，牛书申任政治部主任。11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由耀县照金迁驻马栏镇。自此，马栏成为陕西革命的大本营。

1942年1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马栏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省委委员、各部部长及在马栏的县委书记、机关科长以及干部出席会议，会议主要传达和讨论西北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接替欧阳钦任省委书记的张德生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并提出，党在陕西目前的任务是从思想上肃清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残余，实行“荫蔽精干”政策；社会活动的总方针是“公开合法，适应环境，随机应变，长期生存”。2月，关中分区行政督察公署由阳坡头迁往马栏。

第一节 中共关中地委的成立

1942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关中分区警一旅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为警一旅关中警备区司令部。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文年生，政委张德生，副司令员汪锋、王近山、杨拯民，副政委晏福生、徐立清。同月，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物力”的指示精神，决定将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委合并为中共关中地委。

1943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正式成立，由常委张德生（地委书记）、汪锋（统战部长）、张仲良（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文年生（警一旅旅长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和委员张中（地委秘书长）、惠庆琪（组织部长）、晏福生（警备司令部副政委）、

张鹏图(副专员)、杜平、牛书申组成。地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和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地委机关仍驻马栏镇。

这一时期,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及学校全部迁驻马栏镇,还相继成立了保安处、八一剧团。同时,为加强马栏根据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大生产运动,在关中地委的领导下,党政军群齐动员,在马栏相继建成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厂和仓库。红军医院有3名医生,被服厂有女工20多人。修械厂主要是为红军和游击队修理、制造枪械和弹药。他们研制的“麻辫手榴弹”威力强大,在多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至1944年还组织军民在马栏修建了大礼堂、小会议室、工字房和马栏七孔石桥。马栏由此成为关中分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二节 中共在国统区及国民革命军 第三十八军的工作

在陕西国统区的工作

中共关中地委成立之初,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关中地委基本上中断了与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联系,因而只能以边区工作为主。而所辖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还没有完全从隐蔽状态下恢复起来。为此,在中共陕西省工委和关中地委的领导下,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积极恢复和发展党

的组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建立红色交通线,为开展政治斗争,争取和平民主,解放国统区做出了贡献。

恢复和发展国统区中共党组织 1944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中共关中地委即派出一批联络员到陕西国统区了解情况,同部分县的地下党员和中共组织审慎地恢复了联系。至8月,先后派员去韩城、澄城、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商县、三原、富平、同官、麟游等11县联络党组织和党员,除商县、同官未接上关系外,其余都接上了关系。各地联络员在向这些县的中共组织和党员传达地委关于保卫陕西新形势的同时,要求一部分党员继续坚持长期埋伏,收集情报,组建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在1945年底以前,关中和陕南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是由中共关中地委领导。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加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和领导,西北局于1946年1月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汪锋任书记,张中任秘书长,王俊任组织部长,周芝轩任宣传部长,吕剑人任统战部长,刘护平任社会部长。省工委驻马栏镇。同年8月,汪锋调豫鄂陕区工作,赵伯平接任陕西省工委书记。省工委成立后,按照西北局“整顿恢复组织,注意发展党员的指示”,先后派出337名干部到国统区联系地下党员,广泛建立联络据点,使大批遭敌破坏或隐蔽起来的中共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1947年3月,中共陕西省工委与中共关中地委合并,成立新的关中地委,地委成立了专门主管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的国统区工作委员会,地委第一副书记赵伯平兼任国统区工委书记。新的关中地委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进行内线反攻和转入外线作战,发展党的组织,组建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相机牵制和打击敌人。至1947年

10月,中共关中地委在国统区的乾永、长武、麟游、扶风、凤翔、泾阳、长(安)柞(水)、蓝田、郿县等地发展党员784名。至1948年底,中共关中地委在国统区所领导的泾阳、三原、高陵、咸阳、同官、耀县、临潼、渭南、华阴、潼关、蓝田、长柞、西安、郿县、西北农学院及国民党军外勤等21个党组织中,除长柞、陕南两处工作停顿外,其余都与关中地委保持经常联系。

在咸阳国统区,1946年10月,中共关中地委成立了中共(郿)县柞(邑)工作委员会,潘远志任书记,机关设在关中分区赤水县,领导郿、柞两县泾河以北的张洪、城太、香庙、清原四个区委。1947年4月,为充分发挥县级中共组织的作用,中共关中地委撤销了中共郿柞工委,并于5月和10月先后成立了中共柞邑县委和郿县县委,杨宗耀、任君顺分别担任县委书记。随着陕西国统区地下组织的迅速发展,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全面展开。

成立调查站 1943年,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中地委成立了调查站,站长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剑人担任。其主要任务是调查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况,并承担与各地下组织的联络任务。调查站采取向出入边区人员询问和派员向军事系统、贸易系统同志调查了解以及收集国民党统治区报刊等方法,了解掌握国统区征丁、征粮、保甲组织、地方武装等情况。在此基础上编印《陕情汇报》数十期,为国统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以及武装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培养储备中坚力量 1943年,共产党员巩德芳、谈国帆、赵伯经、王廷兰等先后从商洛、临潼、西府地区各带领一批地下党员和地方武装骨干到达关中分区。1944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成立

教导团,为加强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和开展游击战争培养和储备领导骨干。教导团团长由麟游地下党领导人赵伯经担任,在交口做地下工作的谈国帆任副团长,商洛地下党领导人秋宏、王杰分别担任正、副政委。教导团组织学员一面坚持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一面开荒种地,口粮自给,实行劳武结合。1945年,由于三十八军在中原会战中受到重大损失,三十八军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非党干部及进步知识分子到达关中分区。中共关中地委根据西北局指示将这批人员接到马栏,在分区教导团成立了干训队,并从党政机关中抽调干部和教导团原有学员中挑选一部分学员到干训班集中进行学习,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派往国统区各县建立秘密联络点和组建武工队、游击队。干训队、教导团通过对学员进行党的教育、动员学员串联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党的工作,壮大党的组织,大多数学员被派往国统区,成为扩大党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的军事人才和领导骨干。

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中的工作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初为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于1930年创建的一支地方部队。1937年5月,西安绥靖公署将十七路军总部撤销,所属部队被缩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八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对这支部队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使这支形式上由国民党政府供给的部队,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类似八路军的武装力量。

1939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并选派大批党员干部加强对三十八军的统战工

作。1943年1月,中共三十八军工委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同时,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前委、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共关中地委等互相配合,开展对三十八军的工作。

对中上层进步军官的统战工作 中共三十八军工委按照关中地委统战部的指示,领导地下共产党员,采取各种方式,团结教育了一大批中、上层进步军官,其中有温朋久、陈雨皋、程文津、周杰邦等。这些人对扩大部队中的进步势力、保护中共组织及共产党员安危、团结广大官兵等做了大量工作。工委对国民党当局派来的中央军校毕业、不负有特务使命和不属特别反动的军官,诸如军部参谋兼教导队地形教官张德广、教导队区队长黄宝麟和学生队的李光裕等,经过艰苦细致地思想工作,也逐一争取团结在工委的周围。

建国统区秘密据点 1945年10月,中共关中地委根据中央指示,将在关中分区教导团接受培训的一批三十八军骨干人员,抽调分赴西北各省和河南、四川等地,建立了100多个秘密军事据点。在陕西国统区,罗曼中、韩增友、薛高涛等十余人在大荔、白水、蒲城、咸阳、长安等地建立了地下秘密据点。这些秘密据点绝大部分在解放战争中都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曾在三十八军的地下党员杨培材、田焕贵在于训队学习后,派往白水搞地下工作,打入敌人内部,杨培材担任保警队长,田焕贵任预备队长,他们积极配合王世泰率部出击蒲城、白水地区,并组织起义,解放了白水县城。渭北游击队长王廷兰、耀县游击队中队长杨凯以及同官、富平等游击队负责人都是教导团干训队的学员。这些地下党员打入

敌人内部,收集情报,掌握武装,或打开城门,迎接解放军入城,或举行策反起义,或恢复、建立地方党组织,为国统区反内战起义奠定了基础。

组织部队起义 1945年6月,蒋介石强令三十八军将连以上官佐都换成国民党嫡系军官或政工特务。在此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7月14日电令八路军河南军区二分区将能够掌握的部队坚决拉出来,以保存力量。7月15日,中共关中地委派交通员鱼化龙向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传达起义指示。18日,三十八军十七师五十团、五十一团在河南洛宁县固县镇宣布起义。抗战胜利后,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汪锋派联络员杨信、沙夫去驻郑州、徐州陇海铁路沿线的三十八军所属部队组织起义。杨信、沙夫到达后,分头联系三十八军十七师、五十五师、一七七师的地下党员,了解掌握部队情况,统一思想,布置部队起义事宜。12月中旬,杨信回关中地委汇报了情况。月底,杨信和王国再次前往三十八军与沙夫会合,并研究确定以孔从洲(孔从周)为总指挥,向晋冀鲁豫解放区靠拢的行动方案,由沙夫负责组织十七师、王国负责组织五十五师、杨信负责组织一七七师起义。后因时局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暂缓组织起义。1946年夏,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三十八军十七师、五十五师、一七七师等主力部队纷纷宣布起义,中共中央遂决定将起义部队组建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序列。

第三节 建立红色交通线

建立地下交通线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建立联系紧密、畅通无阻的地下交通线(站),打通西安与延安连接的红色通道,关中地委根据中央指示,派出一批联络员,前往澄城、渭南、三原、同官等县,建立中共地下联络点(情报站)100余处,长期潜伏,开展地下工作,建立了一条由西安通往边区的地下交通线。

1943年初,关中地委在耀县柳林镇设立“柳林民主客栈”,后更名为“柳林联合客栈”,客栈对外以经商和招徕往客为名,其实质是掩护、接送南下北上的过往同志,搜集传递各种情报和做敌占区的统战工作。同时,建立和发展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国民党正宁县商务会长、山河镇“大顺通”商号张振襄(字赞臣)为人正派,主持正义,济贫扶困,交往较广,在新正县享有很高的声望,经过争取,他在自己月牛坡酒坊成立了秘密联络点,为游击队传递情报,购运物资,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多次出资疏通关节,掩护营救干部战士10余人。同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六团第三大队驻防枸邑土桥、张洪一带碉堡线,中共关中地委根据大队长董策丞、中队长龙伯渊的反战情绪,与其秘密建立统战关系,使第三大队驻防的封锁线成为枸邑国民党统治区土桥通往陕甘宁边区丰泉的地下交通线。董利用乡党关系,动员和保护关中道的客商,向边区贩运被禁运的棉花、布匹、药品、文具等物资。据不完全统计,这条秘密交

通线从1944年初至1946年8月,安全护送党的领导干部、知名人士和进步青年300多人,输送物资达30万斤左右。同时,关中分区各区县也根据各自实际,建立地下交通网络。赤水县因其地处边区的最前线,是国民党包围封锁的重点,赤水县在五区和二区设立了统战科,建立出入边区地下工作同志的接待站。枸邑县也成立了保安科,主要开展对敌情报工作,建立地下情报关系网,先后在清原、城关、太村建立情报点5个。这些地下交通站、点、线的建设和运用,为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国民党统治区创造了条件。

营救李敷仁

通过有效地开展统战工作,中共关中地委建立的秘密交通线、站、点充分的发挥了职能作用,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重大任务,多次成功护送中央领导顺利进入边区,有力地帮助了数以万计的将士顺利奔赴抗日前线,切实地保障了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顺利地奔赴延安。1946年,中共地下组织成功营救李敷仁的行动,得到了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高度称赞。

共产党员李敷仁,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从教,曾创办《老百姓》、《农村周刊》、《民众导报》等报刊,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激发老百姓爱国热情,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发动内战的罪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945年秋,李敷仁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西北民盟总支部青年部主任。1946年1月,有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全国随后掀起了和平民主运动高潮。当时李敷仁是领导西安乃至陕西青年学生开展争取民主权利运动的主要领导

人之一。

李敷仁在西安长期进行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西安特务组织注意,经常遭到特务分子盯梢跟踪及伺机迫害。1946年5月1日,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到咸阳五陵原陈老户寨附近枪杀,因未击中要害,才得以被当地群众救回。中共陕西省工委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定利用枸邑地下交通线营救李敷仁同志进边区。5月11日,在沿途各地中共地下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掩护下,李敷仁进入枸邑境内,后在交通员王生春、国民党保六团第三大队队长董策丞及其大队机枪三中队队长龙伯渊的帮助下,经过近二十天秘密掩护,于6月3日到达陕甘宁边区马栏镇。省工委和关中工委负责人汪锋、吕剑人等同志和机关干部来到马栏河畔迎接。

李敷仁遭国民党特务枪杀未中要害,但一颗子弹留在了脖子里,关中分区医院医务主任王锡朋和关中分区卫生部部长徐根竹在检查了李敷仁伤情后,决定当天施行手术。陕西省工委、关中分区领导高度重视李敷仁手术一事,省工委书记汪锋亲自来到门诊部,在隔壁房子等消息。手术在马栏街门诊部进行,由徐根竹主刀,王锡朋和刘连明当助手。手术很顺利,约二十分钟就取出了子弹。取出的子弹头交给了汪锋同志,这颗子弹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人士李敷仁的罪证。手术很成功,李敷仁很快痊愈出院,并于6月下旬被护送到了延安。7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李敷仁召开欢迎会,林伯渠、陆定一、徐特立、习仲勋、谢觉哉等领导同志和千余人参加了欢迎会。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党的高

级领导人以及杨明轩等知名人士曾多次由马栏出入边区,使马栏成为一条通往延安的红色通道。

第四节 策动国民党地方党政军起义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国统区的边沿山区放手开展游击战争,在国统区之内地应视条件成熟程度举行起义、部分起义或发展隐蔽武装,加紧准备,以配合人民解放军反攻。关中分区各级党组织按照这一指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等办法,设法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内发展统战对象,建立统战关系,并领导和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起义,1946年至1948年间,柞邑就发生了几次较大的、有影响的国民党武装投诚起义。

国民党陕西省保六团第三大队起义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国民党调集18个师和12个保安团的兵力,企图包围陕甘宁边区,妄图从南线进攻延安。8月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了延安后,驻防在柞邑碉堡线上的国民党陕西省保六团第三大队,在大队长董策丞、机枪中队队长龙伯渊率领下,于8月15日在柞邑县张洪镇起义。

董策丞、龙伯渊系陕西省凤翔人。二人渴望抗日救国,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让他们去抗日前线。于是,董策丞向老

朋友、关中分区教导团团长赵伯经写信，倾吐内心的苦衷，表达抗日的心愿。1944年初，中共关中地委派交通员王生春来董部，通过联络和做工作，与董策丞和龙伯渊秘密建立了统战关系。

1946年8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侵略不断加剧。这时，董策丞及第三大队官兵倾向革命、联络边区的活动，被叛徒发现。驻淳化的国民党邠（县）洛（川）保安总指挥梁干乔，将此事密报给驻在三原的国民党剿共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刘戡即电令国民党陕西省保六团团长张乃云，将董策丞、龙伯渊就地审查。两人面对威逼，以攻为守，向张乃云提出辞职，弄得张无法收场。张乃云只得取消了对董策丞的软禁，放董策丞回到第三大队队部。但张乃云不忘派亲信控制董策丞的行动自由，还报请上级要求调军接防，以用武力解决第三大队问题。

当时，张乃云直接控制的第一大队只有100多人，战斗力和装备均劣于董策丞的第三大队，因而不敢轻举妄动，只有拖延时间，等候援兵。龙伯渊及时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严峻的形势迫使他做出了“与其束手就擒，不如大闹天宫”的决策。于是，龙伯渊暗中组织准备起义，他一面在驻地张洪镇外的交通要道设立暗哨，在张洪街加设岗哨，防备突然事变；一面秘密召集机枪中队的3个分队长开会，部署以机枪中队为核心，收缴团部和第一大队的武器，营救董策丞。龙伯渊并设法将起义计划秘密报告董策丞，董感到力量单薄，没有充分把握，劝龙暂缓行动。

此时，龙伯渊派出的侦查员获悉，敌人调遣的军队已到达邠县，形势十分险恶。8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地委派王生春通知董策丞、龙伯渊，情况危急，立即采取措施。董、龙接信后，决

定马上起义：由龙伯渊具体负责、组织起义准备工作；派人通知第九、十、十一分队长准备。行动时，梁世英的第二分队保护董策丞及眷属，大队部跟进，令其余人马随时听从龙伯渊调遣。

8月15日下午，保六团团长张乃云突然下令，调龙伯渊的机枪三中队离开张洪镇去接新防，企图以此分散董策丞的兵力。董、龙将计就计，决定利用张乃云的命令，公开组织军事行动。一方面，董策丞令大队军需杀猪宰羊，装成请客的样子；另一方面，龙伯渊召集机枪三大队全体人员宣布换防令，做好出发准备，并令梁世英所带二分队先期行动。当日晚9点，起义部队由张洪镇出发，途中九中队14人加入起义队伍。起义队伍经官道咀、九里红下坡到孙家台，渡过汎河向边区行进，同时派人迅速通知与起义有联系的第一大队四中队的马占元以及十中队十分队的王金玉顺着苍儿沟进入边区，经紧急行军，部队顺利进入关中分区，起义宣告成功。

8月中旬，三大队大队部30余人，机枪三中队全体官兵97人，十中队王金玉分队41人及第一大队四中队马占元分队32人，共计起义官兵200余人，携长短枪168支、机枪4挺及大批军用物资，胜利到达关中地委所在地——马栏。起义官兵受到马栏各界千余人热烈欢迎。8月22日，关中分区党政军召开盛大欢迎会，张德生、高锦纯、阎揆要等领导同志讲了话。当晚，举办了联欢会，演出了戏剧《逼上梁山》。9月10日，起义部队在马栏改编为关中分区保安第六团，董策丞任上校团长，龙伯渊任第三大队队长。

不久，党中央邀请董策丞去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董策丞，并对董说：你们是关中国民党军的第一支起义部队，你们的起义在关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进来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你们

是起义的,但不能以起义部队对待,因为你们在进边区前,就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嘛!敌人进攻边区,你们还得英勇参战。毛泽东同时赠给董策丞一件皮大衣以示关怀。

国民党枸邑自卫大队起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纠集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攻占延安。中共中央为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在安排陕北一系列作战部署的同时,于1947年5月初,调第一野战军四纵队南下关中作战,诱敌分散兵力,以减轻陕北压力。为此,指示枸邑地下共产党员马志超(陕西旬邑人,时任县自卫队副大队长)准备举行起义。

枸邑地处边区前沿要塞,国民党各政治派系有特务深入,国民党枸邑县党部书记卜涛和县长边翼藩,明争暗斗,相互制肘。共产党员马志超奉党的指示,回到枸邑开展地下工作,任务是打进敌人内部,争取部分武装,建立活动据点。马志超巧妙地利用伪县府内部矛盾,支持国民党枸邑县长边翼藩,打击掌管特务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卜涛,取得了边翼藩的信任,当上了警察局代理局长(后由他人担任)、军事科代理科长。1947年2月,马志超又担任了国民党枸邑县自卫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县长兼),掌握了国民党枸邑县的武装大权。

1947年5月中旬,南线指挥部派黄爱民(黄系马志超地下联络人)由延安来枸邑与马志超接头,因枸邑县城内敌情复杂,易于暴露,马志超和警卫员蒲兆连密约黄爱民到张洪镇(第四中队)谈话。黄爱民向马志超传达了中共组织关于在枸邑举行起义的有关事宜,马志超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时过5天,马志超写信派蒲兆连与

南线指挥部联系,南线指挥部政委张德生亲笔复信:“决定立即组织全部起义,……具体安排你与高锦纯(警一旅旅长)直接联系。”马志超接信后,经过周密思考,向高锦纯提出行动计划:决定将自己控制的自卫队集中到紧靠县城的西堡子控制起来。空出县城,让四纵主力部队先进县城,然后解放西堡子。高锦纯批示同意。

此前,县长边翼藩曾三番五次派警卫员催马志超到县府相商要事,边见到马后,面露恐慌状,对马志超说:“共军已到崔家河,县城危急,形势紧张,你打算咋办?”马说:“形势既然如此,惊慌也无用,就目前形势来看,县城难守,可把部队集中到西堡子,万一不敌,再向邠县撤退。”边信以为真说:“此办法好,你去安排。”并表示自己白天不能出城,恐中共部队未到,日后不好向上司交待,故天黑以后上西堡子。这样一来,马志超计划得以实现。当时在县城驻防的自卫大队共4个中队和1个特务队,约700余人;县保警队仅六七十人。马志超当即将自卫大队的3个中队400多人调到城外西堡子,空出了县城。5月21日傍晚,我主力部队在高锦纯的指挥下,顺利进入柘邑县城。

在我主力部队进入县城前夕,国民党柘邑县长边翼藩已有察觉,县警察局长向县长报告了马志超是共产党员准备起义的情况。县长边翼藩即带领部分人员逃往离县城30华里的太堡村固守。这时,马志超在西堡子组织发动自卫大队起义。起义前,马志超首先将反动的大队副和中队长分别拘禁起来。接着召开分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宣传革命道理,说明起义的意义。为解除士兵的疑虑,马志超公开了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说明了党的政策和这次行动的计划。会上,全体官兵表示一致同意起义。马志超根据大家

的意见,恐敌人日后骚扰残害起义官兵家属,遂与我军取得联系,于次日黎明向西堡子佯攻,以诈败即行起义。

此时,国民党县保警队长彭子超带着不足 30 人也来到西堡子。马志超及时向彭宣传革命道理,劝他参加了起义。马即派员在西堡子的碉堡上插上白旗。22 日黎明,主力部队向西堡子指定目标佯攻一阵后,派人到西堡子接马志超进入县城。尔后,张德生、王世泰、刘懋功(原警一旅参谋长)等在盐店巷申金章家接见了马志超,表扬他胜利完成起义任务,决定以马志超的名字命名起义,并对随从的新华社记者说:“现在正式宣布起义。”同时宣布组织决定:任命马志超为柘邑县政务委员会主任、邠柘工委书记。当日下午,全体起义人员随同主力部队撤往阳坡头,次日在阳坡头召开了欢迎大会,并设宴招待起义部队,随后将起义人员编成 3 个连,主力部队补充两个连,合编成关纵游击支队,马志超任支队长。

约 4 日后,关纵游击支队返回县城。次日中午,张德生找马志超说:“县长边翼藩带残部逃往太堡村,你可和骑六师一起把边翼藩争取过来。”马志超随即带部队和骑六师先到太峪镇,第二天半夜出发,黎明包围了太堡村,由马志超给边翼藩写了劝降信,信经杨拯民(骑六师副师长)看后,派蒲兆连送到太堡村村下。边翼藩见信后怕其中有诈,把保警分队长耿志德从城上用绳子吊下来和马志超见了面。见面后马志超对耿志德晓以大义,耿回去向边说明情况后,边翼藩立即打开城门,率队弃暗投明。下午,部队转移到土桥附近的后庄村,张德生指示马志超说:“边翼藩带来的党政人员,你熟悉由你去处理,按照目前的政策,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的放其回家。”当时边翼藩表示愿意留下,警察局金局长要求回家,

其他人员除镇长文德玉外,都发给了路费,打发回家。

此次起义,不但解放了枸邑大片土地,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而且打击和瓦解了国民党军队,从而减轻了对陕北的压力。

国民党枸邑县政府、保安团起义

西府战役结束后,1948年5月,敌军反扑,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任命郝登阁为国民党枸邑县县长兼保安团团长。因枸邑县城被占领,郝即在邠县组建了国民党枸邑县政府和保安团,长驻邠县川道水北村,临时驻张洪以西的百子村,常到张洪塬一带活动。

郝登阁,陕北米脂人。原在国民党新十一旅曹又参团部工作;此间,经葛申秘密联系,和中共党组织建立了情报关系;1942年,随曹又参举行“三边”起义投奔了革命阵营;经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学习培训后,被派往国民党内做地下工作,在榆林搞情报工作;郝到榆林不久,被胡宗南逮捕用飞机押往西安,再转押南京,后经郝杰山(郝登阁之兄,任邓宝珊上校秘书)多方周旋,得以保释出狱;出狱回到西安后,经本人活动和有关人士协助,1948年5月,郝登阁被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命为枸邑县县长兼保安团长。

郝登阁任枸邑县长后,于同年八、九月间,派交通员张宪功进入边区,秘密持信经中共枸邑县委转往关中分区保安处,西北局社会部(即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即时批准关中分区保安处长薛克明领导郝登阁的关系,并派张贵德为中共联络员,张富贵为交通员深入郝部。郝亦派保安团副官贾世斌为联络员,张宪功为交通员,经常与我方联系。郝在保安团内部积极发展进步力量,控制武装,为起

义创造条件。

1948年冬,中共关中地委决定把枸邑搞成巩固区,支援解放战争。因此,便通知郝登阁于1949年农历年前起义,郝接通知后,考虑到派出的情报人员尚未返回,起义的准备工作还未做好,提出在春节后起义,并上报关中分区。同时,郝登阁积极加快起义的准备工作。他把自己的心腹贾世斌安排为副官,刘建华为警察局长,杨兆华为县长秘书,王春圃为财政科长,以这些人为起义骨干力量,共谋起义行动。并把起义信息提前告知自己信得过的中队长马玉德、赵秉德和职田镇镇长兼中队长陈仲良。

1949年元宵节前,郝登阁提前造出舆论,说部队要去太峪镇征粮。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三),郝即命令县保安团副团长郭相堂带领保安团二、三中队先行,驻扎在太峪镇的葛村一带等候。2月11日晚,郝登阁亲自率领保安团团部、第一中队、县政府官员和4个乡、镇公所的全体军政人员总计430余人,携带步枪300余支,机枪12挺,短枪20余支,电台1部,从百子村翻沟,在李家村聚齐人马,到达太峪塬,沿途通知了郭相堂部,连夜行军到达太峪镇。这时已是半夜时分,为便于夜间识别,每人皆在左臂套上白布条。到达太峪镇后,稍作休息,郝登阁在太峪镇镇长邵升元家里,采取“稳中施捕”的办法,在与吴伯炎(国民党枸邑县党部书记兼副县长)、郭相堂(保安团副团长)扯闲话中,以事先约定的暗记为号,郝的警卫突入室内,解除了吴伯炎、郭相堂以及随身卫士的武装,并派人押送边区。

翌日(农历正月十五日)拂晓,保安团开往太峪以北的文家村,在村东一片空旷处,召开全体军政人员大会,会场四周由第一中队

担任警戒。大会开始后,郝登阁首先讲话。他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说明北京、天津已经解放,国民党大势已去,革命胜利即将到来;指出只有走起义的道路,参加解放军才有光明前途,并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举行武装起义。接着,田粮科长牛重远作了拥护起义的发言。然后部队立即向边区进发。当部队到达杜家村时,遇见迎接起义的关中分区保安处人员及张贵德等。起义部队当晚夜宿后掌村。2月13日上午,起义部队到了边区马栏街。马栏群众夹道欢迎。下午到达庙湾村,关中分区在此召开欢迎大会,关中分区司令员陈国栋、专员杨玉亭、保安处长薛克明、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师源、参谋长蒙定军接见了全部起义人员,并作了慰问讲话。经过短暂的休息整顿,起义人员被编入关中分区二十一团,任命郝登阁为二十一团副团长,贾世斌任团参谋,王春圃任供给主任。

这次起义,宣告了国民党在枸邑统治的彻底结束,也宣告了枸邑全境获得彻底解放。新华社于起义后的第三天公布了起义消息,《群众日报》也同时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次起义行动的报道。

这一时期,通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策动和领导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敌人,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消除了革命阻力,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在关中分区相继起义的还有醴泉县自卫团、兴平县自卫团第一大队、武功县民众自卫团第一大队、泾阳县自卫团等地方武装起义。

第五章

关中分区的保卫斗争

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关中地委依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及时发出《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号召解放区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以自卫战争保卫边区。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恢复和发展国统区的中共组织,不断壮大国统区的中共力量;积极开展政治斗争,尽力争取和平民主;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解放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第一节 关中分区的发展壮大

关中分区党政军群组织的发展

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 1946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负责国统区党的工作。关中地委只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个县委和双龙镇中心区委。机关驻地仍在马栏。

1947年春,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2月19日,中共关中地委和陕西省工委机关所在地马栏失守。3月7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中共陕西省工委与关中地委合并为新的关中地委,并在关中地委设立国统区工作委员会。合并后的中共关中地委先后驻高窑子、金盆、庙湾和宁县五亭子等地,直到8月24日关中分区驻地马栏收复,关中地委机关才迁回马栏。新的关中地委除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委和双龙镇中心区委外,还领导国统区原中共陕西省工委所辖的中共组织。1949年4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电示中共关中地委:自4月4日起中共关中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地委。至此,关中分区完成了其12年的历史使命。

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抗战胜利后,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仍归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关中分区驻地马栏,关中分区专署随部队进行游击战争,直到8月马栏收复后专署才迁回。1948年,随着关中分区游击战争的不断胜利,关中分区专署除领导新正、新宁、赤水、淳耀、中宜等6县区外,还领导国统区枸邑、三原等9县人民政权。1949年5月,关中分区专署改为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关中军分区 1945年8月,警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军分区,先后隶属中共关中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领导。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延安后,企图打通咸(阳)榆(林)公路,封锁黄河,消灭中共主力于陕北,因而对关中分区进行反复“清剿”。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对敌作战,中共关中地委将关中国统区划分为西府、渭北、直属三个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以摧毁胡宗南部在关中的军事力量,给胡宗南部以有力的牵制和打击。并将原由中共陕西省工委领导的西府游击总队、渭北游击总队等改

属关中地委和关中军分区领导。9月,关中军分区决定成立了路东临时指挥所。1948年2月,路东临时指挥所改为路东游击总队。是年初,高绵纯奉命率领警备第一旅大部离开关中分区,关中军分区部队仅留一个警卫连和西府、渭北、路东三个游击总队。4月,西府游击总队划归中共西府地委、西府军分区领导。6月,路东游击总队改属中共黄龙地委、黄龙军分区领导。1949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将关中军分区改为三原军分区。

关中分区青年联合会、关中分区工会、关中分区妇女联合会

关中分区青年联合会于1946年6月成立,隶属中共关中地委和陕甘宁边区青联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关中分区筹委会于1948年7月成立,归中共关中地委和陕甘宁边区青年团筹委会、西北局青委会领导,下辖所属各县青年团组织。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关中分区筹委会改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原分区筹委会。关中分区工会、关中分区妇女联合会自抗日战争时期建立后一直开展工作,1949年4月分别改为西北总工会三原分区办事处、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三原分区办事处。

关中分区所辖各县党政军群组织的发展

党的组织 中共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委由抗战时期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2月,由于国民党军对关中分区的进攻,淳耀县党政机关于师家道突围后,县委工作中断。3月建立了中共淳耀县临时工委,5月恢复了中共淳耀县委。1949年2月,淳化县解放,中共赤水县委改为中共淳化县委,白天民任书记,县委共辖11个区委。3月,中共淳耀县委撤销,其所辖党组织分别划

归中共淳化县委和中共耀县县委。4月,中共淳化县委改属中共三原地委领导。不久,原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的中共新正、新宁县委划归中共陇东地委领导,原新正县之马栏、阳坡头、底庙、湫坡头4个区委划归中共枸邑县委领导。

政权组织 1945年秋,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抗日民主政府先后更名为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人民政府。10月,淳耀县召开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经纬、封正宝为县参议会会议长和县人民政府县长。1949年3月,淳耀县参议会、县人民政府随县建制撤销,其工作人员和所辖区乡政权分别划归淳化县和耀县。1946年1月,新正、新宁县分别召开了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县参议会正、副议长、县人民政府县长及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会议员、候补议员。2月,赤水县召开了第三届参议会,选举郭文学、王振喜为参议会会议长和县人民政府县长。1949年2月,赤水县人民政府改为淳化县人民政府。4月,关中分区改为三原分区后不久,原属关中分区领导的新正、新宁县划归陇东分区,原属新正县之马栏、阳坡头、底庙和湫坡头4个区划归枸邑县管辖。

军事组织 新正县1945年8月建立的县保安大队,于翌年11月,改为县独立营;1949年2月将各区游击队组建为县警备队;1949年初组建县保安大队。新宁县1946年6月建立的县保安大队,于翌年4月改为县游击大队部;1946年7月由200余名精干民兵组建了县独立营。赤水县抗战时期建立了60多人的县警卫队;1945年8月建立了80多人的县游击队;1947年3月由县、区游击队组建了300余人的县独立营,1948年8月编入警一旅二团。淳

耀县 1946 年 6 月组建了淳耀县游击大队部,1949 年 3 月随县制撤销后改编。

群团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新正、新宁两县均成立有县工会、县青年联合会(青年救国会)和妇女联合救国会等组织。赤水县青年抗日救国会、赤水县妇女联合救国会成立于抗战时期,1947 年 1 月分别改为赤水县青年工作委员会、赤水县民主妇女联合会。1949 年 4 月,赤水县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分别改为淳化县青年委员会和淳化县妇女委员会。

第二节 关中分区保卫战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向关中分区不断发动武装进犯,进而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进攻。1946 年夏,针对国民党军不断在关中分区边境增修碉堡,加强军事部署的态势,中共关中地委要求全区军民紧急行动起来,整训部队和民兵,开展游击战争,争取保卫关中自卫战争的胜利。关中专署机关、分区各县也先后举办爆破训练班,使广大干部群众掌握雷管、地雷、土雷和炸弹等爆破技术,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实行全民皆兵,投入自卫战争。

1946 年 8 月 27 日,驻栒邑官庄国民党军向边区新正县边境进犯,驻军警一旅某部在新正县游击队的配合下,消灭敌军一个连,击毙敌连长以下 10 余人,共俘敌事务长以下官兵 53 人,缴获机枪 2 挺,步枪 50 余支,子弹 4000 余发,手榴弹两箱,摧毁敌碉堡 9 座。

9 月 17 日,驻正宁县山河镇国民党军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一营,向新宁县一区三乡进犯,警一旅部队与新宁县民兵配合,将敌击

退。

11月12日,新正独立营八连袭击永和驻敌胡宗南部一个营,攻克城堡,毙敌18人,打死19人,俘虏3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六零炮1门,步枪28支,子弹千余发。

12月6日,警一旅三团三营一部偷袭麻咀头敌据点,全歼敌一个班,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两具,步枪10余支。

12月30日(农历腊月初八),胡宗南以三个旅的兵力“合围”关中,新正县首当其冲,是日清晨,敌四十八旅一四二团,十二旅三六五团、三六七团,一二三旅三六九团从西南方向向新正地区大举进攻。新正县及时发动群众,有计划地疏散,当敌到达湫头、三嘉原一带后,关中分区警备部队和新正县军民开展阻击,掩护关中分区和新正县党政机关有计划的撤出了新正地区。

1947年1月17日晚,关中分区警一旅三团,由团长张占云指挥,攻打柞邑县城守敌保安大队。18日拂晓攻克县城,俘敌30余人,枪30余支。在这次战斗中,张洪、城太游击队拔掉了城郊的南堡子、鸡儿嘴、坡头、范家原、细峴子等5个敌碉堡,俘敌20余人,枪45支。

据不完全统计,关中分区军民从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毙伤俘敌1700余人,平毁碉堡40余座、封锁线75公里,收复了30多个村镇,解放边境群众3万多人。

第三节 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抗战时期,子午岭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屏障。这里地理

位置十分重要,尤其关中地区,东可控制咸阳—榆林公路,西可俯瞰西安—兰州公路,从这里出发,两天即可进抵西安城下。当地百姓的歌谣唱:“黑牛白肚子,就剩下宁县这一溜子”,就是形容关中分区犹如一把匕首,嵌在渭河北国统区内的情形。因为位置重要,国共双方都很重视,八路军派遣了王宏坤的三八五旅进驻,国军则以重兵围困,双方都相互怀有戒心,因此在抗战未结束时就经常发生磨擦。

抗战胜利后,中共将陕甘宁晋绥留守部队进行整编,陕甘宁边区西部边界的三边分区、陇东分区、关中分区分别由新十一旅、警三旅和警一旅担负防务。

西安国民党军方面,把这一地区视为囊形地带,为了清除这个深入到自己腹地的“囊肿”,胡宗南的整十七师整四十八旅从正宁、宁县到西峰的宽大正面上向子午岭方向清剿。1947年初,整四十八旅在合水西华池遭解放军三五八旅、新四旅、教二旅、警三旅四路重创,旅长何奇重伤而亡。此战结束后,西安方面为了发动对延安的重点攻势,必须集中兵力,因此令青海马家军整八十二师进驻此地。整八十二师以整一零零旅驻扎宁县,整骑八旅驻扎庆阳,独骑五团(后来扩编为二四八师)驻扎正宁,围绕着子午岭布下了一道严密的防线。

1947年2月13日,蒋介石为消除其夺取延安之侧背威胁,从晋西南、陕南及陇海铁路抽调兵力,连同原在关中周围之敌共集中了八个旅。17日,国民党胡宗南部7个整编旅共13个团约5万余人,在空军的掩护下,从东、南、西三面分7路,向我关中分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实施疯狂“清剿”,以夺取我关中地区。其中东线进

攻之敌一六五旅占领我马栏的关门；二十四旅进驻马栏的杨家店；南线之敌一二三旅侵占耀县的柳林、庙湾；十二旅进驻蒋家山地区；五十五旅占领了淳化县的爷台山；四十八旅之一四三团抵达枸邑县的清原区，该旅副旅长陈清率所部一四二团由西线进至五顷原，企图占领我侧背雕翎关，截断我后方唯一道路石底子，与敌一六五旅完成封闭合围。

为了粉碎胡宗南合击关中的阴谋，使我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安全跳出敌人的合围圈。7日5时，我警三旅七团二营由刘家店出发，8时到达雕翎关。与此同时，敌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也到达该地，我二营以迅猛之势将敌击退，抢占了山头阵地。敌急以3个连的兵力连续向我发起了三次攻击，在我猛烈火力杀伤下敌攻击受挫。随后敌又以5个连的兵力在猛烈炮火与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反冲，占去我六连阵地，我遂以五、六连反击，恢复了敌人夺取的阵地。17时，敌全力向我进行疯狂攻击，在新四旅十六团两个连的增援下，我军顽强坚守阵地，在此将敌击退，敌退守原地停止了进攻。此战，毙伤敌人200余人，出色完成了阻击任务，随后转移至石底子以北地区。

18日10时，敌达成合围。在敌数倍于我的严峻形势下，根据毛泽东：“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集中主力，以运动战配合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经中央同意，关中分区党政机关和驻军于2月19日奉命撤离马栏，20日，马栏失陷。仅留南线指挥部及各县独立营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关中分区大部被敌占领。

3月中旬，蒋介石调集34个旅约25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

起重点进攻。侵占延安后,企图打通咸(阳)榆(林)公路,封锁黄河,消灭中共主力于陕北。因而,先后对关中分区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清剿”。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中央军委以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第三旅,共6个旅2.8万余人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同月,中央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成立西北野战兵团。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彭德怀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刘景范任后勤部司令员。下辖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兵团组建后,相继进行延安保卫战、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役,稳定了陕北战局。随后挥师陇东、三边地区,先后收复了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等地。随之,中共关中地委将关中地区划分为西府、渭北、直属3个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粉碎重点进攻,给胡宗南部以牵制和有力打击。

同年3月,关中分区派惠建南组建了邠枸游击队联合总支队,惠建南任队长,杨宗耀任政委,下辖张洪、城太、龙高3支游击队,共100余人,枪90余支。4月3日,城太游击队侦察到敌美式装备一个营由石门向第界方向“清剿”的情报,立即报告关中分区警一旅三团。当日晚,三团与城太游击支队急行军至第界柳玉坡设伏。4月4日午,当敌进入伏击圈后,团参谋长刘懋功命令部队四面夹击,激战6小时,聚歼“清剿”之敌,打死打伤100余人。缴获枪500多支(挺)。

5月初,国民党军新一旅、整十旅、暂二旅和新九旅等,配合刘戡八个旅,以石门关为中心,对关中分区进行第二次大“清剿”。关中分区游击队和民兵配合警一旅、警三旅,与敌周旋两月后撤出敌包围圈,将游击战争的火焰引向泾河以西咸榆公路以东的国统区,经过一个多月的有机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大“清剿”。

9月中旬,国民党军暂二旅、新九旅和一三五旅四零四团、保七团、保三团及“青马”一部,对关中分区新正、赤水、淳耀县和马栏进行大规模“清剿”,在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出击白水时,警一旅、警三旅、关中分区游击队和民兵配合西野四处行动,处处设伏,迫敌退缩,粉碎国民党军“清剿”。10月,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军,经过羊马河、青化砭、礌龙、沙家店几个战役后,已被打的焦头烂额,这时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队已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防御。

11月,国民党军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配合暂二旅、新九旅和保七团、保三团等,以奔袭、夜袭等战术,对关中分区进行第四次“清剿”。在此期间,为了适应战略的转变,早日打倒蒋介石,陕西省工委和关中地委在柞水县石门关的骆驼巷和风地举办党政干部训练班,为农村进行土改、支援战争培训了一批干部。11月11日,决定将培训班的同志分为四个小组及时赴耀县、柞县、赤水、新正和新宁等地开展工作。第二天,当部队行至土桥烽火台时,和胡宗南军九十师五十三旅相遇,赤水组立即被三面包围开枪射击,除吕世玉带一支手枪外,其他同志赤手空拳,无法抵抗。孙风印、魏桂林、吴志忠3位同志壮烈牺牲;罗俊富、侯顺兴英勇突围脱险;吕世玉、张孝贤负伤后被群众营救;康行、王可学等八位同志被俘。第二天,将被俘同志押至柞县县城,多次拷打审讯,被俘同志表现

坚强,无一屈服。随后,于11月16日晚,活埋于栒邑县城西南角下,此事件史称“烽火台惨案”。这是国民党军“清剿”以来,关中分区党政干部损失较严重的一次,但牺牲的同志表现了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者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在胡宗南进攻边区受到我军重创,连吃败仗的形势下,敌地方武装力量十分恐慌,不断强化对边区的警戒。11月23日,敌陕保二团一个排的兵力武装给职田镇守敌押送弹药,中午在职田城外和我军遭遇,战斗一打响,敌人就撤入职田城。傍晚我职田城内侦查员从敌人内部获悉,敌人怕白天返回县城又遭遇我军围追堵截,决定半夜偷偷返回。我城太游击支队在坳桥村通往职田的胡同设伏,恰在此时,新正县一中队前往新杨村驻地,两队配合伏击敌人。鸡叫后,敌人从职田镇大摇大摆,毫无戒备的向栒邑县城前进,待进入伏击圈后,我四面合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俘敌42名,缴获步枪40多支,机枪2挺,子弹3000多发,手枪2支。坳桥伏击战受到关中分区的表彰奖励,陈国栋司令员亲自颁奖。至1947年12月,警一旅、警三旅、关中分区游击队和民兵多种战术打击国民党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

在历时10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警一旅、警三旅及关中分区游击队和民兵共歼敌4300余名,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清剿”。同时,关中分区所辖地域扩大了将近一倍,人口由12万人增加到17万人,武装力量扩大了三分之二,从而使关中分区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武装进犯中不断发展壮大。

第六章

解放关中

1948年春,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胜利推进,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在关中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解放了关中地区。

第一节 收复关中失地

在武装自卫打击来犯之敌、粉碎国民党军的疯狂“清剿”的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率警一旅三团和警三旅五团,以关中分区为依托,向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相机消灭敌有生力量,收复关中分区失地和解放区。

1947年3月11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到茶坊视察部队防务,面告王世泰:局势非常严重,胡宗南马上要进攻延安,边区部队不多,中央决定由他率第一纵队、教导旅、新四旅和警三旅七团阻击敌人向延安的进攻,而后在边区内回旋运动,相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要求王世泰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的名义,率警一旅三团和警三旅五团,先收复关中分区,然后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咸榆和西兰公路,相机消灭敌有生力量。3月13日,王世

泰带一名秘书、一名参谋和一部电台,一个山炮连和一个骑兵通讯班,由茶坊向宜君上畛子进发,到达后即召集警一旅及关中地委负责同志的会议传达彭德怀副总司令员的指示。王世泰在会上宣布:以警一旅旅部为他的指挥机关,高锦纯协助领导和指挥收复关中的军事行动;由警一旅三团第一、三两个营共600余人,组成收复关中的先遣队,任命警一旅参谋长刘懋功为指挥,关中地委副书记杨伯伦为政委,先行南下,扫荡敌小据点,突击敌“清剿”部队。而他率警一旅旅部、三团二营和警三旅五团为第二梯队,待同警三旅五团会合后,一起南下关中腹地,与先遣队会师。

3月16日,收复关中分区的战役行动开始了。16日黄昏,先遣部队从敌四十八旅大本营山河镇附近偷越封锁线,20日在南线指挥部(简称南指)配合下,先后轻取庙湾、柳林两个中心据点,扫除了淳耀县境内的敌人小据点。22日上午,行进中在高儿原与敌遭遇,敌人是从东西两面、由不同隶属单位派出的“清剿”部队,在各自相对运动中,恰把我军夹在中间,他们互相不通信息。三团利用他们不是有计划的协同动作,采取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猛攻当面之陕保四团,歼敌200余人,打开前进道路,然后居高临下,回攻尾随之敌八十三旅约2000余人,敌人不明情况,不敢恋战,折返他们的“清剿”出发地去了。

23日下午,警三团在赤水县桃渠原桃渠河宿营,接到地方干部报告:敌保安队100余人于一个小时前侵占了铁王镇,着手建立据点,企图长期据守。铁王镇是赤水县一个比较大的镇子,敌人若在此建立据点,可控制周围许多村镇,进而控制全县,对我军的行动甚为不利。刘懋功、杨伯伦与三团团长葛海洲当即决定,趁敌人立

足未稳,乘夜坚决消灭之。三营九连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在夜幕掩护下,活捉了敌哨兵,接着迅速冲进镇内,一举歼灭一个重机枪连。从俘虏口中得知,镇内还有从西安开来的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的亲信部队陕保七团第一营,再加上该营从淳化带来的保安队,共有600多人,大大超过了事先掌握的敌军数量。面对突变的敌情,有的同志怕不能很快取胜,天亮后敌援兵来到,对我不利,因而建议撤出战斗。刘懋功认为,此战关系重大,要不惜代价,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连续作战,力克敌军。调整部署后,团长葛海洲亲自到前沿指挥部队。敌人拼命顽抗,战斗十分激烈,南指部队首先攻取了村西之堡垒,控制了跨沟的土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三团和南指部队将敌人分割包围。经两个小时激战,敌人全部被歼。我军以伤亡20人的代价,换取了毙伤敌80余人,俘敌500余人的全胜,挫败了敌人在这里建立镇公所的计划。这是我军南下后的第一个大仗,震动了赤水全县,该县境内之马家山、蒋家山、十里原等据点的敌人纷纷逃往边境外的大据点,赤水县即告收复。刘懋功、葛海洲在此战中坚决果断,指挥得当,战术运用出色,事后联防军司令部对他们二人进行了通报嘉奖。

收复赤水县后,三团奉命回师北上,接应第二梯队,27日在新正县突袭敌人地形险要的细嘴子据点,近百名地方反动武装无一人漏网。拔除了这个钉子,敌人被激怒,驻职田镇之敌正规军5个连向三团进攻,三团以新正独立营从正面抗击,一个营从西面越沟抄敌人的后路,其他部队在独立营后面准备消灭敌人。敌人发现三团一营越沟时,仓惶溃逃了。这次战斗,新正独立营打得很好,使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但在抗击中部队伤亡较大,营长高步云英勇

牺牲。慑于我军的威力,驻湫坡头之敌正规军弃城逃跑,驻山河塬上之敌四十八旅部队也缩进山河镇内,新正县大部光复。

警三旅旅长黄罗斌率五团于3月15日从庆阳出发,星夜向南开进。行进途中,在盘克原与从西峰出来“清剿”之新一旅的一个营遭遇,将其击溃。17日进至宁县之金村庙原,与王世泰和高锦纯率领的指挥部会合。宁县县委和当地游击队报告,敌一部约三四百人,经古城川向午亭子前进。午亭子在合水县境内的子午岭分水岭上,周围七八十里荒无人烟,但它的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从这里出发,往东经连家砭、太白和黑水寺,可达富县、延安,往南可抵关中,是连结陇东、陕北和关中的必经之地。敌人进占午亭子,绝不只是一般的“清剿”行动,显然有建立据点,阻断我陇东、陕北和关中地区部队来往之目的。王世泰令五团向午亭子前进,坚决消灭这股立足未稳之敌。高锦纯率指挥部及三团二营跟五团前进到午亭子东山梁上,准备在必要时以三团二营支援五团战斗。

22日上午,五团在午亭岭前山与敌接触,以二营从正面攻击,三营从左侧后断敌退路,一营隐蔽越沟,由右翼楔入敌侧后,迅速将敌包围。激战至12时,各营攻上最高山顶,将敌人全部消灭。五团此战共毙、伤敌100余人,俘敌200余人,其余溃散敌人,逃入丛林,被民兵俘虏。

4月2日下午,我军各部在阳坡头会师。随即在北坡子村召开军事会议,让各部队汇报开战以来的情况,研究下步行动计划。当刘懋功汇报时,接到南线指挥部急电,说照金有敌约四五百人在“清剿”。王世泰立即决定其他人继续开会,刘懋功和左爱即刻带三团前往,与南指一道消灭该敌。3日下午,三团到达乔儿沟、西庄

子、大小狮子村一带,当地群众报告,石门关也来了几百名敌人。刘懋功、左爱和葛海洲分析了敌情,认为先消灭石门关的敌人更为有利,便一面侦察敌情,一面向上级报告,请求改变行动计划。午夜,王世泰回电批准他们的意见。接到批复电报时,他们也搞清了敌人是一个营,当即部署兵力:一营占领小原子、郭家掌一带,阻敌登塬;二营进至小原子、马曲,控制山梁,堵击敌人;三营和南指部队进至七界石,待敌通过后断其退路。4日7时,敌人开始向小原子窜犯。这股敌人是整编第十师八十三旅二四八团第三营,自恃是美式装备的加强营,气焰相当嚣张。就在敌人向前运动时,我各营指战员也在跑步前进。六连首先与敌接触,抢占高地,先敌开火,压制敌人。一营猛攻敌人右翼。迫击炮连猛轰敌人指挥所,当即打死敌营长、副营长,敌人指挥失灵,阵地上一片混乱。二营控制小原子、马曲山梁,用手榴弹将敌人压缩在半坡上,使其首尾难顾,进退不得,只得向后溃逃,又被三营和南线指挥部部队堵住痛击。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三团以30余人伤亡的代价,全部、彻底地消灭了这个营,毙、伤敌百余人,俘敌500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2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27挺、六零火箭筒2具、六零迫击炮9门、战防枪3挺、司登式冲锋枪、步枪等300余支。这是我南线部队第一次全歼美械化部队一个营,是三团战史上战术运用最成功的战例之一。建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科学院,把小原子战斗作为典型战例编入《步兵团战例选编》,向全军作了介绍。这次胜利,粉碎了敌人企图在石门关建立据点,控制赤水、淳耀和桐邑县我山区地带的计划。小原子一仗,给了占领关中分区的敌军以毁灭性的打击。残存据点之敌,纷纷闻风逃遁,四五天

后,占领我关中分区政治、军事中心马栏之敌陕保六团,也弃阵逃走了。至此,关中分区全部收复了。

我南线部队在22天的时间里,转战千余公里,消灭敌人2000余人(关中分区地方武装消灭的敌人未计算在内),比原计划时间缩短一半。完成了收复关中的任务,与野战兵团的青化砭、羊马河战役遥相呼应,极大地鼓舞了我关中分区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关中分区失地全部收复以后,马栏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关中地区党政军机关恢复了正常工作。

收复关中后,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关中分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以关中分区为依托,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强取小垵,轻取枸邑,血战九岷原,收复新正、新宁、淳耀等县,开辟了枸邑新区,巩固了关中老区,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

第二节 解放关中国统区

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总指挥下,采取围城打援战术,以歼敌28000余人的胜利结束了宜川、瓦子街战役,使西北战场的形势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宜瓦战役后,胡宗南不得不将其主力部队集结在延安、洛川一线,据城顽抗。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推进西北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4月,西野根据敌重兵驰援洛川,其后方兵力空虚的战略形势,当机立断,改变部署,决定发动西府战役。

4月7日至12日,西北野战军第一、二、四、六纵队分别在关中分区的马栏、转角、照金、庙湾地区隐蔽集结。16日,各参战部队分

为左、中、右三路，浩浩荡荡地向西府挺进，拉开了西府战役的序幕。

4月17日下午，部队奉命从马栏出发，准备首先全歼柵邑境内之敌。根据部署，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和七一六团担负攻占柵邑县城任务，两个团分别于翌日在县城附近集结。根据情报，柵邑县内守敌为陕保十九团和保警队各一部，计约600余人。七一六团政委粟光祥和团长游好扬、副团长刘增敏带领各营连长，观察了县城四周地形后，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一营为主攻部队，从东门发动攻击；二营埋伏在城北，阻敌向北山逃跑。

4月18日凌晨3时整，随着红色信号弹的腾空升起，担负攻城任务的三五八旅七一四团、七一六团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同时发起猛烈攻击。战士们冒着密集火力，爆破城门，攀援城垣，迅即抢占了县城大部分区域。城内守敌全面溃散，大部被歼，一股狼狈逃往北山，一股退入古塔进行顽抗。18日拂晓，七一四团在团长徐立树的指挥下，向北山逃敌发起攻击。惊魂未定的敌人两次遭到致命打击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纷纷缴械投降，北山战斗顺利结束。12时，七一六团迅速包围古塔，对塔内之敌喊话，进行政治瓦解。但这股敌人迫于国民党县长的淫威，拒不投降，依然开枪射击，激起全体指战员的无比愤慨。七一六团遂将通入塔内的碉堡炸毁，又从三层塔窗打进一炮，迫使国民党柵邑县县长金炳嘉带残兵出来投降。

担任攻打上官庄之敌任务的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于4月17日傍晚赶到距上官庄二三里的赤道、窖子头村一带。经过认真观察地形和了解敌情后，随即部署一营攻打上官庄，二、三营在赤道、窖

子头一线拦阻县城逃敌。18日凌晨2时,一营包围了上官庄之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发起猛攻。经过短短的20多分钟激战,全歼上官庄之敌60余人。新四旅七七一团二、三营也于18日3时分别向职田、太峪之敌据点展开猛烈攻击,全歼太峪之敌60多人。与此同时,张洪、职田、魏洛等据点之敌被全歼。至此,攻城战斗结束,柘邑县城解放。这次战斗共毙、俘敌县长以下6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新四旅七七一团的任务是彻底扫除职田、太峪两个据点之敌,并迅速抢占亭口泾河渡口,掩护后续部队向邠县方向挺进。4月18日凌晨3时,二营五、六两个连,组成精干的爆破小组,在火力的掩护下,迅速将东、西两个城门炸开。然后同时攻入城内,与敌一六七旅的一个连展开了激烈的拼杀。在两个连火力的猛烈攻击下,敌人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最后只好缴械投降。这次战斗经过20多分钟激战,全歼职田守敌,并俘获敌镇长刘俊贤等全部伪职人员。攻击太峪据点之敌的三营在营长张景远率领下,将敌团团包围后,进行战场宣传,瓦解敌人。敌人疯狂扫射,张营长不幸中弹牺牲。全营指导员义愤无比,为了给营长报仇,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很快冲入城内,俘敌50人,太峪战斗胜利结束。

4月18日下午,部队对俘虏进行了逐个审查,除国民党柘邑县长等罪大恶极者交地方政府处理外,一部分释放回家,大部分经过教育自愿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首战解放柘邑县城,拔掉了敌人所有据点。党的组织和各级政权经过充实加强,全力以赴动员群众支援解放战争。后来敌人又成立了国民党柘邑县政府和保安团。但因形势发生了根本变

化,国民党县府不得不设在敌统治中心邠县,只是有时到张洪一带骚扰。枸邑县区党组织经常派干部深入农村,不断整顿和加强农村各种组织,发动群众,随时打击敌特破坏活动。

1948年冬至1949年春,中共关中地委为使土改工作顺利进行,在老解放区普遍开展了“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工作。新正(枸邑)党组织在丰泉、清原、马栏、阳坡头4个区进行了整党和土改。

在巩固的老区进行公开整党的方针是:整党与土改、民主运动、支前工作相结合,党内外密切结合,以党内民主方式,弄清是非轻重,教育提高党员,暴露与处理坏党员,改选支部领导。目的是教育党员,提高觉悟,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不良现象,密切党群关系,使支部成为农村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批评揭发坏党员,表扬好党员,重点是揭发党员在战争中的立场问题,违法乱纪,打骂群众,营私舞弊等问题,然后重新进行登记,对违法乱纪的给予纪律处分,不够党员条件的开除出党,对涌现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如清原区,经过整党处分9名党员,开除2人,发展新党员44人。阳坡头区整党后评选三乡(后掌乡)支部为先进支部,支部书记张金荣带领25名党员,领导群众送公粮、做军鞋、抬担架,春季生产都搞得很出色。同时,对这四区进行了土地改革,按中央《土地法大纲》和西北局提出的“抽补调剂”的方针,对地富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清查漏网地主的土地,以多报少的黑地,以及公地庙产,分给无地和少地纠纷,统一平衡,评定了土地的等级和产量,向农民颁布了土地证,使农民安居乐业,努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在新解放区继续贯彻三反(即反特、反霸、反贪污)三建(即建政、建党、建团)工作。普遍对过去的老党员进行调查摸底,分类排队,逐个进行审查,底庙区在被占领期间有变节行为和不够格的党员,经过审查开除了57名党员。张洪、太峪找到了原有的老党员,逐步恢复建立支部。在半老区土桥区,整顿了党员和干部的作风,改选健全了区乡政权组织,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密切了党群关系。

1949年2月,国民党枸邑县长兼保安团团长郝登阁率领国民党枸邑县政府保安团400多人投诚起义,然后率队进入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镇。从此,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对枸邑反动统治的历史,枸邑全部解放,开始了新的历史一页。

从4月16日发动西府战役,至5月21日西野转至关中分区马栏、转角地区休整,历时27天,形成近千余里,一度解放了关中国统区枸邑、永寿、邠县、长武和西府地区共14座县城,重创了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歼灭了1个整编师师部、6个团(含陕西保安团)及其地方武装共2.19万人,摧毁了胡宗南集团的主要补给基地宝鸡,缴获了大批军事物资。至1949年7月,先后发动了春季攻势、陕中战役、咸阳阻击战和扶眉战役,解放了陕西关中地区。

1949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三原地方委员会,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5月,三原地委从马栏镇移驻三原县城。随之,陕甘宁边区政府第26次政务会议决定将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改为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决定将关中军分区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三原军分区。

1949年5月,中共柟邑县委(1947年5月成立)、柟邑县人民政府(1949年1月由柟邑县政务委员会改称)改属中共邠县地委、邠县分区专署领导,分别下辖12个区委、区公署。

1949年9月,原陕甘宁边区新正县所辖柟邑之地阳坡头区、湫坡头区、底庙区划归柟邑县;原赤水县所辖土桥区、丰泉区划归柟邑县,并将宜君县的马栏也划归柟邑管辖,柟邑上属行政关系未变。至此,全境统一归于柟邑县,结束了数县并立、县城分割、县政不一的状况。到1950年4月,邠县地委、分区专署撤销,柟邑县归置咸阳分区管辖。

第七章

革命老区人民的贡献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关中分区人民群众特别是枸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老区人民的革命传统,积极响应“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密切配合形势需要,一切为着战争服务,大力组织支前运动,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踊跃参军参战 壮大游击力量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新正县每1万人中,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青年就有1000多人;枸邑起义农民中的100多名青年自愿参加红军渭北游击支队,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注入了新生力量。1932年,刘志丹率陕甘红军来到枸邑,程志英、潘远志带领23名青年参军。在陕甘红军攻克职田时,十几名青年自愿参军。1933年,枸邑游击队70多名战士,参加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1932年至1935年,五支队、十七支队先后有八十多名队员加入主力部队。1938年,枸邑县有300名青年报名参加八路军,经八路军办事处送往前线,抗日杀敌。

1946年冬,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后,解放军的兵源主要靠老区提

供。因此,分区成立了参军动员会,发出《参军动员令》,分区青年和民兵很快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这一年仅清原区就有50余名青年参军,在积极参军,壮大人民解放军的同时,又积极发展地方游击队,以协助正规军作战。同年丰泉、清原、马栏、阳坡头区各成立一支游击队,各乡还组建成立了自卫军,农忙务农,战时作战。1947年5月,又相继成立了西区支队、城太支队、张洪支队、后季又成立了中原游击队柘邑武工队,共有190多人参加。1947年6月到8月,全县有376名青年参加独立营,次年被编入关中二十一团,成为关中一支重要的解放武装力量。这些地方武装力量,配合主力部队,在解放城镇、攻夺碉堡、突击小股敌军、保卫边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开展拥军优属 密切军民关系

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以来,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亲密关系。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拥军优属活动的开展,把这种军民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

人民群众把红军看作自己的子弟兵,当部队过境时,为其送水送饭;部队住宿时,为其腾出房子,送被褥;部队驻扎时,为其磨面粉,报敌情;部队开拔时引路作向导。1932年初,陕甘红军在正宁县三嘉原成立时,阳坡头一带的群众,抬着猪肉、羊肉翻沟去慰问。1942年红三团围攻范家原碉堡时,赵家村一个媳妇擀了又细又长的面条,让公公给红军送去。公公送饭途中恰碰上一个卖香瓜的,

立即要把他的香瓜全部买下,卖瓜的惊奇地问:“你家有多少人,就要买一担?”老汉说:“我买瓜慰问正要作战的部队。”卖瓜的拒绝出卖,说留下自己去劳军。二人争执不休,到边区政府“打官司”,经区委书记郭文学调解,每人各分一半,两人高高兴兴同去劳军。1933年,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张秀山负伤,七里川群众将他接至家里安全疗养。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犯清原区,陈家村群众将伤员转移到沟里窑洞,按时送吃送喝,精心照料。1947年春,县委宣传部长严一农的爱人和孩子寄养在乔儿沟群众家里,大解放后才离开。1948年西北野战军攻打县城,路经赵家洞,河上没桥,战士涉水过河。当地百姓怕战士受凉,用凳子和木板搭桥,但水流湍急,桥板不稳,群众跳入河中,将桥板按住让队伍通过。为了不使战士忧心家务,有的村庄,大家轮流为各家军属帮工代耕;有的村庄,几户一组,每组各固定一家军属帮工代耕,从播种、管护到收割、打碾,负责到底。

1947年八九月间,新正县安置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伤病员467名。因敌人反复“清剿”,无法集中治疗,政府把他们疏散在山后一带群众家里,由群众负责护理。当时,群众提出口号是:伤病员是我们的亲人,有我们在就有伤病员在。在那些日日夜夜里,群众时刻为伤病员的安全操心,遇到敌人搜查,他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总是想方设法掩护伤病员。有的群众宁肯自己吃菜咽糠,也要把好吃的留给伤病员。有的在较长的时间里,不辞劳苦的陪伴伤病员,接屎接尿,背出背入,洗伤换药。有的翻山越岭采集中草药,利用民间秘方、验方为伤病员医伤去疾,解除痛苦。当时,一区一乡野人湾村赵宗发家寄养着7名伤员,有几次敌人“清剿”,他将

伤员逐人背进梢林掩护起来,等敌人走后,又背回家中。每次做饭前,都要征求伤员的意见,他们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尽量使他们吃的香甜可口。对伤病员的衣服、绷带勤洗勤换,保持清洁卫生。他们经常陪伴伤员,给他们说心里话,给他们说宽心话,进行精神安慰。对生活不能自理的伤员,全家人喂吃喂喝,接屎接尿,洗头洗脚,使7名伤员很快痊愈归队。

第三节 提供军需供应 积极支援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大反攻形势的需要,配合西北野战军和地方部队推进解放战争。各区乡都组织有长期、短期的担架队、运输队,区设大队、乡为中队、村为小队。各队设队长,召之即来。青壮年一般编入担架队,一户有两个劳力的出一人编入常年担架队,其余编入短期担架队,每5个担架队员备好一副担架。当时仅阳坡头一个区编成一个长期担架队,队员150人,担架30副;一个短期担架队,队员86人,担架16副;并5副担架配毛驴1头,以便驮运担架队员本身所需物品。此外,还组织了拥有骡马70头的运输队,为部队行军运送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清原区1946至1948年,先后随军担架450副,驮畜400多头,随部队运输,另外,还组织起一支有650人参加的镢头队,当我军拿下一城一池或一碉堡时,镢头队便紧接着挖城墙、毁碉堡、平壕沟、疏交通。1947年1月,我警一旅红三团攻打柞邑县城时,崔治平组织清原区6个乡的担架50副、镢头队150人、运输队牲口100多头,支援县城解放,为我军抢运粮食50石,运至甘草坪我军仓库。1947年后季,部队

解放耀县,清原区民兵营长带领担架 200 多副,随军行动,受到部队表扬。同年,枸邑县曾组织运输队,人担畜驮,将 120 万斤粮食转运到马栏、正宁县的刘家店和中部县的槐树庄、岷庄等地。1948 年 4 月,县城第五次解放,清原、城关两区动员群众将 13.8 万公斤小麦,不分昼夜从县城运往清原。解放邠县后,张洪区、魏洛区动员群众,将 12 万公斤小麦由邠县仓库转运回枸邑县储存。此外,还组织长期担架 80 副,驮畜 60 头,运输员 49 人,随大军到宝鸡,转战陇东,历时半年,完成支前任务后返回。同年 9 月,又组织 500 人的担架队随野战军转战陕甘两省,历时一年零两个月。

1949 年 9 月,我十八兵团进军西南,解放四川,枸邑县组织 140 余副 513 人的担架队,224 头驮畜,随着尖兵团,沿川陕公路,爬山涉水,在硝烟弥漫的战斗中,出色地完成了抢救伤员和输送弹药的任务。之后,在有 24 县支前大队参加的“支援四川解放评比大会”中,枸邑县荣获支前第一名。司令员贺龙接见了全体支前人员,还讲了话,他说:“来自枸邑老区的支前队,忠勇精干,英勇顽强,听从指挥,有正规军的纪律,为解放四川贡献了力量,给我军作出了榜样”。当会奖给枸邑支前大队一面红旗,上面写着:“支前模范”四个大字。

同时,积极动员群众为部队支援粮食、军鞋等军需供应,1948 年,我西北野战军一、二、三、四、六纵队出击西府在马栏、转角、庙湾、照金集结,准备部队所需食粮。枸邑群众及时给予支援,那时交通极其困难,群众冒着敌人的阻拦,或是冒着寒冬积雪、或是冒着盛夏酷暑,赶着毛驴、驮着粮食,送往边区设立的粮台。清原区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半山区,每年交公粮都在 300 石以上,蒲社是一

组 织 篇

马栏革命史部分党政军群组织沿革序列

一、中共柞邑特别支部委员会(1926.09—1927.10)

书 记:许才升

组织委员:程永盛

宣传委员:王子健

二、中共柞邑区委员会(1927.10—1928.05)

区委书记:吕佑乾

组织委员:吕凤岐

宣传委员:王浪波

1、中共宝塔高小支部书记:许才升

2、中共魏洛支部书记:第五伯昌

3、中共郝村支部书记:王英武

4、中共东涧支部书记:崔廷儒

5、中共县城机关支部书记:马富贞

三、柞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1928.05—1928.05)

主席:许才升

秘书处秘书:吕凤岐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程永盛

土地分配委员会委员长:程百印

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蒲玉阶(蒲允升)

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程国柱

宣传委员会委员长:王浪波

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王日省

革命裁判委员会委员长:程雨顺

四、中共柞邑特别支部委员会(1929.01—1932.10)

书 记:崔维峻

组织委员:崔廷儒

宣传委员:蒲玉阶

社会委员:第五伯昌

五、中共柞邑县委员会(1932.10—1935.10)

书 记:焦思洲

组织部长:蒲玉阶

宣传部长:梁永杰

六、中共柞邑县委员会(1935.12—1937.03)

书 记:许国均(许可进)

组织部长:杨维奎

宣传部长:杨运启

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团(1932.12—1933.08)

团 长:王世泰

政 委:杜 衡 汪 锋(后,代理)

参 谋 长:郑 毅 刘志丹(后)

政治处长:刘志丹

参谋处长:杨重远

经理处长:刘约三

管理处长:杨 琪

随营学校校长：李杰夫

步兵第一连连长：李亚夫

步兵第一连指导员：李秉荣

步兵第二连连长：吴岱峰

步兵第二连指导员：高锦纯

骑兵连连长：曹胜荣

骑兵连指导员：张秀山

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福

少年先锋队指导员：魏 武 习仲勋(后)

八、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1933.03—1933.08)

特委书记：金理科 秦武山(后)

军委书记：习仲勋

委 员：金理科 秦武山 习仲勋

师克寿 张秀山 李妙斋

秘 书 长：杨再泉

九、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1933.04—1933.10)

主 席：周冬至

副 主 席：习仲勋

经济委员：杨再泉

粮食委员：姬守祥

土地委员：王满堂

肃反委员：王万亮

十、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1933.03—1933.10)

总 指 挥：李妙斋 黄子文(后) 吴岱峰(后)

政 委:习仲勋 张秀山(后)

参 谋 长:史进才

十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1933.08—1933.11)

总 指 挥:王泰吉

副总指挥:刘志丹

政 委:高 岗

参 谋 长:刘志丹(兼)

十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1934.11—1935.02)

主 席:习仲勋

副 主 席:贾秀生 牛永清

政治秘书长:蔡子伟 张文华(后)

十三、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1934.09—1935.12)

书 记:张邦英 唐洪澄(后) 鲁学增(后)

1、中共新正县委书记:卢永财

2、中共赤水县委书记:金理科 周志宏(后)

3、中共淳耀县委书记:郭存信 郭廷藩(后)

4、中共新宁县委书记:焦怀兴

5、中共永红县委书记:赵宏钧

6、中共中宜县委书记:刘恩善

十四、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1934.09—1935.10)

主 席:黄子文 张邦英(后)

1、新正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郭廷藩 左怀玉(后)

2、赤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振喜

3、淳耀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姚殿森

4、新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有鹏

5、永红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梁文汉

6、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仲良

十五、陕甘边区南区苏维埃政府(1935.10—1935.12)

主 席:秦善秀

副 主 席:张邦英

十六、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1936.01—1937.10)

特委书记:贾拓夫 汪 锋(后) 习仲勋(后)

组织部长:唐洪澄 张凤岐(后)

宣传部长:张德生 张 策(后)

军事部长:江 华 张仲良(后)

统战部长:张 策 刘景范(后) 强自修(后)

社会部长:李会友

妇女部长:李会兰 郝明珠(后)

十七、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1936.01—1937.10)

主 席:秦善秀 霍维德(后)

副 主 席:习仲勋 张邦英 封正宝(后)

十八、关中特区司令部(1936.01—1937.10)

司 令 员:江 华 汪 锋(后) 张仲良(后)

政 委:贾拓夫 习仲勋(后,兼)

副司令员:陈国栋 黄罗斌(后) 金道松(后)

政治部主任:谢兴发(1937.01—1937.10)

十九、枸邑红军募补处(1937.04—1937.08)

主 任:薛和爽

二十、柞邑八路军办事处(1937.08—1939.05)

主 任:薛和爽 田润芝(后)

组织部长:兰子敬

宣传部长:姚鹏飞

二十一、中共柞邑工委(1937.08—1940.10)

书 记:田润芝 杨安仁(后)

组织部长:许尚志

社会部长:许尚志(兼)

宣传部长:兰子敬(1937.08—1939.05)

军事部长:王四海(1937.08—1939.05)

工委委员:李述珍(1937.08—1939.05)

办事处秘书:郝占元(1937.08—1939.05)

二十二、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1937.10—1942.12)

书 记:习仲勋 张德生(后)

秘 书:杨再泉 师 源

组织部长:张凤岐 杨成森(后)

王月明(后) 惠庆祺(后)

宣传部长:郭炳坤 高仰云(后)

统战部长:强自修 孙作宾(后) 梁明德(后)

军事部长:张仲良

《关中报》社长:高仰云(兼)

二十三、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7.10—1949.05)

专 员:霍维德 习仲勋(后) 张仲良(后)

副 专 员:张鹏图

政务秘书:李会友 霍洁涓(后) 闵亦凤(后)

袁志和(后)

二十四、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1937.10—1942.12)

司令员:张仲良 文年生(后)

政委:习仲勋 张德生(后)

参谋长:雷恩俊 唐焕亭(后) 齐渭川(后)

李治国(后) 欧阳稼祥(后)

政治部主任:谢兴发 牛书申(后) 杜平(后)

二十五、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1942.12—1945.08)

司令员:文年生 王世泰(后)

政委:张德生

政治部主任:杜平 牛书申(后)

二十六、关中分(特)区工会(1937.07—1945.08)

主任:张如洲 高凤山(后) 孟献云(后)

(1942.12 后待查)

二十七、关中分(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1937.07—1943 夏)

主任:贺建山 胡秉坤(后) 王治周(后)

李仰山(后) 张万玉(后) 朱乐(后)

二十八、关中分区妇女联合会(1937.10—1945.08)

主任:郝明珠 (1942.12 后待查)

二十九、关中报社(1940.04—1950.04)

社长:高仰云(兼)

副社长:何承华(陈华) 朱平

主编:胡炎 毛岚 雷阳

何承华 景生明
 通讯采访股:潘明文 冯元硕
 编辑:陈克刚 师继祖 王福祥
 记者:刘衡 李守理(赵潭冰)
 李根蒂 白玉洁 王任 张国宁
 文正钦 姚文化 蒙振民 王伟章
 部队版人员:唐国亮 史桥 黎明
 缮写股:王振华 程志坤 唐磊(韩夏存)
 张振西 杜树森
 印刷室:王兴中 赵文彦 王正恩 张培成
 其他人员:罗枫 柏军

三十、陕北公学看花宫分校(1938.07—1939.06)

校长:李维汉
 党委书记:申力生
 教务部长:邵式平
 组织委员:陈伯村
 政治部主任:周纯全
 宣传委员:申力生(兼)
 校务部长:袁福清
 俱乐部主任:刘春

三十一、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1940.03—1949.05)

校长:习仲勋(兼)
 副校长:刘端棻
 党支部书记:王伯勋

教务主任:刘 耿

生活指导处主任:王伯勋

事务处主任:季 达 王 敏(后)

管理科长:冯宝仁

供给科长:周子清

三十二、抗日荣誉军人学校(驻柁 1938.12—1940.02)

校 长:王 群

政 委:王 群(兼)

校务处处长:于桂武

校务处副处长:黄自强

政治处处长:陈振亚 陈余巨(后)

教务处处长:杨 霖

警卫连连长:陈桂林

警卫连指导员:陈光全

通讯排排长:司明举

三十三、中共陕西省委(1939.12—1943.01)

书 记:欧阳钦

组织部长:张德生

宣传部长:赵伯平

统战部长:汪 锋

秘 书 长:张 中

三十四、中共关中地委(1943.01—1945.07)

书 记:张德生

组织部长:惠庆祺

宣传部长:高仰云

统战部长:汪 锋

秘 书 长:张 中

三十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2.05—1949.02)

司 令 员:贺 龙 王世泰(代)(后) 贺 龙(后)

政治委员:高 岗(代)习仲勋(代)(后)

副司令员:徐向前 王世泰(后) 王维舟(后)

阎揆要(后)

副 政 委:谭 政 张仲良(后)

参 谋 长:张文舟 张经武(后)

教导第一旅旅长:罗元发

教导第一旅政委:罗元发(兼)

教导第二旅兼延属军分区旅长:黄永胜

教导第二旅兼延属军分区政治委员:邓 华

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旅长:高锦纯

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政委:张德生

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军分区旅长:贺晋年

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

新编第四旅政委:徐立清

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旅长:王维舟

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政委:马文瑞

绥德军分区司令员:王季龙

绥德军分区政委:王季龙(兼)

三十六、解放战争时期关中地委(1945.08—1949.04)

书 记:张德生 高锦纯(后) 赵伯平(后)

杨伯伦(代,后)

秘 书 长:张 中 张凤岐(后) 张 中(后)

组织部长:惠庆祺 强自修(后) 杨伯伦(后)

张凤岐(后) 郭文学(后)

宣传部长:高仰云 张剑英(后) 王秉祥(后)

统战部长:吕剑人 陈学鼎(后)

社会部长:强自修(兼) 任成玉(后)

三十七、关中军分区(1945.08—1949.04)

司 令 员:高锦纯 陈国栋(后)

政 委:张德生 高锦纯(后) 赵伯平(后)

杨伯伦(代,后)

副司令员:汪 锋 杨拯民 陈国栋

黄子祥(后)

副 政 委:牛书申 杨伯伦(后)

参 谋 长:刘懋功

政治部主任:李赤然

三十八、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1946.01—1947.03)

书 记:汪 锋 赵伯平(后)

秘 书 长:张 中

组织部长:王 俊

宣传部长:周芝轩

统战部长:吕剑人

社会部长:刘护平

三十九、西北野战军(1947.03—1949.02)

前线委员会书记:彭德怀

司令员:彭德怀

政委:彭德怀(兼)

副司令员:张宗逊 赵寿山(后)

副政委:习仲勋

参谋长:张文舟

政治部主任:徐立清

后勤司令员:刘景范

四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03—1949.02)

司令员:贺龙

政委:习仲勋

副司令员:王维舟 阎揆要

副政委:张仲良

参谋长:张经武

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人物篇



刘志丹

(1903—1936)

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最早创始人之一。

刘志丹同志早年立志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和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并创建了红二十六军,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后,刘志丹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瓦窑堡警备司令、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1936年4月东征时在山西中阳县牺牲。

刘志丹同志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历尽千辛万苦,足迹踏遍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他曾多次率部在马栏、旬邑一带从事革命武装斗争,打土豪,惩恶吏,使反动势力闻风丧胆,为发展壮大旬邑地区的人民武装、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同志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谢子长

(1897—1935)

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参加了渭华起义。曾任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兼第3大队队长,后与刘志丹一起创建工农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历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2月在指挥河口战斗中负伤,次年2月逝世。

谢子长同志一生驰骋疆场,英勇善战,曾多次率部在旬邑的职田、张洪、县城等地,惩恶霸,除恶吏,昼弛夜奔,身先士卒,使反动势力惊恐不安,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毛泽东先后两次为他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书写碑文。



习仲勋

(1913—2002)

陕西富平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习仲勋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同年3月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人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才得以释放平反,从而挽救

了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1943年2月,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委。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1952年9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53年9月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

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8年4月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了许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汪 锋

(1910—1998)

陕西省蓝田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

汪锋同志早在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1928年5月参加了渭华起义。1931年底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秋任中共渭北特委书记、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1933年3月，任红二十六军代政委，与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同年任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1935年7月，他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关中特委书记，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1936年9月，赴十七路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长、关中地委副书记、统战部长、警备第一旅副旅长、关中警备区副司令员、保安处处长等职。

1946年1月，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9月任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边区政府主席、军区政委和行政公署主任。1947年7月，任陈赓、谢富治兵团前敌指挥委员会委员兼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政委。1948年6月，任陕南地区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统战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民族学院院长。1954年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代理书记。1958年,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1年1月,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1977年7月,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78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2年,汪锋同志奉调回京,参与领导中央落实政策和对台工作。1987年4月,被增补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



张德生

(1909—1965)

陕西省榆林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陕西党组织早期创建人之一。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长。1932年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书记。1933年1月至5月任中共宁夏区委书记,6月至8月任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部长,同年11月至1934年2月任陕南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36年1月至3月任中共关中特委宣传部部长。“西安事变”后,参与重建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同年12月至1941年6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37年3月至1938年春兼任西安市委书记。1941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42年7月兼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中共关中分委书记。1942年12月至1946年4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1943年1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1945年9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榆林地委书记、榆林分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专员、西北野战军前委民运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书记、一野政治部副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兼甘肃省军区政委、党委副书记、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陕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等职。



张仲良

(1907 — 1983)

陕西省耀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耀县特支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1933年,与张邦英等组织建立了耀县游击队。1934至1935年,任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大队政委、红二十六军第一团政委、中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冬去中央党校学习,随后被派往关中分区工作,任红三团政委、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长、关中分区军事部长。1939年夏,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关中分区司令员、关中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关中分区专员、八路军留守兵团教导一旅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陇东军分区司令员、中共陇东地委书记、专员、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等职。

建国后,历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8年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赵伯平

(1902—1993)

陕西省蓝田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
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

赵伯平同志早年投身革命，与刘志丹等一起为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三原中心县委书记、陕西省委执委、常委兼宣传、统战、组织部长、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兼统战部长等职。1945年出席了中共“七大”。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直辖的西安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西安市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长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陕西省政府党组书记、常务副省长、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



文年生

(1907 - 1968)

湖南省岳阳县新墙镇人。1926 年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教导团当兵,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红三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第三师十团团长,第八十一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长兼团政治委员,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八团团长,绥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警备第一旅旅长兼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在关中分区期间,组织部队一面执行警备任务、进行教育训练,一面参加屯田开荒,成绩显著,受到毛泽东的表彰,并为其题词“教育与生产二者兼顾”。1945 年 5 月任八路军南下第三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冀察军区代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六十八军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湖南军区副司令员。

建国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 9 月 27 日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8 年被迫害致死,1978 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被迫认为烈士。



高锦纯

(1912 - 1995)

陕西省米脂县镇子湾村人。1930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西榆林六中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会长。

1932 年 7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陕甘边游击第二大队政治处干事、耀县游击队政治指导员,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政治委员兼师党委书记。1934 年 5 月起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 年春任红一方面军中路军骑兵团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政治委员。1938 年至 1944 年,派赴山东参加领导重建胶东特委和创建胶东抗日根据地。1945 年 5 月至 8 月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兼关中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一旅旅长,关中地委书记(1945 年 9 月起)。1947 年 11 月兼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1947 年 9 月至 1949 年 2 月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警备第一旅旅长、党委委员。1947 年 11 月兼任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1949 年 2 月起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党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第四军政委、党委副书记。率部参加收复关中、保卫延安、黄龙战役、扶眉战役、陇东追歼战、兰州战役、河西追击战等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建国后,历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新疆分

局委员、新疆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副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副部长,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5年6月25日因病在兰州逝世。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



贾拓夫

(1912—1967)

陕西省神木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共陕西党组织早期创建人之一。

1926年考入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同年加入共青团组织,后任团县委书记。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团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后任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并代理团特委书记。1929年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西安市团委书记。1932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1934年1月去江西瑞金苏区协助陈云做白区工作。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贾拓夫同志受党中央委派,负责和陕北红军及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39年,去延安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工作。1942年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45年出席了中共“七大”。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安市军管会第一副主任、西安市委书记、市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等职。1956年出席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张邦英

(1910—2010)

陕西省耀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红二十六军三团二连政治指导员,中共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部长,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1937年后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陕甘宁边区延属地委书记兼三五九旅政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及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诬陷和迫害。后曾任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常委,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王世泰

(1910 — 2008)

陕西省洛川县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团团长、红三团团长,陕北苏区军事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共西北局常委,三边分区地委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政委,关中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四军军长,第二兵团政委等。

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主席,省军区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铁道部副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等。“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后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政协主席,甘肃省委常委、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等。是中共七、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十七大特邀代表,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霍维德

(1902—1977)

陕西省绥德县人。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绥德东区党组织书记、农协副主席、中共绥德县委书记。1935年1月任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6年12月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7年4月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关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县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新正县县长。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10月起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税务总局局长兼粮食局局长、禁烟督察处处长,晋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甘肃行政公署第一副主任。

建国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甘肃省委第二书记、甘肃省副省长。1965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调任山东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



欧阳钦

(1900—1978)

湖南省宁乡县人。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 8 月,到苏联学习。1926 年回国,入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 年 9 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秘书兼武汉《国民日报》编辑。1927 年初,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组织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1928 年秋,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组织科科长。1929 年 10 月,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秘书。1930 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1931 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3 年,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4 年,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三军团第六师政治部主任。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1935 年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1936 年,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省工委书记,中共陕西省西北军工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1937 年起,任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长、宣传部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副局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秘书长,中共旅大地委书记、旅大区委书记、旅大市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东北协作区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1978 年 2 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陈国栋

(1903—1992)

陕西省耀县人。1929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耀县游击队分队长、连长、党特支书记,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一团团团长。陕甘边区南区军事部部长、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1936年1月任关中特区司令部副司令员。4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陕甘独立师第三团团长,跟随刘志丹等创建照金、南梁等陕甘革命根据地,率部智取旬邑县城。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辎重营营长、留守兵团特务团副团长、保安第三团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保安纵队长、司令员兼政委。1945年8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副旅长、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军分区司令员。1949年任宝鸡军分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宝鸡市军管会副主任。

建国后,历任宝鸡地委常委、陕西省军区参谋长,陕西省农林厅副厅长、农业厅副厅长,畜牧厅厅长,陕西省水土保持建设师师长、政治委员,陕西省第四届政协常委等职。



张鹏图

(1913—1985)

陕西佳县人,又名胡郁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葭县县委书记、中共志丹县委书记。1937年10月任中共关中分区区委常委。1939年9月任中共吴堡县委书记、司法处处长。1941年5月起任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关中地委委员,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1942年12月兼关中师范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松江省政府常委、民政厅副厅长,松江省哈南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哈南地委副书记,松江省委委员,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

建国后,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松江省委委员、甘肃省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监委书记、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常委、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蒙定军

(1913 — 1988)

蒙定军,原名鼎钧,陕西省旬邑县人,是我党杰出的兵运、情报和统战工作者。

1928年5月参加了旬邑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到杨虎城部十七路军做地下工作。西安事变时,任孙蔚如西安戒严司令部参谋。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三十八军十七师人事科长。1938年1月,奉命陪同赵寿山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接见。1939年春,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任命蒙定军为书记。先后任国民党三十八军中共特派员、工委书记、“西安军事情报组”负责人,1947年5月,任关中地委常委、军分区参谋长。

建国后,历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秘书长,西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副部长、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民委副书记,西北民族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甘肃省第二至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甘肃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三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崔廷儒

(1911—1941)

崔廷儒,又名崔景岳,陕西省旬邑县人。

14岁考入县宝塔高等小学,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春,参加旬邑地下党领导的向旬邑县政府请愿的游行示威和悼念李大钊等“四·二八”遇难烈士纪念大会等活动。1928年5月参加了旬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部分同志带领起义群众转入山区,分散隐蔽,坚持斗争。1930年,崔景岳打入陇东绥靖司令部,任司令部文书。不久,与蒲玉阶等人组织了旬邑县委。1933年和1935年曾先后两次担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秘书长。1936年12月25日,中央代表团宣布重新成立陕西省委,任省委秘书长。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开辟宁夏地区的工作,中央派崔廷儒担任宁夏工委书记。1940年4月13日,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进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1941年4月17日深夜,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活埋于银川市城隍庙,时年30岁。



许才升

(1903—1928)

许才升,陕西省旬邑县人,旬邑起义领导人之一。

1911年上私塾,后因家贫失学。1919年升入旬邑宝塔高级小学读书。1922年考入西安成德中学。1925年考入西安省立单级师范中学。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8月,他受党组织派遣回到旬邑,开展革命活动。9月间,同宁可齐、程永盛、王子健等创建中共旬邑特别支部,许才升任书记,并建立了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任常务委员。1927年1月,奉命到渭南担任党的东南区区委书记。7月,回到旬邑,举办学习暑期班,成立了中共旬邑宝塔高级小学支部,许才升任书记。

1928年5月,许才升从西安回旬邑,同中共旬邑区委书记吕佑乾一起,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精神,于5月6日发动了旬邑农民起义,12日成立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并当选为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5月31日,由于叛徒出卖,起义失败,在旬邑张洪镇就义。时年25岁。



吕佑乾

(1896—1928)

吕佑乾,又名永坤,河北枣强人。旬邑起义领导人之一。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4年夏到西安,先后在省立一中、省立第一师范和私立新民中学任教,并与雷晋笙等人共同创办《西北晨钟》杂志,宣传反帝反封建。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组织发动西安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成立学生雪耻会、工商雪耻会,组织宣传队到各县宣传反帝爱国思想。1925年8月到杨虎城创办的耀县三民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率部参加西安反围城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转辗蓝田、渭南、华阴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冬任中共旬邑区委书记。区委下辖5个支部,党员50多人。他以卖笔墨为名,深入农村,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员,为旬邑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

1928年5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领导发动了旬邑起义,成立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5月底,由于叛徒出卖,起义失败,在旬邑张洪镇就义。时年32岁。



王浪波

(1904—1928)

王浪波,原名悦益,字友三。陕西省渭南县双王公社凹里王村人,旬邑起义领导人之一。

1919年春考入渭南县私立乐育高小丙班。1922年春考入陕西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及一些革命书籍。1925年参加三原青年学生组织的驱逐军阀吴新田运动,毕业后回渭南。1926年担任渭南县高级师范学校校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渭南县教育局局长职务。1928年春,接受党的指示,辞去教育局局长职务。因为他党性强,富有工作能力,省委调他回西安,另行分配工作。1928年3月,被省委派往旬邑工作,任中共旬邑区委宣传委员。

1928年5月,他积极参与并领导旬邑起义,率领部分起义农民维持城内秩序,并任临时苏维埃政府宣传委员会委员长。起义失败后,在旬邑张洪镇英勇就义。时年24岁。



吕凤岐

(1904—1928)

吕凤岐,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人。
旬邑起义领导人之一。

1924年考入西安一中上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共产党员雷晋笙主办的《陕西国民日报》任编辑。1927年夏,由陕西省委派往旬邑,在宝塔高级小学任教。1927年7月,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吕凤岐与许才升、宁克齐一起,在宝塔小学举办了有旬邑、彬县、甘肃正宁等地进步教师、学生八九十人参加的暑期学习班,为革命培训骨干力量。吕凤岐在宝塔高级小学任教师期间,积极协助许才升、吕佑乾秘密发展党组织。至1927年年底,全县已发展了53名党员,建立了5个基层党支部。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共旬邑区委(后改为中共旬邑县委),吕凤岐担任组织委员。

1928年5月,根据省委指示,吕凤岐领导发动了旬邑起义,成立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并担任秘书主任,负责设计、制作了苏维埃政府的旗帜、印鉴,拟写了群众大会的程序和讲话稿,书写“要有阶级觉悟性,勿作时代落伍者”和“要学那铮铮之辈,勿效彼庸庸之流”的对联,贴于大会主席台上。并负责处理临时苏维埃政府的日常工作。5月底,由于叛徒出卖,起义失败,在旬邑张洪镇就义。时年24岁。



程国柱

(1905—1928)

程国柱,陕西省旬邑县人,旬邑起义领导人之一。

1925年至1927年在旬邑宝塔高级小学和西安一中上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组织委派回到旬邑在清原郝村、吕家任教,从事革命活动。

程国柱自幼好学,勤奋努力。1926年在宝塔小学就读期间,积极参加了许才升组织和领导的宝塔小学学潮和向伪县府请愿的活动。1927年他又参加了许才升等举办的暑期学习班,接受马列主义教育。

1928年5月,旬邑起义爆发,他奉许才升之命,带领起义队伍,杀死恶绅程茂育和省府催粮官员,敲响了旬邑起义的锣鼓。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任临时苏维埃政府交通委员会委员长。5月30日,由于叛徒出卖,同敌人战斗中,英勇搏斗,身负重伤后被俘,次日在旬邑张洪镇就义。时年23岁。



程永盛

(1906—1928)

程永盛,陕西省旬邑县人。旬邑起义领导人之一。

自幼在本村小学就读,1925年后在旬邑宝塔高级小学和西安省立一中上学。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程永盛被党组织派往西安中山学院农运班学习,农运班结业后,他返回旬邑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秋至1928年初在县城仓里、丈八寺等小学任教。在仓里小学任教期间,在学生中秘密发展了5名党员,成立了仓里小学党小组,程永盛任组长。

在1928年5月爆发的旬邑起义中,积极参与并负责作战指挥,同许才升、程国柱到郝村整顿队伍,组织十几名铁匠修造武器,为发动农民起义作好准备。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任临时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游击队总指挥。5月30日,敌人围攻县城时,指挥游击队进行了英勇抵抗,被捕后,次日在旬邑张洪镇就义。时年22岁。



王廷碧

(1906—1928)

王廷碧,陕西省旬邑人。旬邑起义领导人之一。

1923年考入旬邑宝塔高级小学。1925年至1926年初在西安新民中学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回到旬邑,即和共产党员许才升、宁克齐等在宝塔高级小学任教。他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学生要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看书自由、信仰自由,组织教师和学生驱逐了反动校长,赶走了守旧教师,清算了账目,成立校务会,实行校务民主。

1927年12月,王廷碧、王日省、王子健在《中山日报》上揭露了旬邑县县长庞天赖敲诈勒索民众的罪恶事实。此事被庞发现后,即将王廷碧、王日省、王子健三人逮捕入狱。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他们宁死不屈,始终不交出共产党员名单。

1928年5月,旬邑农民起义后,将王廷碧等营救出狱,后被派到淳化县发动农民围城,策应旬邑起义。5月底,由于叛徒出卖,起义失败,在旬邑张洪镇就义。时年22岁。

回忆篇

习仲勋同志谈关中党史(节选)

1931年,刘志丹同志领导之反帝同盟军(二十六军前身)在新正二区的三嘉塬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游击队,举了苏维埃的红色旗帜,这时候的关中革命运动在红军游击队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和组织了群众,建立了红军游击区域。

1932年革命运动继续高涨,3月间新正一区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地方赤卫军和少先队,同时在五顷塬一带没收了地主豪绅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当时因为这里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情绪不是很高的。

不久几个月(6月间),很小的一块根据地,完全被敌人破坏,政权亦受到了摧毁,红军游击队亦转移到保安(志丹)一带去活动。

1933年3月,又在耀县的照金建立红军根据地,这时陕甘宁特委由金理科、习仲勋、师克荣等负责领导游击队的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运动。当时因李妙斋对游击运动的领导,犯了土匪路线的错误,21个支队的成份大部分是土匪出身,在行动中形成与群众的对立,即由二十六军党委将李妙斋撤职,由黄子文任照金苏区游击队指挥,习任政委,遂将21个支队分别审查,凡是土匪成份与脱离群众的全部解散,即以其中精锐者组织了3个支队(旬邑游击队、耀西游击队、淳化游击队),其成份已经改造成为苏区红军中的主要力量,苏区政权亦由当时成立,周冬至同志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此时即有计划地进行组织群众,分配土地等工作,遂一

度奠定了根据地的基础。

4、5月间,二十六军由杜衡领导南下渭华一带失败,关中苏区只有3个游击队,人数百余,枪数十支,而进行保证苏区与扩大根据地的工作。6月间金理科调回省委,继由秦午山任书记,高岗同志即于这时由省委派来(特派员)领导陕甘边区工作,则更加强了边区党的领导。5月,耀县杨虎城部王泰吉之骑兵团,在我党的兵运工作之下,组织了耀县兵变,但由于领导的错误及部队中党的力量薄弱,军事行动迟疑,士兵贪钱思家,因此,辘辘坝一战,全军溃败,仅留残部百余,撤至照金苏区和红军游击队汇合。7月间高岗领导所召开之陈家坡会议,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胜利后,即决定从苏区之游击队和义勇军、渭北红军第四团,整编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四师。

农历八月二十六日特委所在地薛家寨被杨虎城部进攻,当时因众寡悬殊,我们即退出薛家寨,这时候苏区的下层组织只有一个区委。苏维埃政府工作是在比较有系统的建立着,土地已大部分分配,其政策是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并予土地不足之中农补充,在群众组织方面有雇工会、贫农团、妇女会等,以及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等。中心任务是广泛的武装群众,扩大苏区,进行分粮斗争,开展群众运动。

1934年春,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又正式成立,张秀山同志任书记,划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当时陕北为第一路,南梁为第二路),2月间即在关中成立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当时由王安民同志任指挥,张仲良同志任政委,统一关中游击队的领导(当时关中有特务队、耀县游击队、坪子游击队)。7月间即在五顷

塬一带建立了党的组织,组织了农民联合会,并在淳化蒋家山一带也成立了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8月又在新正湫头成立了党的支部。

1934年冬,在宜君县的小石崖成立了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和南区区委(书记张邦英),1935年春,新正、新宁、淳化成立了革命办事处,但在3月后南区革命委员会即遭马鸿逵部的进攻,而受到了破坏,7月间又成立了正旬彬革命委员会(主席郭廷藩同志),10月间正式成立了关中特委(书记鲁贲)和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当时领导有淳耀、赤水、新正、永红、新宁等5个县苏维埃政府,所有基干游击队改编为红一团,以陈国栋(团长)、张仲良(政委)为领导。同时,各县委也建立起来了。

这时候关中的革命运动是在高潮的向前发展着,但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涛领导之“肃反”的错误,捕杀了关中许多干部,加之群众恐慌,当时工作是受到了很大影响,接着关中的革命运动是趋于停止的阶段。

1936年1月,关中特委由中央派贾拓夫同志任书记,习仲勋同志由中央派回关中任苏维埃副主席,张邦英同志为特委宣传部长……

4月间国民党部队东北军十一师,组织三路向关中苏区进行全面的“围剿”,坚持一月之久,关中5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全部被敌人摧毁,红军主力第一团及一、二、三独立营,全部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

特委当时决定由习仲勋、唐洪澄、汪锋等同志组织关中工委,

坚持关中游击战争(洪澄同志不坚持,要求回中央去了),在军事上划关中为两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当时关中整个5个县域,全部被敌人占领,所有中心区域,敌人都建立据点,仅余新宁县1个乡(平道儿)敌人是没有骚扰到的,红军游击队也是分散的秘密活动。当时国民党则进行清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我党干部投诚叛变。而关中的革命运动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严重形势下,整个党的工作,如何的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党的严峻任务。于是党决定,凡是一些外来干部和群众关系不很密切的人员,而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甚至不能立足的人员,立即分散撤退,不使遭受敌人的逮捕屠杀。虽然个别干部(高乱娃)向敌人投诚,或个别干部被敌杀害(秦善秀),可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是没有被敌人镇压下去的,而始终是站在革命方面的。

在军事上则是灵活的游击行动,避实就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绝对不能和敌人硬拼的,可是当时的军事负责同志,则犯了军事上的冒险行动,曾将游击队的一半力量拼掉,给当时的游击队运动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8月间汪锋同志调回中央(保安),派习仲勋同志再回关中主持工作。当时敌人的进攻策略,则以军事缓和改为政治为主了,于是加强保甲训练,进行对我内部瓦解破坏工作。9月初特委在赤水七界石召集了关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到会30多人,讨论坚持与恢复关中苏区和游击战争问题,当即决定:(一)各县以县为单位整理与扩大游击队,在行动上,则以集中袭扰,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的指挥部,以郭秉坤为指挥,习仲勋同志兼政委,以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二)尽可能的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中间民

团、保甲,打击最反动之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义等。(三)进行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五)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会议上一致的决议上述问题,并且调整了各地干部,特委领导同志,则应经常到各地帮助工作。这样以来敌人感觉到革命的力量是没有围剿消灭下去的,于是就沿山一带进行残酷的搜剿与并村政策。

根据9月会议的决议,关中党坚决的去执行了,10月间,即有了相当大的开展,对关中的民团、保甲的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军事战斗上又有新正县前马原、淳耀县的让牛村,赤水县郭家掌等战斗胜利。地方政权及党的组织都有相当部分恢复,泾河三区淳耀小坵,同宜耀香山等地都成立了新的苏区,并肃清了大股土匪,武装了革命的队伍。

在我们的工作新形势下,敌人则又采取了死守据点的政策,不像以前那样骚扰了,于是我们展开对敌士兵政治工作的活动,这时候赤水即有4个支队,淳耀即有两个支队及第十九支队,新正4个支队,新宁一、三、四3个支队,近500人之众,革命的潮流空前高涨。

“双十二”事变后,全国政治形势起了变化,整个革命运动高涨起来了,党对西安事变发表了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但是因为关中交通不便,没有及时接到中央指示,因此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方针没有接到指示,为了不失时机即决定各地以县为单位的红军游击队组织向外出击,扩大恢复苏区,争取民团、保甲自动交枪,于是在10天之内,全关中的整个苏区的版图恢复了,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4个县的苏维埃政府,全部恢复了党的工作。中央

红军南下以后,传达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之后,关中党才停止了扩大苏区和消灭国民党部队的行动。

.....

1937年1月,关中党即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划分苏区与友区的界限,当时关中4个县,赤水、淳耀、新宁3县是划分了,新正县是没有划清的,这时国内是和平统一了,党的中心工作应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于3月初,陕甘省委又部分合并于关中特委领导,即成立关中分区和抗日救国政府,这时候关中的党员即有700名左右,其组织共4个县委,19个区委。5月苏区党代表会议后,关中于6月召集区委书记会议传达。10月间即召集关中党代表大会,检查过去党的工作,讨论开展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转变为边区问题,选举习仲勋、郭秉坤、张仲良、霍维德等同志为关中分委委员。当第一次关中党代表大会后,关中是处在一个统一战线顺利的环境中,对外则与邻县友方都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友谊关系,设立我们工作机关——办事处,大力开展友区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对内消灭了任雨霖、苟鸿运、夏老么等数股土匪,安定了关中社会秩序,奠定了和平建设的基础。

在统一战线政策下,我党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的不正确,一方面是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在统战工作中存在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进行联合。这两种表现都是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不够而产生的。

国内和平统一了,关中党为了大量地培养干部,因此,就创办

了关中党校,重点输送具有实际工作斗争经验的区乡干部学习,使他们更进一步的提高党的基本知识及马列主义的理论。这对关中党以后的工作,具有很大意义。

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是不放弃反共斗争的,随着全国的反共高潮,而关中周围的友方,对我们也不会例外了,即开始限制我们在友区的群众工作,驱除我各县办事处撤退,继而即向我进行破坏暗杀工作。

1939年国民党的反共斗争更加积极了。2、3月间,我“荣校”在土桥塬被国民党包围。5月间,国民党军队在甘峪坡杀害“荣校”采购员陈应通,我方工作人员张科科被友方旬邑县长张中堂枪杀。5月25日“旬邑事件”的发生,国民党二十八师、预备第三师向边区的武装骚扰等,接二连三的反共磨擦,都证明了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变本加厉,也使我们干部了解统一战线中是有斗争的。

7月间(农历——编者注)关中党召集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50多人,代表党员4000多人,在会议中检查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决定关中党在统战工作中是必须进行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必然规律。

大会最后选出习仲勋、张仲良、郭秉坤、张凤岐等13人为特委委员,为关中党的领导机关。

1940年,国民党的反共磨擦更加严重,国民党正规军二十八师、预备第三师向我边区实行了进攻,3月间预三师袭击看花宫,5月间保安第九支队郭相堂部占领新正六区底庙村,随后四区亦被占领,及至7月间井村战斗后才给反共部队严重的打击。

为了保卫边区,必须进行反磨擦斗争。关中党在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决定关中党在反磨擦斗争中应该是:集中主力,主动打击进攻边区的反共军队,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敌人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坚决的打击进攻边区的顽固军队。

在这个政策之下,于1940年的9月间,我们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桃曲、马栏4个区成立了同宜耀县。接着(1941年2月)又夺回了新宁的盘克区。

在一年反磨擦斗争中,我们是基本上胜利了,得失地区的比较边区则更加扩大了。但是顽固分子则转向对边区进行碉堡封锁政策,蚕食边区,建立特务点线,组织瓦解破坏工作……

回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节选)

王世泰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以下简称红二团),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陕甘边区成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她的建立,曾为创建、发展、巩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幸的很,由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杜衡(后叛变投敌)把持领导权,致使红二团建立短短的半年多时间,由胜利转化为失败,给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红二团的作用和影响,深深地扎在根据地人民的心里;红二团的全体指战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是永垂的;红二团得以幸存的骨干,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振奋精神继续前进了。

奉命建红军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党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并强调“这是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任务。”六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议题时,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

军第二十六军,任命杜衡为军政委。八月下旬,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一团,争取在近期内改编成一个师,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通过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及二十六军决议案。九月中旬,省委又制定了《边区的军事计划》。

党中央和北方会议,作出关于建立红二十六军的决定,对于开展陕甘边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具有积极的意义,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央决定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被以王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杜衡又是以执行这种路线最为坚决而著称,因此,委派杜衡组建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就为这支红军后来在发展中受阻,最终遭到失败,埋下了祸患。

转角改编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省委命令陕甘游击队开到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接着,杜衡以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书记(杜本人说的,后得知当时他已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身份,由渭北游击队护送来到陕甘游击队。

杜衡来是带着框框的。这个框框代表着省委一些人对于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多年浴血苦战创建的陕甘游击队的看法。他们坐镇西安遥控,违背客观实际,多次强制陕甘游击队做她力所不及的工作,十个月内撤换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四任总指挥,使一支成立不到一年的游击队,几经挫折,元气大伤。在他

们的眼里,陕甘游击队是一伙“乌合之众”;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领导同志,是“机会主义分子”。

因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杜衡以省委书记和即将上任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名义,召开党员大会。会上杜衡首先宣布党中央、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的指令,接着大讲一通“全国大好形势”,最后声色俱厉地陈述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的所谓错误,扣上“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等等大帽子。言称,必须彻底改组领导班子,当场宣布撤销刘、谢、阎的职务,强令他们离队,赴中央受训。

对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正规红军,指战员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硬要给志丹、子长、红彦等同志强加罪名,撤职调离,大家无论如何想不通。特别是多年跟随志丹、子长的老战士,在峥嵘的岁月里,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深知志丹、子长等同志,对党绝无二心。一时,全队议论纷纷,对杜衡表示强烈不满,不少战士偷偷的找志丹、子长诉说。志丹、子长同志,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顾全大局,对战士们晓之以理,让大伙服从党的决定,教育我们千万不能闹事,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十二月二十四日,部队开到宜君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民主选举团长,举行改编仪式。选举团长,共进行两次,一次是在党内选择,一次是由军人大会选举。党内选举,提两个候选人,有曹胜荣(中队长,连级干部)和我(班长),我当选;军人大会选举,结果我又当选。接着,杜衡正式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当场拿出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署名的红军番号任命书。与此同时,杜衡以军政委名义任命红二团

各级领导。据回忆：

团长：王世泰

团政委：杜衡（兼）

团参谋长：郑毅

团参谋处长：杨重远

团经理处长：刘约三

团管理处长：杨琪

共青团委书记：师克寿

骑兵连连长：曹胜荣

骑兵连指导员：张秀山

步兵连连长：李亚夫

步兵连指导员：李秉荣

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富

少年先锋队指导员：魏武

全团共计二百余人，枪支弹药齐备。

这样的改编，广大指战员迷惑不解，但敢怒而不敢言。部分战士表示要离开部队回家。志丹、子长同志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表示服从省委的决定。子长同志还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志丹同志留下，而我则闹得更凶，表示坚决不当团长，提出两条理由：一是，我虽在军队中干了好几年，一直是个普通的战士、班长，冲锋陷阵打仗可以，不会也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本领和经验；二是，我的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杜衡听了大为光火，不容分辩地说：“这是党的命令。”

我说：“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干不了！”

杜衡给我作了好一阵思想工作，说：“你的团长是党委研究的，民主选举的，不干怎么能行？”

作为一个党员，不执行党的决定，这是党性所不允许的。所以，我最后要求道：“要我干也行，得把志丹、子长这两个老司令留下一个才行。”

杜衡不懂军事指挥，也怕军心不稳，部队不好掌握，思索了一会儿，问我：“你看留下谁合适？”

我说：“留志丹。”因为子长同志提出过留志丹。

杜衡最后同意把志丹留下来，但不让志丹管军事，给个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找了杜衡，我又找志丹谈。自从1930年跟志丹参加武装斗争以来，我最钦佩他、尊重他，他对我也很信任，有些问题，我想不通，就愿意找他谈，即是挨一顿批评，也心甘情愿，我对志丹说：“你了解我，打仗行，带部队不行。让我当团长，不是那块料。”

志丹笑着说“边干、边学嘛！”接着又说：“你打了几年仗，总还是个老兵吧！我要不走，会帮你的。”

听了志丹的话，我好象吃了“定心丸”。事实上，嗣后的仗大多都是由志丹亲自领导和指挥的。

随后，谢子长、阎红彦同志，被迫离开部队，去了上海。

两项任务

红二团成立后，省委决定红二团的任务有两条：积极创建以照

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团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红二团坚决贯彻执行这一决定。

照金，位于耀县境内，是乔山山脉南端一个突出地带，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四县交界、距各县城近者六十余华里，远者百十里左右。它北迄子午岭中段，南接渭北平原，东临咸榆公路。这里丛林密布，山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形比较复杂，土地多为耀县几家大地主和香山寺占有，无地农民多达百分之六十。除此而外，连年灾荒，山东、河南、四川等地逃荒饥民，纷纷而至，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曾不断发生自发的斗争。

从军事角度讲，照金进可攻，退可守，机动性很大。向东，经宜君、同官可截断咸榆公路；向南，经富平、三原、泾阳可出击渭北平原之敌；向西，过淳化、旬邑、永寿、彬县可扼守西兰交通要道；向北、退守子午岭密林可与敌周旋。是个得天独厚的游击战争活动区。省委选择照金作为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总后方，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这里也有不利的条件：离敌人的中心地区太近，受敌人威胁大；人烟稀少，土地贫瘠，部队兵源不足，吃粮困难。因而，对于红军的扩大和开展活动，带来一定困难。

首战焦坪

为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拔除照金地区的敌人据点，打开新局面，我红二团首先对周围敌情作了分析。照金周围据点，除陕甘游

击队时期摧毁的以外,尚有焦坪、瑶曲、庙湾、柳林、马栏、照金、香山、高山槐等据点。这些据点中,焦坪、马栏属宜君民团占据,余皆为夏玉山(外号夏老幺)匪属民团。为了鼓舞士气,打好建军的第一仗,我们决定首战焦家坪较弱之敌。

焦坪民团,害怕我军袭击,平时防范森严,在我军驻守的杨家店子方向山梁上,设下监视哨卡。志丹同志纵观敌情,向我提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麻痹敌人,后攻其不备。接着,我们制定出作战计划。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命令部队向马栏川反焦家坪方向进军,故作打马栏的姿态,造成敌人的错觉。果然,敌人上当,撤走山梁上的哨卡。而我军则仅行六十余里,就地宿营。

二十六日夜,我军突然挥师焦坪,急行军八十余里,拂晓到达,发起攻击。便衣队先行接火,骑兵连一个立马冲锋,打得敌人乱了阵脚,敌团总仓惶逃窜。我军一举将敌全歼,俘敌六十多名,缴枪六十余支,战斗进行顺利,士气特别高昂,就连我身边的一名警卫员,也在战斗打响之后,冲了上去。当他背着缴获的三支步枪,美滋滋地回到我身边时,我故作严肃地问他:“你的任务是什么?”他吐了吐舌头说:“以后再不随便离开团长。”

首战告捷,战士们欢呼雀跃,暂时忘却了几天前的不愉快。但是,战士们哪晓得严酷的现实,将等待着他们。而我,作为一名新的指挥员,深深懂得,这一仗不是志丹亲自指挥,天晓得后果如何。但是无论怎么说,我总算是接受了考验,从志丹身上又学到了新的东西。

火烧香山寺

战后,我们迅速撤离焦坪,经衣食村到香山寺附近。

香山寺,位于照金东北笔架山,建立于唐明中期。寺内,广厦千间,建筑宏伟,雕梁画栋,精巧别致,回廊曲折,幽静古朴。四周,苍松翠柏覆盖,怪石突兀峭立,山径崎岖蜿蜒,地形险峻独特。是陕甘两省边界闻名遐迩的古迹。庙中有和尚千人,尼姑数十,庙产达十几万亩之多,贮有大批的粮食和物资。

时值灾年,四方逃难饥民近万人,流落此地,嗷嗷待哺,见红军路过,同声呼救。红军指战员,面对这一惨景,无不焦心如焚。基于救灾民于水火之中,经团党委研究,决意进占香山寺,开仓放粮。

红军进入香山寺后,杜衡提出,香山寺距照金只有三十余里,是照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被敌人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的威胁,建议焚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后又在万人饥民大会上征求意见,并举手通过焚寺的决定。

烧寺,是由红军负责的。分粮,是由渭北游击队组织群众进行的。香山寺的粮食可真多,大约有二、三千石。饥民们分到粮食,无不感谢红军和游击队的恩德。这些饥民,大都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给予红军有力的支援。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分粮解救灾民不仅正确,而且必须那样做,火烧千年古刹,从军事角度讲,虽说对巩固根据地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从保护祖国的文物古迹来说,却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随着斗争的胜利,我照金地区党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组织

贫农会赤卫军,开辟香山、九保两个地区;红二团向西发展,消灭了照金和旬邑民团一部,使红色区域扩大到薛家寨、照金地区。红军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青壮年农民和灾民纷纷自愿参军,红二团扩建了步兵二连,吴岱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全团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长短枪三百余支。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军事干部,红二团正式成立随营学校。校长由李杰夫担任,汪锋同志任政委,学员三十余人。

部队继续由照金南下,相机消灭淳化铁王镇民团数十人,向通润镇一带出击,进三原县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作战。至此,红二团经过二十余天的辗转游击,划出了照金根据地的南北区界。先后协助组建香山、芋园、照金、旬邑、宜君五支游击队。红军和游击队有了自己的地盘。

.....

注:王世泰,原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回忆关中特委

张凤岐

1935年10月,鲁责任书记后把南区党委改为关中特委,唐洪澄改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空缺,特委成立后就开始肃反。

1936年1月,中央又派贾拓夫任书记,张德生任宣传部长,唐洪澄原任组织部长,习仲勋任政府副主席,秦善秀挂的政府主席职务,实际以当长工为名去永红地区开辟工作,张邦英主持政府工作。江华任司令员(代号黄春甫)。这一时期,鲁责调回中央,机关驻地在南邑。这一段组织发展很快,设了许多部。财政部长郭树廷,粮食部长卢德铭或封正保,教育、司法部长没有人,民政部长记不清,我作特委总支书记。

1936年2、3月间,国民党东北军8个师围剿我特区。为了保存势力,大部分工作人员和主力部队撤离特区回陕北,只留汪锋和我等几人在特委工作。我们成立了临时特委,大家推选汪锋同志任特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郭存信任宣传部长。8月份,汪锋同志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后,再未回关中来。

1936年10月或11月间,中央派习仲勋同志回关中主持工作,成立了关中特委。习仲勋任书记,高锋任副书记,霍维德任特区专员,我作组织部长,张策作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郭秉坤作军事部长兼司令员,陈学鼎任副司令员,齐渭川任参谋长。1937年春,杨再泉作秘书长,张仲良后任军事部长兼司令员,郭秉坤作副部长兼

副司令员,杨再泉走后李会友作秘书长。

机关驻地开始在东坪槐庄子,1937年2月份迁到桃渠河,3月份迁到马家堡。这时,我去淳耀作县委书记,杨伯伦作组织部长,刘景任统战部长,设立了保安处,金道松任处长,杨伯伦作了两个月组织部长后,去新宁任书记,我原回特委作组织部长,陈学鼎任淳耀县委书记。根据地北起盘克、南至泾河畔,东至桃曲,西至张洪,东西约150华里,南北约200华里,共辖赤水、永红、淳耀、正宁、新宁5县。

注:张凤岐,原任关中特委、分委组织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组织部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回忆关中分委

师 源

1938年7、8月份我去关中分委工作。去时机关驻地在旬邑马家堡,习仲勋任分委书记兼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霍维德任分区专员,张凤岐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陈学鼎任组织部副部长,郭秉坤任宣传部长,分区司令员张仲良,政治部主任牛书申,参谋长齐渭川,专署秘书霍如官,二科科长开始是李会友,后是高秀山,三科科长后来是我,四科科长张剑颖。

1939年5月,机关驻地由旬邑马家堡迁到长舌头,我由教育特派员改任教育科长,霍维德后半年调陕甘宁边区任财政厅长后,习仲勋兼专员,1941年张凤岐去延安学习后,我接任张凤岐秘书长职务。1940年机关由长舌头迁到阳坡头,次年由阳坡头迁到马栏。这段时间,人事、组织部长惠庆祺,副部长杨伯伦,宣传部长高仰云,统战部长孙作宾,司令员文年生,政治部主任杜平,副主任牛书申,袁志和任教育科副科长,也当过行署秘书长。机关在阳坡头时,田润芝任过一科副科长,孟宪云、郝占元任过工会主席,胡秉坤任过部队营教导员和青年主任,王占山任过保安处长,文年生任过副政委,欧阳稼祥任过参谋长,师文秀、崔士杰、周明任过裁判处裁判员,陈应亭可能是管司法的。

注:师源,原任关中分委秘书长,建国后任河南某军分区司令员。

回忆关中分区

陈国栋

1936年4月,东北军以6个师的兵力进攻我关中地区,按照中央军委命令,关中地区党组织和主力部队撤出关中,到富县树池原听取李富春和肖劲光同志传达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并受其指挥。

李富春、肖劲光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关中红一团赴三边,归二十八军指挥,驻守三边,将关中撤出的3个独立营改编为红三团,陈国栋任团长,刘永培任政委,张自行任副团长,黄朝天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由任增奎同志担任。

不久,我部奉命去陇东,由陕甘宁边区司令部指挥,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西安事变爆发,正式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时,我们红三团也改编为三八五旅的1个辎重营。

1937年春,部队开向宁县,在此稍加休整,又开向早胜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同年8月部队开向旬邑和淳化县,并在此招募了一些新兵,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力量。

1938年春,奉留守兵团司令部的命令,将辎重营改为留守兵团

司令部特务营,并由关中蒋管区的淳化、旬邑开往富、甘、洛3县,同年3月,部队到达富、甘、洛3县,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在地方党组织和部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解除了富、甘两县反动武装,打击了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成立了富县、甘泉两个人民民主政府,巩固了延安南大门,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加强我军力量,1938年8月留守兵团司令部将特务营与山炮营合并为留守兵团的特务团。刘国镇任团长,袁光任政委,陈国栋任副团长,刘永培任副政委,参谋长匡裕民,政治部主任曹光之,供给处长何金虎。1939年1月,我去留守兵团司令部的军政研究班学习1年。

1940年我调任关中保安第三团团长,政委洪青,副团长春生,参谋生孟浩,政治部主任秋红,1941年保一团和保三团合并为一团。

注:陈国栋,原任关中分区红三团团长、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建国后任陕西省畜牧厅厅长、林垦建设一师师长、省政协常委等职。

忆旬邑、淳化县八路军办事处

薛和爽

我 1936 年在关中特委任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1937 年 7 月关中特区将田润芝同志派往淳化县任三八五旅办事处主任,我派往旬邑县任三八五旅办事处主任,同年 12 月,田润芝从淳化县“八办”调旬邑任“八办”主任,我又去淳化县任“八办”主任。这两个办事处均受关中分区领导。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和国民党友区共同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募补抗日物资及兵员。与此同时,我方工作人员深入群众,整顿我地下党的组织并大力秘密发展地下党员,和友方的顽固分子作斗争。1939 年 5 月“旬邑事件”后不久,淳化“八办”随之撤销,新建的淳化县工委由杨直同志负责开展工作。

注:薛和爽,陕西韩城人,原在兰州市农村处工作。

四七年陕甘边区战地随军记

万士杰

1947年4月,蒋介石、胡宗南企图以6个旅的兵力,在关中合围我军。为避实就虚,诱敌深入,我主力部队主动撤离关中,在广阔的陕北高原与敌周旋。当时,我任新正县西线据点负责人,重点在旬邑、彬县等地活动。敌情紧急,我带领20余名工作队员和干部,随军北上,转战陕甘边区。

洛河畔历险

一野四纵队、关中专署和地委机关的干部,沿洛河西部,浩浩荡荡向陕北志丹县和安塞县进发。

沿途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羊肠小道,山路崎岖。远远望去,是无边无际的大小秃岭和不毛之地。时值四月,蓝天白云,红月当空,映照着绿黄景色,展现了陕北高原的壮丽风光。

我们每日行军40多里,然后安营扎寨。荒野当军营,饿了啃干粮,渴了饮河水。生活虽然艰苦,但战士们斗志昂扬。

行军多日,映入眼帘的尽是荒山僻野。一到志丹和安塞境内就豁然开朗。宽阔的大川和平坦的土地,周围有残旧的土窑洞和葱郁的灌木林。满山荒草野蒿,无人居住。

据了解,这是昔日的白马庙川和大风川。因历史原因,远在清

朝同治年间,由于民族矛盾加剧,互相残杀,战祸不断。当地群众惨遭迫害,四处外逃,一片荒凉。个别沟岔,有少数外地人在此暂住,缺吃少穿,生活十分困苦。

过大风川不远,便来到由西向东奔流的洛河。河岸川道以北,就是吴旗县。它北靠长城,山峦起伏,南临波涛汹涌的洛河。中间是一片宽阔平坦的土地和稻田,约住了30多户人家,地盘虽小,却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中央红军同毛主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站,就落脚在这颇有盛名的吴旗小山城。

部队机关涉水过河,宿营吴旗周围。当时,在后边相距40余里的尾追敌军,也停止了前进。

为了诱敌东进,我四纵队临时将后勤供应和地方机关整顿分编,以声东击西的战术,将后勤和机关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越过黄河,向山西转移。我主力部队悄然无声地沿着洛河,向西北的铁边城挺进。

当晚,正在沿洛河畔行军的时候,突然西北方向浓云密布,狂风大作,天空不时出现电闪雷鸣,倾刻将有暴雨降临。我们正行走在狭窄漫长的川道中,形势非常严峻,司令部发出紧急命令,要部队迅速到洛河两岸的山头宿营,以避洪水。

在30余里的川道里,满山遍野成了歇宿营地。保安处机关干部同地委在半山坡找到几家群众,就地宿营。当时,天气炎热,行军困倦。我同刘宪平处长,各拉一块门板在院子里露宿。

片刻,狂风暴雨,倾盆而下,河道洪水猛涨。暴涨的洪峰,漫淹到我们宿营的院内。天亮时,只见河川上下,一片凄凉。所有农田都被洪水冲毁,大小树木,连根拔起,东倒西歪,可是,全军在这罕

见的山洪中却安然无恙,没有人马受伤。

九岷遭遇战

次日清晨,雨过天晴,全军继续西进。将到铁边城,又挥师南下。沿途经陇东华池、合水和庆阳等地,到达甘肃宁县地区。甘肃平凉一带属马步芳防地,沿洛河以东到洛川线有进攻延安之蒋胡军。我军正是南下行进在这片空白地区。到达甘肃宁县九岷这一小塬后,便布防宿营。

由于行军劳顿,需要短暂休息,几天里,群众慰问演出,相当热闹。

为搜集西府敌军政社情,我奉命去西府支队了解情况。中午时分,我正与一位指导员交谈,突然听到屋外吆喝声、枪声响成一片。指导员赶忙出去查看,我感到情况有变,随即出门。只见骑在马上敌兵狂吼乱叫,持刀乱砍。我方战士开枪射击,与冲到塬上的敌人拼命厮杀。

此时,西府纵队副政委严克伦骑马从远处奔来,我立即上前汇报完毕,便沿沟畔支队抗击的前沿,一直跑到驻地。顾不得歇息,立即随机关后勤的干部一起,直下河川。

当时人员拥挤,撤退的机关干部都拥在河滩上。指挥部发出命令,要部队迅速爬上对面山头,掩护机关撤退。又命驻周围各团向山南集中,组织主力阻击敌人。

由于对敌人的突袭尚未完全掌握,只得在战场上观察。加之视野所限,误以为是敌人约1个团的兵力偷袭。当时打算占据山

地后,再组织主力抗击敌人。后来敌人越来越多,占据了九岷。

敌人占据九岷以后,便集中大队人马,由山底直向山上发动猛烈进攻。我军居高临下,组织强大火力,顽强阻击。战场上,只听机关枪、迫击炮、山炮震天价响。敌人反复进攻,都被打退,杀伤无数。战斗非常激烈。

在山头阵地上,死人、死马像刚收割后的麦捆子,摆满山坡,血流成河,尸横遍地。

激烈的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当天下午。日落西山,仍未平息。将晚,天色突变,下起濛濛细雨。山坡泥泞,敌人才被迫停止猛攻。我军乘机向后山且战且退,脱离了险境。

这次遭遇战是一场没有预料到的消耗战,也是一场最激烈的阵地杀伤战。据后来了解,当天激战,打垮敌人1个骑兵团,歼灭1个营,击毙敌副师长1人。敌人偷袭,未占到什么便宜。我军仅丢失一部分后勤物资,主力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西塬险遭夜袭

遭遇战后,四纵队各团营分别向原关中地区行进。山区小道,人马拥挤。天下小雨,行军艰难。到天亮,才弯弯转转走了几里山路。我们随行的这个营,有时还化整为零,分散行动。翻山越岭后,回到原新正县所辖阳坡头后掌一带。距此30多里的职田镇,驻有敌人的防守部队。

迂回转折,行军数月,到此感到格外高兴。饭后,便准备收拾行装,到附近西边的小庄子西塬休息。当时,群众都忙活着打麦

场、收麦草,村庄内比较宁静。只有少数干部在乡村活动。

不料,我们准备在西塬休息的情况,已被敌特人员密报给职田敌驻守部队。夜晚,敌人集中兵力,企图在黎明前将西塬庄子包围,把我们一网打尽。

晚饭后,干部战士打好草铺,正要休息。我突然想起,应该和住在后掌村同我们一起到达的部队取得联系,以防万一。于是,就派战士前往联络,联系的战士到后掌时,发现部队已经转移,便急速回来报告,这时,已是深夜12点了。

情况突变,我们决定迅速整理草铺,星夜行动,转到距离西塬庄子东边约五里的北坡子宿营。

刚刚转移,职田镇约5个连的敌兵,就四面包围了我们原准备住宿的西塬庄子和部队驻地后掌村。黎明前,激烈的机枪声把我们从熟睡中突然惊醒。大家随即翻身下床,直跑到沟下隐蔽、观察。这时才知道,敌人早已包围了西塬庄子,只因我们及时转移,才未得逞。

西塬是个箩围形的独庄子,只住了3户人家,门前只有一条小沟,如被敌人包围,根本无法突围。

我们又度过了一次严重危险,避免了一场劫难。倘若当晚稍有麻痹思想,警惕性不高,不派人速去联系,不星夜迅速转移,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947年8月以后,我们便在清塬、土桥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把战场推向了蒋管区。

注:万士杰,旬邑县人,曾任陕西省劳改局局长、公安厅副厅长等职。

回忆关中师范师生员工参加 修建马栏大礼堂

任应斌

旬邑县马栏镇现在还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山区,但就是这个地方,在建国前是陕甘宁边区南部的前哨阵地——关中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所在地,是陕西关中和陕南地区通向革命圣地延安的交通要道。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协定,搞反共磨擦,在中共关中地委和专署的领导下,全区军民亲自动手,发扬延安精神,经过两三年的艰苦奋斗,把马栏建成了所辖四县(赤水、新正、淳耀、新宁)、一区(槐树庄中心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民安居乐业,生活丰衣足食,和国民党的黑暗反动统治、敲榨勒索、民不聊生形成一个鲜明对照,吸引着国民党统治区临潼、渭南、富平、耀县等地的不少人民群众迁往马栏定居。因此,人口与日俱增,马栏周围的一、二、六乡的居民中,移居者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在通向延安的山路交通要道上,骡马成群结队,行人日夜川流不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关中分区领导机关初到马栏时,首先遇到的是住宿困难,许多人挤在一孔破窑洞、一间草庵子里,烟薰火燎。开大会听报告,军民联欢演戏等,都是个人自带自做的小木凳子,坐在不避风雨不遮暑寒的露天旷野,没有小木凳的就坐在石块和土地上。为此,各单

位的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打窑洞,解决住宿问题。特别使人难忘的是1941年冬到1942年春修建马栏大礼堂,这座可坐千人以上的大礼堂,完全是土木结构,四面的围墙是用木板帮起来的,室内前边有五六排木长条花格连椅,其他全是在木桩上钉的木板长条凳子,门窗没有油漆是原有的本色,屋顶上部也没有封闭,到处透风漏气,这座大礼堂和现在修建的大礼堂、电影院在设备等方面没有任何可比之处,但在40多年前的马栏来说,的确是一件影响很大振奋人心的建筑,它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大大超过了它的建筑本身,说句夸张的话,就等于今天西安的人民大厦。修建这座大礼堂,在当时困难是非常大的。第一,没有资金来源;第二,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第三,没有畅通的道路和较为先进的运输工具;第四,国民党顽固派三面包围,严密封锁,匠工是通过地下党的统战关系,冲破重重障碍,从国民党统治区的临潼请来的,其他工程活路都是由分区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等单位分工承担的。据我回忆,母校关中师范不足二百人的师生员工,基本上承担了修建需要的橡橧砍伐、运输任务。学校按照师生员工的班次、年龄大小、身体强弱,分编成砍伐组、运输组和后勤组,各负其责,我在运输组,大橡橧一根,小橡橧两根,还抽了一些身强力壮年龄较大的同学像陈明、任自立、李郎、罗敏杰等,和警备司令部教导队的同志抬运大梁、担子和柱子,女同学和身体不好的男同学,主要任务是在河滩抬沙子,拣石子,铺大礼堂外边的人行道路。因为拣的石头花色较多,图案摆得也好,受到领工的表扬,说学生到底有知识,有创新。砍橡的地方均在马栏周围的深山老林,距马栏比较近的往返也有三四十华里,远的往返有五六十华里。劳动和学习是紧密结合的,

既要完成砍椽和运送任务,又要完成学习计划,包括上课和休息时间在内,全部完成任务先后用了大约两个月时间。时值数九寒天,冰天雪地,从没有道路的高山陡坡砍伐搬运是非常危险的,不少人滑倒跌伤,李志远搬运木料时因为冻冰滑倒,碰掉了两颗门牙。在砍伐搬运过程中,老师和学生不分官兵,同甘共苦,你追我赶,互相竞赛,并肩战斗,不是手破就是肩烂。为了减轻疼痛,只好把洗脸毛巾和衣服垫上,还有不少人因出力发汗后受冻而病倒。有一次学校召开动员大会,事务主任冯宝仁为了鼓励大家,风趣地说:同学们,好好劳动,等大关中解放后,给大家天天吃麦面蒸馍,就渭南赤水的大葱,同学们听了,既有洪亮的笑声,也有热烈的掌声。因为那时基本上吃的包谷、黄米和野菜,如能天天吃到麦面蒸馍,就是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和提高了。学校在最后总结时,表彰和奖励了劳动好、完成任务出色的教师和同学,有的大会口头表扬,有的奖给毛巾、肥皂或笔记本、钢笔。

马栏大礼堂于1942年春季建成以后,开展了很多有意义的政治活动。1942年的整风动员大会、春节军民联欢会、“四·八”烈士追悼大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使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以下几件事:一件是1945年8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和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在毛主席未走前全边区的党政军民对蒋介石有无诚意普遍持怀疑态度,特别对毛主席的人身安全有无保证更是担心,不主张毛主席到重庆去。地委和专署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大礼堂作了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消除了大家的疑虑。毛主席回来后,地委和专署的领导同志又作了谈判经过和签订“双十协定”情况的传达报告。另一件是1944年过春节时,驻马栏的机关单位

在大礼堂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联合业余演出,其中有马栏区的一个节目是《镇台念书》,一乡的一个村干部扮演的是镇台,一乡支部书记张维启扮演的是镇台老爷的夫人,我是区政府的秘书扮演了镇台夫人的丫环。第三件是边区政府派来的电影队在大礼堂放映电影,不仅是黑白的,也是无声的,旁边有一个解说员专门讲解。影片的内容主要是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还有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劳动模范等。这是我有生以来(时年19岁)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从扩音器中听到讲话,第一次看到柴油机发动后电灯发亮,当时大开眼界,心情激动极了,增长了不少新奇的知识。在我离校以后的1944年冬和1945年春,马栏还修了一座石桥,母校的老师 and 同学也参加了艰苦的搬运石头的任务,大礼堂和石桥是当年马栏最大的两项建设。

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匪军进攻延安时,一进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首先占了马栏,马栏大礼堂的檀、柱子被拆的烧毁了大部分,残留部分因为风吹雨淋,快要倒塌,后经过当地政府同意,也就全部拆掉了。马栏大礼堂虽被破坏消失了,但它的历史意义代代相传,永垂千秋。马栏石桥至今仍然完整无缺,它和大礼堂一样将永远值得人们纪念。

注:任应斌,淳化县人,曾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忆边区大生产片段

王金印

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封锁政策,各种物资不准进入陕甘宁边区,妄想把边区的党、政、军工作人员和边区人民困死。同时还调动军队不断对陕甘宁边区进攻,施行烧、杀、抢的反动政策,总想把以延安为中心的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消灭掉,由于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山区,出产微薄,因而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为了战胜困难,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政策,打败日本侵略者,毛主席和边区政府号召边区军民开荒种地、纺线织布、自挖窑洞,以解决吃、穿、住的困难。我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备第一旅卫生部工作。根据上级指示,卫生部于1940年3月除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外,抽出约60人,离开分区所在地马栏镇,前往约15公里的西北山上。这个地方只有两户人家和几孔无门无窗的破窑洞。八路军战士到了这里,首先挖窑洞解决住的问题。决定每个班挖一孔窑洞,以解决本班人的住宿问题。我带领一个班挖窑洞,全体同志劳动热情很高,不到半个月,坐北朝南的山坡上,出现了一排崭新整齐的窑洞。我们住进了自己动手挖出的窑洞,大家心情非常兴奋。

冬去春来,大地解冻,为了战胜国民党的封锁和进攻,指战员们展开了轰轰烈烈地开荒劳动。每日天明上山,天黑下山,早饭和中饭都在山上吃,根本没有休息日。每天三顿饭都吃黄米杠子(小

米饭)。菜不是水煮土豆就是水煮萝卜,或者是煮辣椒水,而且量都很少,十天半月才能吃到一次面食,就算改善生活了。猪肉更是很难吃到,只有大的节日把自己喂养的猪杀了,才能吃上一次少得可怜的肉菜。

在冬天根本不可能洗澡,因为没有条件,只有到了夏天,才能去河里洗一洗;每天早晨洗脸都是四、五个人共用一小盆水,只能把小块毛巾沾湿擦一擦眼睛、鼻子就算洗了脸。

上级规定到秋天每人要生产两石(800斤)小米。由于山坡地产量低,每人必须挖4亩荒地,种4亩谷子,才能完成任务。经过高强度的开荒劳动,把长期板结的荒地,用镢头一下子又一下子地用大力气挖起来,再经过打碎土块、检出草根等一系列细微的土地整理,抓紧春天的播种时机种上谷子。好不容易盼到谷苗出土了,战士们还得细心地间苗、精心地锄草、多次地培土,谷苗渐渐长得绿油油的喜人,大家看到了一片丰收景象。

由于经济困难不能发津贴,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战士们从深山树林中砍柴卖,把碗口粗的树砍倒,截成两米多长的圆木段,再一根根运到马栏河上游的河边。早晨天还未亮,全班出动,把圆木段推入水中,圆木段顺着水流漂流而下,战士们守候在马栏镇的河岸上,等圆木段漂到就迅速将它拦截、打捞上岸,然后一根根扛到马栏镇的饭馆、商店出卖。早晨在上游投放圆木段一千斤,下午到马栏镇河岸只能打捞到五百斤,中途损失一半。如此辛辛苦苦挣几个钱,才能给大家买毛巾、牙刷、牙粉。我们班在砍运木柴中,一位战士丢失了老百姓一把斧头(掉入马栏河内),因而卖柴收入除赔老百姓一把斧头外,所剩无几,全班同志心中虽有些不快,但

是大家认为只要种的谷子生长得好,能够完成生产任务,对全班就是最大的安慰。

经过无数次的辛勤劳动,谷子确实长得很好,秋天果然丰收了,并且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最后,战士们吃上自己生产的黄灿灿的新小米饭,感到格外高兴。

今天,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上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不愁吃,不愁穿,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过去无法相比。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还应提倡勤俭,厉行节约,尤其对青少年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不然就对不起为革命而献出生命的成千上万的先烈。

注:王金印,旬邑县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政治部干部部部长。

合围与合围后的新正县(节选)

张西岷

1946年7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内战,向各解放区实行疯狂的进攻,其势汹汹。我人民解放军实行防御作战,顽强抗击,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进攻受挫,敌军被歼灭达30万人。从1946年10月以后,敌在东北战场、华北战场转取守势,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的战略方针,即两翼进攻:一是南线东翼的山东解放区,另一个是南线西翼的陕甘宁边区,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再将主力转用于其他战场。1946年农历十二月前,胡宗南以20多万人的兵力包围了陕甘宁边区。

1946年农历十二月初八,胡宗南驻正宁的四十八旅一四二团,旬邑职田的一二三旅三六九团、宜君焦家坪一二三旅的三六七团,早晨八点、同一时间,向马栏东北的杨家店子、新正县政府驻地阳坡头及湫头等地发起猛烈进攻,关中警二团、三团与敌激战,阻击了敌人进攻马栏的企图,青村、上下墙、前后义阳、西塬和巩家斜、柳林子、杨家店子等地被侵占。

胡宗南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大规模地进攻节节逼近。新正县委县政府紧急部署,展开了全县范围的备战活动:整训民兵,配合军队坚守边防,传送情报,在各战略要地埋设地雷;后山各据点建立仓库,储备小麦、黄米和面粉,无人家的山庄安装磨面磨子,设立

锅灶；开展群众性的坚壁清野活动，粮食以及敌人所需之生活资料和用具提前运光或埋藏，不给敌人提供任何生活资料；选择好群众撤退的路线和地点；县委、县政府在唐家山、四十亩台设立了后方。文件档案，大行李，老弱干部及家属等提前送到后方，县级干部轻装化，配发了枪支、准备应战。

1947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下午，关中军分区紧急通知：接西安胡宗南长官公署（地下党）情报，敌人晚上11时发起全线进攻，合围关中……新正县委、县政府立刻向县级干部作了战斗动员，要求全体干部整装待战，又组织300多名群众，连夜破坏阳坡头城墙。同一时间把情报电话告知各区政府。警二团团部忙碌着部署阳坡头和湫头、三嘉原等地的防线。待到当晚12时没有动静，敌人并未进攻。干部带埋怨的情绪说“情报”是“神经战”，于是都和衣休息了。二十八日的早5时，敌人终于点燃了战火，向长舌头、山甲、湫头同时发起猛烈进攻。县政府干部紧急集合，由于我当时是县政府政务秘书，忙着检查县长办公室和各科办公室有无遗失的信件和文件。当我走出县政府大门，县政府干部全撤出了城，只碰见马夫老郭牵着一头骡子，我俩火速出城，群众冒着炮火，还在破坏城墙。走出阳坡头村口，到了二团指挥部，敌人的攻势越发凶猛，炮火轰鸣，战云压城，一架敌机绕后掌、阳坡头、南岭、坳子轮番俯冲直射，一名战士被扫射机枪射成两半截，我们的火力被敌人的炮火压得低沉微弱，敌人已突破二团长舌头、西塬及后掌、东昌镇两道防线，伤亡惨重，战场形势极端危急，柳成功团长铁青着脸指挥部队有秩序地撤退。我未找见郭廷藩县长，亦未碰见其他干部，我思想焦虑，我的挎包装着边区政府颁发的新正县政府的大印和郭

县长的印章,必须立刻突出去,于是和老郭疾奔唐家山后方。到了三区二乡的坪里,未及上山,准备吃饭,突然来了新四旅后勤部的两名干部,持旅部信件,要新正县政府于晚上12时交给部队100副担架、一万斤小米和小麦,任务急如星火。我向部队同志讲了新正县只剩下一个马栏区 and 三区二乡,其他区乡全部失守,完成任务已失去客观条件。他们说他们管不了地方上的事,只是完成旅部交给的任务。我惟恐贻误部队作战,当即布置二乡政府动员20副担架后,同部队的两位同志速去马栏区政府。离开坪里约三、五里路程,迎上了新四旅的大部队,三路纵队朝西疾步迈进,战士意志昂扬,又笑又唱,全部着黄色军装,营以上干部均用代号,辨别不清营、团长。路过黑牛窝(距马栏8里路),部队的同志约我去见了旅首长,程悦长旅长、黄振棠政委同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四人住在一个敞口的半截破窑洞里,未进民房。窑洞的墙壁挂满了作战地图,地上也铺满地图,他们在查看职田镇以东,子午岭以西的村庄和地形。他们很热情,也熟悉敌情,程旅长给我说,今天进攻湫头的是四十八旅,进攻阳坡头的是一二三旅,先头部队三六九团已占领阳坡头、南岭、坳子,还有后续部队,明天我们要在阳坡头一带狠狠揍一顿一二三旅,我们在淳化消灭了他们的三六八团。希望新正县政府全力配合,做好支前工作,我们才有战胜敌人的物质保障。程旅长的话分量很重,我万分着急,匆匆到了马栏区政府,向董永科区长出示了新四旅给县政府的信,请他火速动员80副担架,并组织运输队,先向马栏仓库借4000斤粮,连夜运往坪里、蜈蚣洞两地。部队的两位同志在区政府吃饭,我拿了两个馒头,边吃边赶往关中专署。到了专署大院,有3个火堆,干部正紧张地销毁文件,

在专员办公室找见了杨玉亭专员,我汇报了新四旅要担架、要粮的情况,郭县长找不到,完不成任务,会影响部队作战。杨专员当即告诉我:郭县长带新正独立营现住刘家店子。你一人赶不上他了。现在关中的形势极其危险,胡宗南调动四十八旅由正宁县山河镇向东抢占雕灵关,一六五旅由宜君向西快速进发,于今晚12时也抵雕灵关,切断我退路,实现对关中的全面合围,企图消灭我党政军于囊形地带,新四旅今晚12时要突出雕灵关,所要的担架和粮食不必动员了,地区机关随新四旅同时突围,明天上午敌机要空袭马栏,马栏的居民晚上12时前全部撤离马栏街,你可随马栏区政府行动。我说我去唐家山县政府后方,杨专员说只要在山隐蔽一个礼拜,形势就会好转,敌人的全面合围必定很残忍,要挺得住,我们不会失败的,要有顽强的毅力度过暂时的难关。出了专署,新四旅的部队四路纵队经马栏街疾步向东挺进。到了马栏区政府,部队的两位同志已走了。天已黑,我同马栏区委组织科长蒋明连夜返回坪里,他回了家,我一人上南山到了县政府的后方。后方的8位同志急得不知所措,我们一夜未眠,等待明天的变化。

正月二十九日,敌人侵占了马栏,开始对山区进行大范围的清剿。新正县县级干部突围出去,少数县级干部和区乡干部全陷入敌人的合围圈,无组织地流散在子午岭、马栏川的两面山和石门关北麓的森林里。敌人清剿类似日本的大扫荡,不留空间,占领山头,封锁沟口,机枪大炮对着森林狂虐地轰击,接着放火烧山,我们的干部只得流动到阴山的雪林里,不知寒冷,不时的移动,躲避敌人的轰击、朝不保夕、度日如年、焦躁地盼望有大部队解围,恨不得插翅飞出敌人的包围圈。夜间敌人在山头燃起篝火,照得天空通

红。敌人的清剿持续了七、八天,我们的干部饿了吃点粮袋里的干馍,渴了抓着吃些雪。清剿中三区区长郭振英被敌人伏击牺牲,马栏区长董永科腿部中弹,二区区长郭生金、保安科长王学章、县政府通讯员张积成被俘。在如此空前残酷的战争浩劫中,我们的干部坚强地坚持到底,熬过了敌人大清剿的险关。也有极少数干部经不起考验,在敌人的清剿中变节投敌。保安科管理员张志云携枪(驳壳枪)投敌,向职田镇敌人告密了新正县生产科坚壁在碾盘山的大批物资。得知情报,我们即转移了物资,但看管物资的赵蛮豆被敌人严刑拷打,弄得倾家荡产;张志云还带领敌便衣队,四处寻找我干部。三区六乡民兵连长乔黑蛮携枪投敌,带领职田敌人收缴了二乡民兵十几支步枪,乔不久被我方处决。县法院裁判员巩富德为敌当保长。二区干部张生林向敌三嘉乡公所投降。县委后方管理干部(长征干部,记不清姓名)在敌人的酷刑下交出了新正县的全部档案和文件,造成组织、政治上不可弥补的损失。

胡宗南合围关中的大部队撤向陕北后,我们从深山走到前沿山区,但活动领域仍然很小,雕灵关、马栏驻扎着保十团,职田镇有胡宗南的4个连,山甲、湫头有敌乡公所,并驻有正宁自卫队,我们还是四面临敌,在敌群中穿梭,摸索着进入农村,了解到情况:村级政权全被破坏,敌建立了保甲组织,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和战争残景,满目疮痍,荒凉凄寒,身入其境,骇人却步。墙上贴着战乱布告,写着反共标语,造谣传单俯拾皆是。锅被砸破,门窗家具烧光,房顶尽是用瓦垒的作战工事,户户家徒四壁,昔日里人欢马叫、鸡鸣犬吠的景象,如今变得行人仓惶,惊恐不安,寂静无声。原来的村干部有意躲避,我们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开展活动。

1947年农历二月中旬,警一旅三团返回关中,以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展开收复失地的斗争。后二月(闰二月)上旬,新正县委、县政府由合水回到新正三区阳坡头一带,首先组织县区乡干部归队,半月后,在三区的底园子召开了县级机关干部大会。郭廷藩县长作了报告:(一)当前形势。延安失守后,整个陕甘宁处于战争环境,新正县大部分地区失守,敌人不断袭击和进犯,今后各项工作要在战争中开展,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二)恢复县区乡村四级政权。上级决定在四级政府恢复前,成立中共新正县工委(郭廷藩任工委书记),由工委统一领导全县工作。首先彻底推翻敌人的保甲组织,恢复乡村两级政权,为开展农村工作打好组织基础。(三)整顿民兵。健全组织,补充枪支弹药。各区政府建立区干队,加强县独立营,坚持原地斗争,打击小股敌人的进犯和敌特活动。(四)清理干部队伍。对少数政治动摇、逃往敌区、与敌接头、向敌登记过的干部由县工委统一审查,按情节作出处理,对变节投敌分子必予严惩。(五)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活动。讲时事、讲形势、讲战局,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宣传,鼓励群众坚定信心,积极发展生产,热心支援前线。会议开了3天,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县级干部分布基层开展工作,基本上是昼伏夜出,在敌人的骚扰和袭击中活动。县区乡机关没有固定地点,不断地转移流动,且都带保密性,上下联系困难,往往失去联络,贻误工作。这种战争环境的特殊情况,是客观形势造成的,短时间难予克服。

3月下旬,王世泰率警三旅五团南下到关中,警一旅旅长高锦纯率部也回到关中。对敌人有一定的震慑,地方工作得到一定的保护。3月底警三团智取驻细嘴子的山甲伪乡公所及40多名正宁

自卫队给予敌以毁灭性的惩罚,彻底干净地消灭了他们。湫头镇公所及所属自卫队闻风丧胆,龟缩回山河,新正一区、二区遂告收复。4月上旬警三团在小塬子消灭清剿石门关山区的胡宗南1个营。不久又在刘家沟圈击溃职田敌人侵犯阳坡头的5个排。4月下旬孤守马栏的陕保第十团偷偷溜回旬邑县城。至此,威胁新正县的惟有山河、职田两处顽固反共据点。为对付关中分区,伪正宁县由罗川迁至山河,成为加强县,历任县长多是副专员级,设有电台、报社,自卫队编制1300多人,号称“小八二师”,其骨干中有我方3个叛徒。正宁自卫队凶狠残暴,杀戮成性,实系一群亡命之徒,长期与我方厮杀,阶级仇恨极深。1947年7月袭击湫头区政府,抓去我们13名干部,杀得一人未留。1947年秋,关中二十一团进攻山河,在山河附近的干柏树与敌自卫队激战,二十一团失利,此后更加疯狂,称“雄”一方,连续清剿新正县,天无宁日,工作、生产不能正常进行。职田镇长期驻敌正规部队镇守,特务多、便衣队多,对我新正县长期实施点线活动和军事侵犯。其顽固性、反动性,较之山河敌人有过之无不及。1939年国民党发动磨擦战争,职田敌人连续炮轰驻马家堡的关中地委、关中军分区、边区第二师范。在战火中,关中地区机关撤出马家堡。敌人紧接着侵占了马家堡和新正四区(湫坡头),又配合驻彬县敌人侵占了新正六区(底庙)。1947年5月,警三旅五团攻职田不克,其城墙半腰暗堡密布,五团登城部队的云梯全被暗堡内的机枪扫断,一个连的主攻部队全陷落于外壕,一天一夜撤不出战场,第二晚12时,在强火力掩护下,才撤出职田城外壕。职田镇历任镇长都是反共的极端分子,仗驻军之势,为虎作伥。随敌军的进犯,职田镇长率特务、便衣、地痞

流氓倾巢而出,奸淫抢劫、纵火烧杀、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其害所及。新正县整天鸡犬不宁,其前任凶恶不逊的镇长文××(记不清名字)于1947年7月被新正县武工队在其家捕获,当即处决,斩了一条毒蛇,职田敌人有所收敛。

6月新正县县委、县政府建制恢复,撤销县工委。郭廷藩任县委书记兼县长,任兴田任副县长。区、乡、村政权也相继恢复,合围后的遗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全县工作条件有所改善,县政府的驻地相对稳定,在一个地点可以住七、八天,上下能够随时通讯联络。

政权恢复后,繁重的支前工作接踵跟来。支援前线是战争中压倒一切的地方工作,头绪多、任务重、时间短,重点集中在军粮、军鞋、担架运输及兵役动员等方面。全县百分之五十的干部投入支前工作,县区乡都由指定的负责干部领导。首先是建兵站。除各区设立兵站外,县政府还在后掌、湫头、刘家店子、马栏、转角5地设立了大兵站。兵站主要任务是储备军粮、军鞋,保证过路部队和作战部队的供给。其次是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乡政府建立担架运输分队,区政府建立中队,县政府建立大队。大队配备专职大队长、政治指导员、文书、管理员,中队配备中队长、政治干事、管理员,分队配备分队长。中队以上的领导由县区得力干部担任。凡年龄40岁以下的人均编入长期担架队和运输队。年龄40至45岁的人编入临时担架和运输队。长期担架运输支前时间为一至两月轮换一次。临时20至30天轮换一次。1947年担架运输基本上按规定时间轮换,1948年战争规模扩大,且多在外线作战,防线越来越远,需要的担架运输越来越多,所以支前的时间和人员年龄突破了原来的规定。长期队年龄扩大到40岁,支前时间3个月。临

时队年龄 50 岁,支前时间 40 天。每副担架队配备 5 人、运输队一人一畜。随着战争的深入,长期担架、运输无法轮换,常年随军,湫头区好多担架运输队至青海解放后才回到家。长期随军担架队一般都配发有武器,偶尔也参加作战,进攻耀县的战斗,担架队员参加了攻城。有些战役性军事行动,依靠有组织的支前队伍根本应付不了,像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后期,新正县全面动员,尤其是西府战役西北野战军撤回关中的过程中,新正一区、三区及马栏区几乎是男女齐出动,有力地保证了支前工作。三是做军鞋。在新正县来说,几乎是一场妇女运动,持续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担架队、运输队、民兵和参军战士大多是男劳力,农村的常驻人口多为妇女,妇女最苦,功绩也大,军鞋任务繁重,一批接一批,妇女们不分昼夜地做军鞋,连看不见穿针的老太婆也忙忙碌碌地做军鞋。兵站的军鞋擦得似小山包,大部队过后,一扫而光。妇女还承担碾米磨面,田间农活和家务。在战争中妇女确实起了半边天的作用,她们的功绩不可磨灭。四是征兵。1946 年至 1947 年,解放军的兵源主要靠老区提供,战争初期的征兵采取大会动员,自愿报名。中期按家有 3 至 4 名壮丁征一,后期按家有 2 至 3 名壮丁征一的办法征集。中后期征兵任务艰巨,主要靠政治思想工作,挨家挨户地做,既做本人工作,又做家属工作,使新兵走得高兴,家属愉快。新兵年龄也逐步放大,由原来的 30 岁以下放宽到 40 岁以下。

新正县地处关中西线,是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除胡宗南大部队多次围剿外,还长期遭职田镇、山河敌人的袭击和侵犯,各项工作都是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开展的,极端艰苦。干部疲惫不堪,不顾牺牲地坚守岗位、顽强地拓展工作。赵德荣领导的新正县武工

队,长期在外线坚持斗争,在永乐、新民、张洪、太峪、彬县、淳化、三原、耀县以至西安等广大地区,侦察敌情,打击敌镇公所、乡公所、便衣、特务及豪绅恶霸。夜袭万寿嘴敌哨楼,8名队员消灭胡宗南一个美械班,击毙1人,俘虏11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9支,打击了新正沿线敌人哨楼的气焰。

1947年4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新四旅通过新正县西边时,在解放彬县的先一天下午,新四旅旅部住进新正县临时所在地雷庄,8时左右,程悦长旅长召集任兴田副县长等负责人布置工作。到旅部,我第二次(第一次在黑牛窝)见到程旅长和黄政委,程旅长对任县长谈:今天下午7时,我们扣住了职田镇敌人的4个连,明早5时干掉他们,县政府在职田要召开群众大会,讲形势、讲战局、讲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发动内战的罪恶。号召群众声援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援前线。你们县政府连夜写好布告,明早我们一同进职田。县政府连夜起草布告、研究群众大会的内容,刚结束,旅部通知出发。到职田镇,东城墙被大炮轰成土梁,城门被埋没,我们翻过土梁,在城内找见黄振棠政委,在布告稿上签了字,旅部把职田镇公所的所属人员交给了新正县政府,胡宗南的被俘官兵全部带走。新四旅正在撤离时,来了两架敌机,在职田上空绕了一分钟飞走了。职田镇那个摧不跨的反动堡垒终于被摧毁了,新正县西面再无敌人捣乱。

注:张西岷,旬邑县人,曾任甘肃庆阳师专党委书记。

智勇穿越封锁线

——忆我地下工作同志的斗争事迹

崔志文

在抗战后期至抗战胜利以后,即1944年至1946年期间,是国民党对我陕甘宁边区围困封锁最严重的时期。当时,正值时局转换,中国前途向何处去的时候,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大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被迫不得不作出一些和平姿态。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一方面同意举行国共和谈,签订“双十协定”,作出遵守“协定”的承诺;但是,另一方面,他利用和平间隙,积极调兵遣将,加紧为大举进攻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作准备。在此以前,他早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大军压境,步步为营,堆起一条壁垒森严、碉堡密集的所谓万里封锁线。而在这一时期,兵力更加增多,对我边区包围封锁,更加强化升级。国民党企图以此武装封锁,断绝我边区的物资补给来源,而且断绝我党地下交通联络,妄想迫使我边区根据地由此陷于绝境。

隶属我边区南端的赤水县(现在淳化、旬邑两县各一部分),是边区的南大门,接近“国统区”的大关中和西安地区,从军事位置观看恰似插入西北魔王胡宗南胸膛的一把尖刀,因而这个县就成为敌军封锁包围重点。在环绕该县边境周围,到处碉堡林立,岗哨密布,施展恐怖暴行。凡与“国统区”接壤地区,群众往来走亲戚、赶集上会,不论男女老幼,均要被脱衣搜查,百般凌辱。有的被拷打

监禁,甚至有的惨遭活埋、暗杀。造成沿封锁线地段,田园荒芜,路段人稀,成为畏途禁区。

不过,历史的发展法则,总是无情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尽管封锁线上敌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日夜巡逻。然而,在我边区根据地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周密安排下,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确保边区与“国统区”地下党组织之间的交通联络,给出入边境的地下工作同志提供安全保证。处在边区最前线的赤水县县委,鉴于它所辖的五区和二区,分别靠近“国统区”的旬邑和淳化县城,是我地下工作同志出入边境必经的秘密交通要道。为此,在五区和二区区委设有统战科,配备强硬得力的党员干部担任科长。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负责接待和护送地下工作同志。对由“国统区”回来的同志,统战科是温暖如春的接待站;而对由边区起程出境将要奔赴“国统区”的同志,统战科则又是关怀备至的安全护送站。随着抗战胜利前夕与胜利后新形势的发展,我党在“国统区”大关中渭北、西府、东府的地下工作,亦蓬勃开展。因而,这一时期进出边境的地下工作同志日益增多。他们在统战科接待站的密切配合和大力协助下,战胜千难万险,一次又一次地来去往返,胜利地穿越封锁线,为完成党所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建树了出色的功绩。

在穿越敌人封锁线极为险恶的斗争中,为了应付环境,便于在“国统区”通行无阻,我地下工作同志,都要作巧妙的化装。有的化装成商人,有的化装成学生,新闻记者。其中多数则化装成公教人员,西装革履,拄文明棍,手提包上还印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或“出交天下事,入读古人书”等醒目字样,形象看起

来,既有气魄,又很斯文。这些不同的化装有时也与如何越敌封锁线的斗争方式相关。如装商人的,其中确有为根据地购军需民用物资的同志,他们经地下组织以经济手段,不惜花重金,在驻碣堡县的敌军内部拉通关系,获得允许将大批物资(布匹、棉花、医药品及电讯器材等),由雇用的民间运输力量,从敌碣堡线上的卡子道通过,进入边区。此种方式比较安全,但物色拉通关系,殊非易事,且要花去大量经费,故只能在急需时才采用。而进出边境的多数地下工作同志,则是利用敌碣堡群之间山谷纵横,沟岔交织的有利地形,夜间乘敌不备,钻敌人的空子,秘密跨越封锁线,到达目的地。此项艰险任务,其所以能够屡次均按计划实现,护送作向导的交通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些交通员,是经党组织严格选择、政治上忠诚坚定,机敏顽强,善于对付复杂艰险情况的党员同志担任的。不论是居住在封锁线附近“国统区”一边,以合法职业为掩护的交通员,还是边区内地的交通员,其身份都绝对保密,和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一经布置任务,即勇敢执行。他们土生土长,对当地的地形地貌,沟沟岔岔,平原山道,了如指掌。对敌军夜间缩在“乌龟壳”不敢出巢的弱点,又摸得很透。所以执行带路护送任务,历尽艰险无往而不胜。数年中,频繁往返穿越敌人封锁线斗争的胜利,就是我地下工作者与交通员同志,生死与共,力量扭成一股劲赢得的,是他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钢铁意志与毅力赢得的。下面述举一件化险为夷,穿越封锁线的实际斗争事例。

1945年深秋,一天夜里。由我边区内的两个交通员,护送渭北地下工作同志三人,趁着微弱的月光,潜行至敌碣堡附近危险区。

正要步入荆棘丛生的山坡小径时,忽然,从敌人碉堡相隔一道沟岔的一块高粱杆地里(高粱穗已收过,只留高粱杆长着)传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他们乍吃一惊,以为是敌人的伏击活动,急忙就地卧倒,观察动向。刹那间,碉堡里的敌人,朝着高粱地开枪射击,真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此处枪声一响,其他碉堡也枪声大作,机枪、步枪猛然交响,地面硝烟弥漫,夜空更加黑暗。正在他们捉摸不定的时候,却听见高粱地里传来牛叫声。于是,熟知本地乡情的交通员,立即明白过来,这原来是放吃麦青的牛群(当地习惯,秋收后,放牛于麦田,不用看管叫做放牛吃青)在高粱地里游动。这样,他们便镇定自若,沿着山坡小径迅速前进,很快迈入了“国统区”的行人大道。一直到黎明时分,他们仍听见封锁线那边还不时传来枪声。

交通员同志完成任务,返回根据地,向区委汇报了上述情况,根据敌人胆小如鼠,不寒而栗的事实,当时我因任五区区委宣传科长,负责通讯报道工作,随即向马栏的关中地委《关中报》写了一篇报道,标题为《犍牛吓破贼胆》,该报曾原文登载。

盘踞于封锁线的国民党军队,对我根据地边境地区手无寸铁的群众,来势汹汹,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但对我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人民军队八路军,他们则望而生畏,闻风丧胆。一有风吹草动,即疑为我军要袭击他们,惊魂难定,可恨可笑。危害人民多年的国民党这条万恶的封锁线,1947年以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终于整个土崩瓦解,变为人民的阳光大道。

注:崔志文,旬邑县清塬乡人,曾任宝鸡市政协主席。

我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董策丞

我原名景舒，凤翔县董家村人，出生于1909年2月。1925年起，先后几次在国民党杂牌军队中当士兵、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团副等。

“七·七”事变后，蒋匪动员地方武装去上海参战，我自告奋勇带了一百多人去上海，被编入61师（师长钟松）当连长，和日寇打了一个多月的仗，在整编时，我以非黄埔生被编掉。回家后，被伪凤翔县政府委以代理全县保安大队长职务。不久伪省保安处长张坤生索贿不逞，而无故撤换了我的队长，还下令通缉我，更加激起我的愤怒。回想起我是一个有勇气的青年人，满怀爱国热忱无由报国，反而被迫有家难归、有国难报。于是，置父母妻子不顾，于一个晚间，集合了一百多旧部和一些青年，暗带了6支手枪混进城内，从伪军政部在凤翔的军械库里搬走了300多支步枪和一部分的弹药。同时将城北门卫兵一个班的武力解决了，我们搬到麟游山区和伪保安团转战了一个多月。当时产生过进陕北边区的思想，但考虑到既无关系，又无人引进，恐难见容。适逢毕梅轩在乾县成立伪25补充兵训练处，通过关系我参加了毕部，后编为游击第六纵队，开始中条山抗战，在翼城张马镇附近对日军打过两次漂亮仗，受过卫立煌的通令嘉奖，这时才将我的通缉令取消。不幸1941年中条山全陷，我乘机逃跑回乡。

1943年河南全陷,关中告急的时候,我在西安想方设法,获得伪保六团三大队大队长职务,人枪大半是我在地方搞得。我满怀重上战场,雪洗中条耻的信心,不料被调守陕西伪碉线,封锁边区,虽然事与愿违,但却幸运的给了我一个接近革命的好机会。

1944年守伪碉线时,我才接触了新社会。从解放区人民实际生活中才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才真正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解救中国的党。在一条七尺鸿沟之间,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在黑暗统治下过着号寒啼饥,牛马不如的生活;一个过着皎如日月的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生活,此刻,我的思想才起了根本性变化,设法和共产党拉上统战关系,在我所辖的碉线内,形成了一个交通据点。如李敷仁同志和杨明轩先生等重要人物,都是从我那里进边区的。但由于方式简单,某些地方过于暴露,为胡匪特务所发觉,几次都被我应付过去了。不料叛徒郭林、胡永兴(郭原系三团三营副营长、胡系教导员)二人投敌后,将我的关系供于刘勘,被刘勘下令禁闭考察了8天,花了一部分钱才恢复了半自由。接着又被胡匪知道了,要解我去西安审讯,幸被我西北局发觉,电告关中分区,速调我进边区。我接令后,于当晚举行起义,率起义部队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了解放区。

我进入革命阵营后,不但受到关中地委负责同志的热情招待,同时到延安,又受到毛主席等首长的亲切招待和慰问,使我大为感动。

注:董策丞,陕西凤翔人,曾任宝鸡军分区副司令员、汉中专员公署副专员。

新闻战线上的一名小兵

——回忆在关中报社工作的日子

张 振 西

《关中报》是中共关中分委创办的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也是我有生以来阅读和学习的第一份报纸。她对我童年的成长影响很大，也是教育和锻炼我成为一个青年革命者的重要导师。

当年我在关中报社工作时，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现在已成为一个离职休养的老人了。回忆这一段经历，真是思绪万千，感慨良多。

一、走进关中报社

我是1947年10月从关中师范调到关中报社工作的。那时，天已寒冷。关中师范经历了解放战争最艰苦时期的锻炼，刚刚从陕北回到关中，驻在离敌人盘踞的旬邑县城只有15华里的七界石村，进行休整，准备复课。一天，关中报社李守理同志（即赵潭冰）拿着地委的调令前来学校调我。办完调动手续，同老校长田静忱、老师和同学们告别后的第二天清早，我就跟守理踏上了去关中报社的路程。我们冒着漫天大雪，踏着泥泞的山梁小路，艰难地向前行进。幸好，守理同志牵来一头骡子，驮着我的铺盖卷，我们轮流骑着骡子，边走边谈。我向守理谈了自己的简单经历，守理则像老大哥一样亲切地向我介绍了《关中报》的情况，使我回忆起了当小学生时接触《关中报》的情景。

《关中报》是1940年4月12日,在我的家乡——新正县的雷庄村创刊的。这年3月,因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发动武装挑衅,关中分委、专署从距敌人侵占的职田只有2华里的马家堡,后撤20华里,分委驻雷庄村,专署驻阳坡头村。雷庄是一个接近子午岭林区的塬边小村,只有20来户人家。村子虽小,但在周围影响很大。1933年就建立了党组织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包括贫农团、赤卫军,还有一所小学。这里地势十分险要,进可攻,退可守,真正是一座值得称赞的红色堡垒,分委驻在这里十分安全。分委宣传部就驻在我的家里。4月,分委决定创办《关中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动员人民、鼓舞人民同反共顽固派作斗争,团结全国人民打败日寇侵略者的重要政治武器。《关中报》在塬畔的一户农家印出了第一张油印小报,宣告了她的光荣诞生。报纸是油印两版,刊登有分委关于办好报纸的决定,还有国内外的重大新闻和边区建设、对敌斗争的新闻和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文化程度不高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阅读。

宣传部的马湘(原名李宗阳)领我去看刚印出来的报纸。呀!这对我来说太新鲜了。那油墨香味和字迹清晰的报纸,一下子把我迷住了。因为那时的小学除了几门课程外,没有任何课外读物,也没有其他学校可上了,我在小学已念了五个年头,所以不但能读报纸,还能简单理解她的内容并牢记在心。不久,分委和关中报社都搬驻马栏,路途远了,但因有红色邮政,我还是可以看到《关中报》。因此,说她是我在政治上的启蒙老师,一点也不过分。1942年县上设立了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在入学考试中,我的政治常识课取得全县第一名,得到了县、区教育部门的奖励。1945年,我

去马栏的关中师范学习工作时,也经常读《关中报》,包括《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从国统区购进了一批新书,我利用当图书馆管理员之便,很有兴趣地阅读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游记《中国西北角》一书,使我萌生了将来做新闻工作的念头。

现在,真的要调我去关中报工作了,自然是兴奋异常,十分激动。但关中报社是什么情况,那里的同志们好相处吗,分配我干什么工作,却心中没底,因为我对新闻业务根本不懂。幸亏有守理同志介绍情况,并告诉我去报社做缮写,我才放下心来。

那天天擦黑时,我和守理同志带着一身泥泞,到达报社的临时驻地—赤水县的安子洼村。报社的同志住在老乡的土窑洞里。当我和守理走进窑洞时,同志们正在麻油灯下刻印发往国统区的宣传品。大家立即对我表示欢迎。报社社长雷阳同志向我介绍了每一位同志。他们温暖、厚实和带有砑子的双手,和我紧紧地握在一起,那种亲切的态度令我十分感动。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集体,大家都是我的同志和兄长。我下定决心要像小学生一样,向他们虚心学习,开始新的战斗历程。后来在共同工作、生活的日子里,完全证实了守理的介绍和我的判断。我在这里工作真是太幸福了!

二、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关中报》从创刊到结束的十年中,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领导干部曾多次变动,但业务人员基本上是稳定的。经过多年的磨合锻炼,同志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都能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办好报纸,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团结战斗。遇

到困难,互相帮助;遇到问题,在团结战斗的前提下,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同志们之间虽然各有分工,但协作战斗的风气很浓,从而形成了报社自己的传统作风。不论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还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都能一以贯之。

先说领导干部的作风。雷阳同志是主编兼社长,他政治思想成熟,业务精通,待人十分宽厚,善于团结和带领大家共同搞好工作。不管时局多么危急,条件多么艰苦,他总是身先士卒,沉着老练,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报纸的许多社论、评论,都是他亲自撰写的。他善于用人,根据各人的特长,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对于同志们之间出现的问题,他也通过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加以解决。

关中报社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主体部分是《关中报》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新华社和上级报社派驻关中的记者组成。这两部分人由关中报社党支部统一领导,分工合作。有一段时间,曾发生过个别同志闹不团结的现象,雷阳同志发现苗头后,认真做了这些同志的工作,由主要责任人作了自我批评,使大家更加团结。还有一段时间,我因关节炎严重发作,不安心工作,雷阳同志也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使我认识到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重要性。

守理同志参加工作较早,年龄较大,是报社的骨干。他为人耿直乐观,经常深入基层,同干部群众和游击队员一起摸爬滚打。他撰写的长篇通讯《马栏游击队》在《关中报》连续刊出后,曾轰动一时。可惜的是,因战争环境,刊出这篇通讯的报纸和底稿均已丢失,无法查找。不然,确实是编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好材料。还有李根蒂同志,他是1948年春从《边区群众报》调来做记者的。他乐观直爽,积极忘我地工作。一次在耀县前线采访时,不幸被敌机扫射

打伤右腿,但他毫不在乎,仍然坚持工作。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了他的笑声。他喜欢抽烟,那时不仅没有钱买烟,就是有钱也难以买到。一天,我俩在马栏河洗完衣服,又去马栏大礼堂,为他捡烟蒂。他把捡到的烟蒂拆开,再用纸卷起来抽,“好过瘾啊!”根蒂高兴的欢呼着。报社记者中还有王任、白玉洁、赵玉斌同志,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的好同志。

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新华社驻关中记者组组长乔迁同志。他不怕苦、不怕累,除完成自己的采访任务外,总是时刻关心着我的生活和成长。我到报社时只有17岁,是报社这个集体中年龄最小的,加之患有有关节炎。乔迁总是像对待小弟弟一样,耐心地帮我学政治,学新闻业务,学写作。他几次鼓励我根据报上表彰的英雄人物事迹,写快板诗,虽然不成样子,他还耐心地修改和指点。行军转移时,他帮我背行李。遇到冰冷的河水,他又背我过河。到了新的驻地,又帮助我架天线、打饭,甚至打热水洗脚,以促进血液循环,减轻病痛,真是无微不至呀!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前几年他患心脏病去世了,但他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三、繁重的业务工作

报社给我分配的工作十分繁重。一是协助程志坤同志刻印报纸,每人一版,各负其责;二是负责《时事要闻》的编辑出版;三是支援地委城市工作部(专管陕西地下党工作的机构),刻印《城工通讯》。

当时,解放战争正在吃紧。在全国战场上,我军已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进军中原。但在关中地区,敌强我弱,敌我之间以“围剿”与反“围剿”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拉锯战还在艰苦进行中。

在这种形势下,报社经常处于行军转移,边转移边工作的高度紧张状态中;常常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到一地刚安顿下来,又发现敌情,不得不立即转移。一次,由于敌情不明,误判形势,我军刚组建起来的一个地方武装团,被马匪骑兵全部吃掉,只有司令员和机要秘书生还。1948年初夏,西府战役后期敌人反扑时,报社只好同地委机关化整为零,随同一支刚起义不久的地方部队,穿插于敌人之间。一次,地委和报社的同志分两路从清塬向东翻沟去赤水县的烽火台。距我们只有几里路的地委干部刚爬上沟,即遭敌人伏击,造成人员伤亡。

对于刻印工作,我还算熟悉。因前几年,我曾帮中共新正县委宣传部复写过材料,后在关中师范做文书,主要任务就是刻印学校的讲义,供教学之用,一个上午可以刻印4张蜡纸,速度可谓快矣。但刻印报纸要求却十分严格,质量速度都很讲究。特别是开始不会排版,不会写标题用的宋体字和美术字。程志坤同志像师傅带徒弟一样,耐心地手把手地具体指点和示范,使我很快掌握了基本技法。刻好了,要印好也不简单。报社只有一台手提式油印机和两块钢板,加上几支刻蜡纸用的铁笔。在刻字时,要把钢板擦净,刻字用力要均匀,手重了就会划破,手轻了笔画又不连贯。印时要把蜡纸铺平,一头压在油印机上,一头用浆糊贴在米尺上,用手提起来,印一张,提一次。油墨要稀稠合适,油印辊子上的油墨也要均匀,推辊子还要轻重合适,重了容易把蜡纸推出皱纹,轻了又会字迹模糊不清。试想一张蜡纸在完全手工操作的条件下,要印1000多份,做到保质保量保速度,谈何容易!常常是印完一期报纸,不是腿疼就是胳膊疼,日子长了,手肘弯曲展不开,手指磨得茧